知识价值革命

堺屋太一 著

黄晓勇等 译

现代西方
学术文库



书号 2002·313

定价 1.75 元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知识价值革命

堺屋太一著

黄晓勇、韩铁英、刘大洪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靳建国
封面设计：马少展

堺屋太一
知価革命
日本PHP研究所，1985

知识价值革命

ZHISHI JIAZHI GEMING

〔日〕堺屋太一著

黄晓勇、韩铁英、刘大洪　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180,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号 2002·313　定价 1.75 元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总　　序

近代中国人之移译西学典籍，如果自一八六二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余年。其间规模较大者，解放前有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工作，解放后则先有五十年代中拟定的编译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规划，至"文革"后而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这些，对于造就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材、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支持下，创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至于介绍性的二手著作，则"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另设有"新知文库"（亦含部分篇幅较小的名著），以便读者可两相参照，互为补充。

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当不会为期太远了。是所望焉。谨序。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1986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探求“下一个社会”的全貌

——代序

预言“今后的社会将发生重大变化”者不胜枚举，然而，明确指出社会“将这样变化”者却寥若晨星。

这就是目前被人们称为“有变化预告却没有变化预测的时代”的原因。

论述有关未来的书刊真可谓汗牛充栋。描绘电子计算机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之宏图的、论述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之发展可能性的、畅谈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之影响的、设想高龄化社会之状况的、预测资源能源和粮食问题之前景的、着眼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和地球上土地沙漠化问题以探讨二十一世纪之风貌的、甚至还有大张旗鼓宣扬“太平洋时代”之乐观蓝图的，等等，可以说所有领域都有了关于未来的书籍。然而，这些恢宏之论虽然涉及了“所有领域”，但却没有全面地、系统地展望未来社会的全貌。

社会事件并不象人们在试管里作试验那样始终不影响周围环境，如果某种社会性、经济性的事件完全不对其周围环境产生影响，那么，不管它是何等了不起的革命性事件，也不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性、经济性现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所谓未来预测，说到底无非是

系统地考察整个社会的变化。然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尤为欠缺的。

早在十年以前，丹尼尔·贝尔就预告了“超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在预告工业社会临近终结这一点上，其功绩是伟大的。然而，他却没有预测在此之后到来的“超工业化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因而他只不过等于说了一句“在狗的后面来的不是狗”。

此后，阿尔温·托夫勒将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称之为继农业的兴起和产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浪潮”，预告了社会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遗憾的是，他仅强调了变化的宏伟规模，对变化的结果却仍然不曾论及。

默林·弗格森指出，目前在各个领域中发生的变化正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成为一场使社会规范发生根本变化的革命。然而，她也只不过是论述了人们能够适应这场变化的能力，试图鼓起受到这一变化威胁的人们的勇气。

实际上，要在事先预测今后将开始的未来社会的情形，确实是一件有许多风险的困难工作。特别是对一个与迄今的社会截然不同的新社会，可以说是不可能进行全面预测的。正如黑格尔曾经说过的那样：“真理只能在事后才得到确认。”

但是，尽管是不全面的，人们却仍然希望能对未来进行预测，那怕只是找到几条线索也好。而且，这样做也是完全必要的。本书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所作的一次尝试，力图尽可能地对未来社会进行综合和系统的预测。毋庸讳言，肯定会有人对此提出许多批评和反驳意见，莫如说，这正是我所热切期待的。因为过去不曾有人尝试过对未来社会进行综合和系统的预测．如果这次能就此展开广泛而热烈的讨论，那么，我们的预测将

会更加趋于全面。

我的专业是研究经济问题。十多年以前，我就察觉到在经济领域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并痛感需要新的理论和分析手段。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显著提高是促使我产生这一认识的重要契机。为要分析这些现象，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统计资料已经明显不够用了。

不久，这一第三产业比重扩大的现象遂被人们冠以"脱离物资"或"经济软件化"等名称。然而，给现象安上一个"头衔"并不等于弄清了问题本身，甚至让人心存疑窦：如此简单地(给重大的经济现象)标上几个符号是否合适呢？为了彻底弄清这一问题，仅仅讨论最终物质财富的形态和产业结构是不够的。因此，我不得不从价值学说入手来进行探讨。

但是这样一来，也就进一步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难度。因为仅靠现代经济学的价值学说，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回答第三产业的价值问题的。

我的业余爱好是历史和建筑。因此，我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要从古代社会开始探索"价值"的含义。而这一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所不屑一顾的领域。

这项工作很自然地将要涉及到文明论。并且还将探讨各个时代和地区之间在文明方面产生差异的根源。

结果，我便提出了关于人们的"良知"的假说。指出，正是"良知"培育了"对大量使用丰富的物资感到体面的审美观和相信节约不足的物资是正确行为的伦理观念"。从几年前开始，我就这一问题写过几篇短文。然而，对要将它写成完整的一本书却始终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就凭我这点浅薄的知识和充满个人偏见的判断去写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实在是难以胜任的。

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动向又给了我相当大的自信心。特别是一九八三年以后的动向清楚表明，不仅在经济下降时，就连经济回升时其发展状况也与过去迥然不同。正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 PHP 研究所江口克彦氏的热心建议和小川充的全力协作，从而使我下决心从事本书的写作。

本书的目的是，综合和系统地对下一个新社会——知识价值社会——进行预测。为此占去了本书很大篇幅。然而本书的标题却是《知识价值革命》。我所讲的知识价值革命，是指由于技术、资源环境以及人口的变化，将创造出“知识的价值”成为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主要源泉的知识价值社会，并因此而产生使人们的伦理观念和审美观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大变革。我所以特意用了这么一个标题，是因为我认为这才是今天也即八十年代发生的变化的真正面目。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本书只是对不远的将来将出现的下一个社会即“知识价值社会”进行预测，而并不是讨论“知识价值社会”的好坏与否。更不是劝诱人们去有意识地建立“知识价值社会”。然而，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知识价值社会”都是要来临的，为了使我们每个人及其集团能够更好地与之相适应，尽早并且全面地了解其本质是有益的。本书如果能够对增进这种了解有所贡献，将使作者感到分外荣幸。

本书关于“知识价值革命”和“知识价值社会”的看法，近几年间曾有幸听取了日下公人、松井幹雄、佐佐木康史、日辺俊彦、细川恒以及冯·利曾伯格等人的许多有益的宝贵意见，受益匪浅，值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第一章 “新社会”诞生的征兆

“高级社会”还是“新社会”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日本以及全世界正迎来一个重大的变革时期。

然而，对于在我们今天正经历的变革之后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及产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和高级化，其结果，将产生应称之为“高技术社会”或是“高产业社会”的社会；另一种看法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及产业组织的发展与质变，将产生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社会。持前一种看法的人大多是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学者以及从事实际企业活动与行政工作的人士，而持后一种看法的人多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工作者。丹尼尔·贝尔的《超工业化社会》① 论及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就属于“新社会”论。

上述这两种看法，在重视社会的急剧变化、特别是新技术的发达普及与产业结构形态的变化这一点上，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乍一看，二者似乎是一回事。确实，在思路杂乱而没有系统观点的学者与评论家中间，甚至有人认为：“进入高技

---

① “超工业化社会”即英文 Post-industrial society，作者的本意是指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国内也有人译作“后工业化社会”。——译者注

术社会，超工业化社会就到来了”。

但是，实际上，这两种看法在最基本的着眼点上是尖锐对立着的。主张产生“高技术社会”或“高产业社会”的人们，或者说“高级社会”论者，他们把现在或“迄今”的社会看作是低级或中级的社会，认为通过今后的技术及产业组织的进步将产生“更加高级的”社会。

与此相反，“超工业化社会”论等预告“新社会诞生”的人们则把现在或“迄今”的社会看作是一种社会形态，而今后，人类将进入与此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形态”。

如果把目前的社会规定为“工业社会”，那么，持前一种观点的人(高级社会论者)认为，今后将朝着更加高级的工业社会前进；与此相反，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新社会论者)则认为，工业社会即将结束，将出现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因此，在他们看来，今后的时代将不是“高级的工业社会”，而必然是现已开始的新社会的初期阶段，即“低级的新社会”。

那么，具体来看，这两者之间究竟有那些或者说应该有那些不同呢？如果不事先把这一点搞清楚，那么这一讨论就只能是以名称的不同、“语言修辞”问题而告结束。

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在社会的这些不同发展阶段，都有象征各自不同社会特点的主要的社会结构或者是社会规范(paradigm)。当这些东西出现根本性变化时，就意味着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社会)的开始。从古代社会到中世纪，又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变化也说明了这种现象。

因此，今天把在八十年代发生的变化之后到来的社会称之为“高级社会”的人们认为，“工业社会的主要社会结构及社会

规范并没有变化，但其中的技术、产业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高级化了。”另一方面，宣告“新社会”即将到来的人们则指出：“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及社会规范不久将全面崩溃，并将产生出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

不用说，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中，还有几种看法及意见。在同是主张“高级社会”论的人们中间，其具体看法也不尽一致，并且各自强调的内容也不相同。同样，“新社会”论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目前在学者及评论家之间，并不存在“高级社会”派与“新社会”派的论争。任何一派的人都不能说拥有相同的着眼点，并且也没有排斥共同的争论对手。不仅如此，而且大部份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分歧和对立的存在。

如果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正因为“高级社会”论者的意见是以今天的工业社会为前提的，因而明确易懂，乍一看还比较合乎实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感到，在这种看法中，明显存在着一种把技术、产业结构、国家及家庭的变化作为一个孤立的东西单独看待的倾向。而对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的多种变化，则缺乏追根溯源地从宏观上予以综合把握和进行长期展望。如果进一步详细划分各个不同的领域，就不可能看到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等现象。因此，在限定了对象领域的学院派人士及行政官员中间，持这种看法的人较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与此相比较，由于“新社会”论中都有概括性的、宽阔的视野和思想上的飞跃，因而其观点十分雄辩，但因其讨论的社会超越了我们现有的经验和知识体系，因而存在着不好理解等不利因素。此外，在迄今提出的这一派见解当中，不仅在关键的

对“新社会”作出具体展望方面非常薄弱，而且在弄清目前的工业社会的结构及社会规范，明确提出取而代之的新社会的规范和概念方面，似乎也做得很不够。

以丹尼尔·贝尔的《超工业化社会》论为例。顾名思义，他对“下一个社会”只是提出了一个消极的概念，即他只不过说了是“工业社会的下一个社会”，简直就象是说了一句“在狗的后面来的不是狗”一样。

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也是一样，他仅仅指出电子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将带来与以往不同的可能性和劳动形态，预告了将发生与过去的农业的兴起和工业的全面发展相媲美的大变化。即使托夫勒的这一预告是正确的，他对于在这一变化之后将出现的事物，也只不过是提出了“在家工作成为可能”这样一种细枝末节的现象而已。

这种讨论——预告大变化和展现末端现象，作为新闻记者式的手法虽然是出色的，但它却不是真正科学的预测。正因如此，有人说，现在“是有变化预告却没有未来预测的年代”。并且，从对此种情况感到焦躁不安的人们咀里，甚至流露出“不确定的时代”或“不透明的时代”这样一些杞忧式的感叹。

实际上，这一问题在“高级社会”论中也存在。既然说下一个时代是“高级社会”，即是工业社会的继续，就必须证明：尽管技术和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但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及社会规范不会变化。然而，在这些方面，学者和评论家们却完全没有作出什么努力。

最近，对长周期的研究十分流行，也许是这种焦躁心情激起的反作用。法国的阿拉尔派及美国的布洛代尔中心的研究，在把康德拉捷耶夫周期作了时间性地区性的扩大这一点上，取

得了有益的成果。特别是兰德·卡梅伦等人追溯到中世纪，指出存在着一百五十至二百年周期的“逻辑性曲线”，可以说，这是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他们把一切都埋没在物资数量的“周期”运动之中，因而使人产生他们放弃了社会变化的理论探讨和预测的感觉。不仅如此，而且也不能不使人感到他们用工业社会周期的理论来解释中世纪社会产生的危机。借此斗胆说一句，上述观点中也可以说潜藏着发达国家的人们认为工业社会这一特殊的现代社会将要永远延续下去的傲慢思想。

本书试图从“新社会”论的立场出发，超越上述未来预测中存在的分裂和停滞局面，对“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进行历史性预测，并探讨其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研究的是“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因而把工业社会作为唯一前提的分析及统计资料就没有太大的用处了，并且，从观察工业社会中产生的知识体系也没有太大作用。即不能受现有学术体系的束缚，必须追溯到工业化以前，从考察和分析更长时期的人类文明着手，努力提出数千年人类历史中社会变化的类型。因此，在这里必须提出几个新的概念和观点。我将尽可能地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们，但对其内容(定义)希望读者能不厌其烦地充分理解。

一、工业社会的顶点——战后石油文明

高速增长笼罩下的战后世界

就从我们周围的事情开始探讨吧。首先，谈谈我们生活过来的时代——“战后”。

“战后”已经四十年了，作为“一个时期”来谈似乎有一种太

长了的感觉。但是，这一时期，特别是到七十年代初期为止的近三十年时间，有着非常显著的特点。这就是，世界经济尤其是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

我们这些生活在战后的日本人，由于是从时间非常长、速度非常高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生活过来的，因而常常很容易忘却其特殊之处。就象生活在奴隶王朝末期的埃及人相信"国王当然从奴隶当中产生"那样，无论多么反常的事情，如果它持续的时间很长，那么往往就被视为正常的东西。

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比"奴隶王朝"更为异常。因为无论怎么说，具有相当规模的一国经济，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曾持续以年平均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这样的例子，即使在人类六千年的历史当中，除了战后日本之外，也没有第二个。

用我们这些始终居住在日本的人的眼光来看，欧美"年平均为百分之三至五"的经济增长率，无论如何只能算低增长。但是，如果从长期的历史角度来看，即使增长率为"年平均百分之三至四"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一位经济学家曾试算了从基督诞生以来到今天为止的约两千年时间里西欧的经济增长率，据说其结果是，如果按二千年平均来算，每年的实际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二。在旧大陆中产业经济最为发达的西欧也就是这种程度。

在更近一些时期，即在产业革命以后的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没有这么快。例如，众所周知，本世纪二十年代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期间，在美国，由于汽车工业以及石油、化学、电话通信、电影、收音机等新产业飞速发展壮大，建立起了富足、愉快但又动荡不安的美国式生活方式。

当三十年代发生世界性大危机时，好多学者也曾指出，“二十年代不合理的高速增长”是其原因之一。

但是，若从我们所经历的战后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来看，二十年代美国的增长率决不是什么“不合理”的速度。据库兹涅茨计算，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九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如果换算成年率，则在百分之三以下。

并且，其增长部分也在从一九二九年秋天开始的大危机中丧失殆尽了。一九三三年美国的GNP仅比一九二〇年多了百分之一点二，与一九一九年完全相同。如果扣除人口增长因素，那将是一个大负数。

结果，两次大战期间(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八年)的二十年里，美国的GNP只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七。即其年平均增长率还远不到百分之二，同一期间，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率比这还要低得多。

考虑到这样一些情况，我们就会知道，战后二十多年间世界经济几乎毫不停顿地持续增长，是怎样的一部宏伟壮观的历史。且不说美国、西德如何，就连发展最为缓慢的英国也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更何况象日本这样在近三十年时间连续取得年率平均为百分之十的经济增长，真称得上是“历史奇观”。

那么，似乎有必要反问一句，为什么战后世界能实现这么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呢?

毫无疑问，答案决不止一个。笼罩全世界近三十年的壮观现象，决不可能仅仅是某一个因素造成的。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更为广泛地探讨其各种原因，则战时战后技术开发的效果、社会阶级矛盾的缓和、经济知识与政策技术水平的提高、良好

的国际经济体制等等，也必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但是，事实上，这些因素还不能说是最根本的原因。例如，尽管许多人对技术开发所起的作用评价很高，但也很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它的作用就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要大得多。这是因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汽车、家用电器、合成化学、电影等产业技术，实际上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或两次大战之间开发出来并投入实用化阶段的。

至于社会阶级矛盾的缓和就更是如此，且不说美国及德国，其它欧洲国家也一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显著变化的。而经济政策上的真知灼见及国际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说，战后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良好状态，是因为有经济高速增长支撑的结果。实际上，自经济增长能力开始衰退的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许多国家由于财政困难与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日趋严重，继续推行战后以来长期执行的经济政策已变得困难起来。不用说，就人们强调指出的战后日本的追赶效果来看，也同样遇到了问题。

如此看来，上面例举的各种原因，即使有局部的或第二位的作用，也不能说是主要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的根本区别，首先是资源、能源、农产品的丰富和价格低廉。并且，正是这些条件才是使世界性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成为可能的最基本的原因。

经济增长因石油开始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到五十年代，在中东地区相继发现

了巨大的油田。这些中东油田的规模，比起在此之前人类已经开采利用了的美国以及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油田来，不知要大多少倍。当然，一口油井所产的原油多，其生产成本也就便宜得多。一九七〇年前后，据说中东地区最大的内陆油田所生产的一桶原油的成本才十美分，甚至今天也只有几十美分。与美国国内油田的平均生产成本水平相比，过去或今天前者都只是它的二十分之一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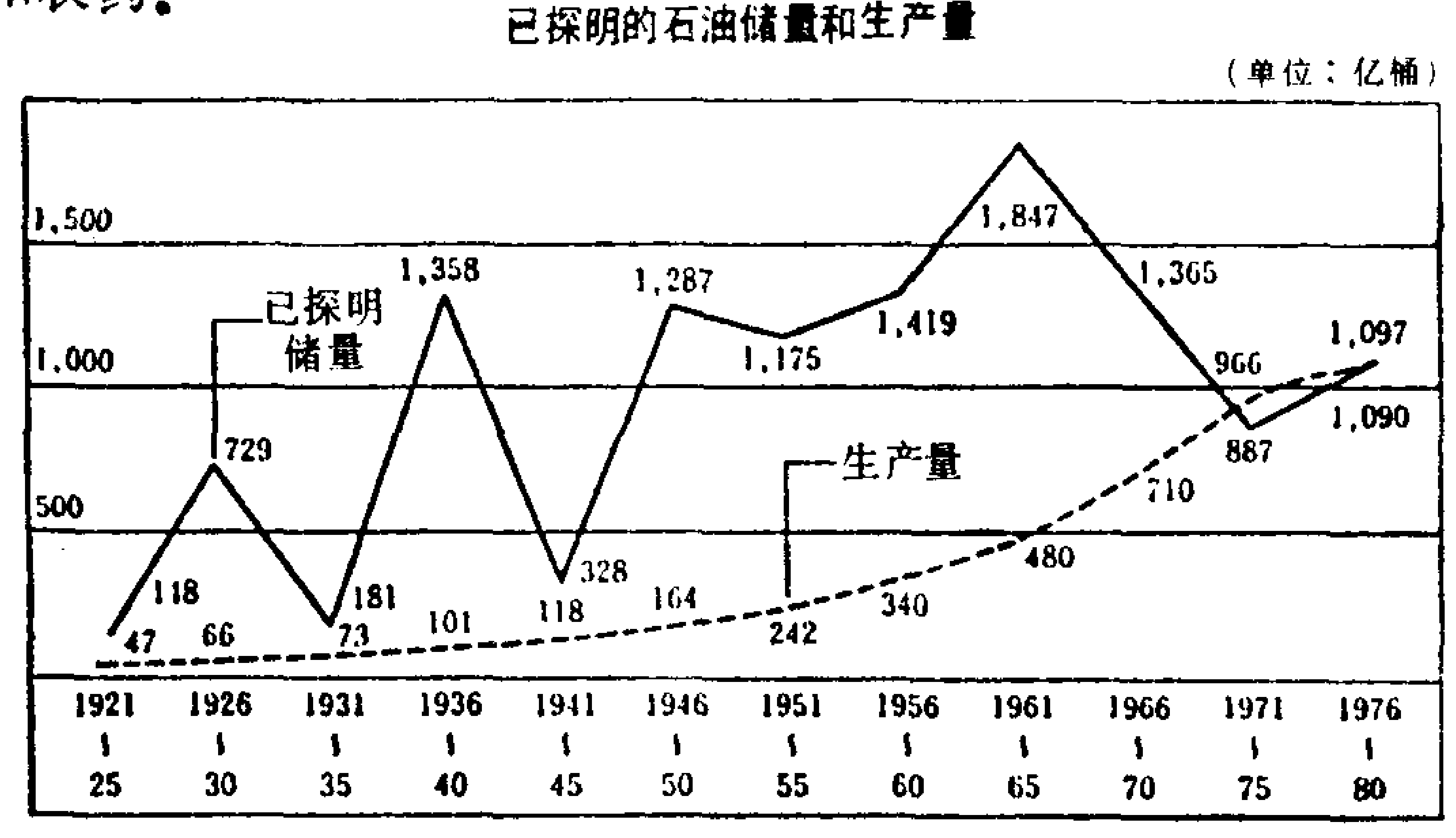
由于以低廉的成本从这些油田开发出来的石油充斥了国际市场，出现了石油过剩，其价格也随之下降。一九七〇年前后，原油最便宜时，每桶原油的国际价格仅一美元三十美分或在此以下。就其绝对金额来看，这一价格也要比本世纪二十年代便宜许多；甚至有人说，其实际价格仅是那时的"六分之一"左右。

有了廉价而丰富的东西，就想用来做些有好处的事，这正是人类的"卑鄙"之处。有了足够的原油并且价格下降以后，转眼之间到处都用上了石油。石油作为能源和化学工业的原料被大量地使用。与新技术相结合的合成化学一类的新产业由此兴起，用石油生产出了价格低廉的合成纤维以及塑料。

这样一来，石油的过剩导致了所有资源与农产品的过剩。例如，生产出了合成纤维，棉花、羊毛、黄麻也都过剩起来。当然，由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及路易安那州的棉花地改种小麦及大豆，因而也使这两种物资丰富起来。而澳大利亚的牧场由于减少了羊的饲养量而养牛，牛肉、黄油也因此供给有余。

此外，以石油为原料生产了大量廉价的化肥与农药，它们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即使在日本这种长期以来农业一直实行精耕细作的国家，与战前相比，平均一反（九百九十一点七平方米）土地的稻谷收获量也增长了五成左右。正

因如此，日本虽然没有扩大耕地，可是却积压了陈米。就世界范围的情况来看，农业土地生产力的提高更为显著。最近五十年时间里，全世界的人口约增长二点四倍，但粮食产量的增长率超过了它的增长率，世界上依然存在着粮食过剩的倾向。这也是受惠于廉价的石油，因为它使人们能够得到丰富的廉价肥料和农药。



① 已探明的石油储量　　② 生产量

此外，由于有了丰富廉价的石油，因而能够利用它来进行大装机容量的重油火力发电。因此，在发电量迅速增加的同时，电费急剧下跌。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电费平均提高了近四倍，但尽管如此，与一九三六年相比，现行电费平均是当时的二百四十倍，其增长率不到各种物价平均增长水平的六分之一。而“石油危机”以前的这一比率只有十分之一左右。

因为电力便宜，使用电力制造的产品自然也很便宜。其典型代表就是铝。战前铝还是高价金属，战后却成了“用过就扔的金属”。罐类、窗框、电线等都是用铝制作的，而锡、铜等金

属原料却因没有销路而大量过剩。

进而，由于石油丰富而便宜，降低了汽车与飞机的燃料费，使这些“奢侈的交通工具”降为一般老百姓都能利用的东西。由于同样的原因，过去难以利用的土地被开发出来，一方面扩大了城市面积与工业用地，另一方面能够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和资源。

即是说，由石油开始的“物资过剩现象”，通过化学工业和能源的转换使所有资源与农产品都出现了剩余。并且也不能忽视这一状况所具有的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开发的效果。

例如，尼龙的生产技术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发出来了，但由于其原料——石油的价格太高，不能同天然纤维竞争，因而没有被用于实际生产，长期处于“冬眠”状态。但是，战后，由于石油价格下降，其商业化进展很快，转眼间就发展起来了。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技术的改良，并开发出各种合成纤维的生产技术。人们一般不去研究那些没有实用化价值的技术，但一看到能赚钱，就会充分开动脑筋想办法。

同样的事情，在电气制品、汽车、飞机等领域也存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相比，二次大战后的技术开发所以能持续很长时期，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有利的资源小国——日本

十分明显，由石油开始的“物资过剩现象”，提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水平，对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世界经济在战后四分之一世纪中扩大了约四倍，直到一九七〇年前后为止，没有遇到过一次严重的危机。石油不仅导致了所有资源与农产品的过剩，而且通过汽车交通与重型机器扩大了可以利用的土地与水资源，并减轻了环境的负担。

由于有了"使用方便的能源"——石油，甚至连二十世纪初期曾十分严重地困扰着发达国家大城市的煤烟公害，在战后也有显著的改观。

不过，石油带来的这些恩惠，并没有平等地分配给所有国家，进口资源与农产品的发达国家得益颇厚，而出口这些物资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受益。各个发达国家，充分享受到了进口丰富廉价的原材料的好处，并因此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拥有的技术和劳动力。在这其中，条件最为有利的是资源小国日本。

"在物资过剩时，无论从何处都能购买的人占便宜"，这句话是各国普遍适用的原理。在物资不足时，能够在本公司内或关联公司得到原料补充的企业是十分有利的。但在物资过剩情况下，如能掌握现金压价购买，就可以更便宜地买进。因为此时必然会出现即使低于原价也要出手的商人及不惜血本接受订货的公司。

这种事情在国际社会是一种特别极端的现象。日本由于国内既缺乏资源，而且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顾虑，因而能够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购买最便宜的资源和粮食。例如，从中东购买石油、从澳大利亚购买煤炭、从西澳大利亚及巴西购买铁矿石、从马来西亚购买木材、从美国购买小麦和玉米、从中国购买栗子、从加拿大购买信州荞麦等等，非常方便。按最优条件从事物资采购、再加上拥有适合于大批量运输的海港，从而明显降低了日本总的资源成本。

同样的情况，不论其程度差异在世界各发达国家中都能看到，但欧美各国的状况不象日本那样彻底。例如，美国国内生产相当数量的石油。直到今天，美国仍是仅次于苏联的世界第

二大产油国，日产原油约一千万桶，六十年代以前原油基本能够自给。但是，由于美国的油田数量多但各自的规模都较小，因而生产成本较高。因此，在石油危机以前，由于美国无限制地进口中东的廉价石油，使美国国内的石油企业无法维持经营，因而采取了限制石油进口的措施。美国只因国内有石油资源，竟不得不使用高出国际价格两倍以上的高价国产原油。

英国和西德的煤炭工业发达。为了保护这一部门，它们的大部分电力及城市煤气都是用国产煤炭生产的。然而，据说，一九七〇年前后，如果用在英国或西德开采的煤炭发电，需要花费同使用每桶七美元的石油相等的成本。因此，英国及西德的电费，尤其是民用电的电费要比日本高得多。

法国虽然国内也缺乏石油及煤炭资源，但由于同旧殖民地国家阿尔及利亚之间缔结了长期的石油交易合同，因而在中东的石油价格下跌之后，仍然要继续购买阿尔及利亚的高价石油。不仅石油，英、法等国以协助旧殖民地各国振兴产业为目的，同后者签订了许多长期进口合同，其结果，只好继续购买它们的高价资源和粮食。

不管幸运与否，反正日本既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也没有这样做的愿望。日本无需顾及历史上的渊源、疆域上的远近、政治上的亲疏，有时甚至连过去的诺言与合同也不考虑，只是根据各个时期的情况，进口最便宜的物资。因此，也招致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日本寄予厚望的亚洲各国的失望，并被冠以“经济动物”的绰号。但这种作法无疑是日本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却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即与发达国家高水平的制造业(第二产业)相比，作为发展中国

家主导产业的农业(第一产业)缺乏潜在的增长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其主要出口产品即初级产品的需要将不会有太大增长。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用丰富廉价的石油制造出了更为经济的替代产品，因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出口产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也下降了。

战后，从五十年代到石油危机为止的这段时间，世界的物价(商品价格)的变动，几乎一直是呈初级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上升这种趋势。即就交易条件来看，对象日本这样的资源与农产品进口国有利，而对出口资源和农产品的国家不利。不仅如此，许多资源与农产品被石油化学产品所排挤，其需求量急剧减少。

例如，由于合成纤维的登场，棉花、羊毛的需求便难以增长。印度和孟加拉国的重要出口产品黄麻，就因此而受到毁灭性打击。东南亚的天然橡胶在合成橡胶的排斥下，其地位岌岌可危。亚洲、非洲的植物油及秘鲁的鱼油等也被化学产品所取代。利用原油发电大大降低了电费，带来了铝制品的普及，使对铜的需求和铜价萎靡不振；严重依赖铜矿石出口的南美洲及非洲各国由此陷入困境。石油是唯一的需求急剧增长的初级产品，但由于价格大幅度下跌，其出口国也没有获得太大的好处。

毫无疑问，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从世界性的经济增长中得到了一些好处。但同发达工业国家、特别是同日本这样的资源小国相比，其受益程度要低得多。一九六〇年以后，所谓“南北差距”之所以越来越扩大，主要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

人们的“良知”

如果真是这样，人们的思维方法，爱好及生活态度也将发

生变化。

人确实是聪明的动物。无论在什么时代或在任何一个地区，人们都持有认为“大量使用丰富的物资很体面”的审美观，并信奉“节约不足的物资才是正确的行为”的伦理观念。

一方面，人们有着“英明远见”。他们打破各种制约以增产短缺物资，开发技术以生产替代产品，进行探险以寻找新的资源。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具有永不泯灭的“良知”。他们以“大量消费丰富的物资很体面”和“节约紧缺的物资是正确的行为”的信条去顺应客观环境。这不只是由“丰富的物资便宜，紧缺的物资昂贵”这一经济学的原理所决定的。有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变化会远远超出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的价格弹性所拥有的天地。

以日本为例。战前，直到发现中东大油田为止，曾存在着世界性的资源与粮食不足状况，因此，缺乏资源且国土狭小的日本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呈现出慢性的“物资不足状态”。所以，在战前，“爱惜物资”、“节约物资”比什么都重要。在战前的“修身”(日本旧制中小学课程之一，现改称“道德”。——译注)教科书中，充满了人们爱惜物资的故事。

另一方面，战前，日本劳动力充足，工资很低。处于潜在失业状态的人口不计其数。因此，在战前大量使用人力被认为是很体面的行为。当时被称作名门、殷实人家、绅士等“因有钱而应受到尊敬的人家”，一定是家庭佣人多的人家。在被称为世代财主的家庭里，有许多女佣人和男佣人，还有许多书生和食客。那些虽然有着高官显职但却没有书生及食客的人家，往往被看作是怪物或薄情郎。

只是暂时地大量使用人力，那还没有跨出“暴发户”的范畴。

为了被看作真正的名门世家或殷实富户，必须使大量役用人力那种生活方式固定下来。为此，第一重要的是住宅。绝对需要大量人手的住宅才会被认为是“漂亮的府邸”。

用长长的围墙圈起宽阔的宅地，建造起几千坪(一坪等于三点三零五平方米)的日本式庭园。世上再没有比日本庭园更需要花费人力的了。每年春秋季节，都要用“造树”这种破坏大自然的办法对树木进行人工的修整和造形。如果两年不“造树”，就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因此，建造了大面积漂亮的日本式庭园的人家，自然就得到了几十年里不间断地使用人手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建起大面积漂亮的日本式庭园的人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门世家。

并且，房子面对庭园一侧，修有长长的走廊，全都装有木板套窗。要打开这些套窗，一个女佣人使劲干也需要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如果吃过中饭后急急忙忙关上，到睡觉前勉勉强强能全部关完。因此，战前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那些漂亮的府邸，即“需要用一天时间来开关木板套窗的人家”。需要这么多人手的生活方式显然是受到人们的敬仰的。

但是，战后以来，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世界性的物资过剩现象中，日本具有能从任何一个地区购买物资的有利条件，从世界各地采购了廉价的资源和粮食，在沿海工业区发展起了大规模的材料工业，其结果，日本成了物资丰富的国家。因而，若对战后成长起来的人们说“要爱惜物资”、“要节约物资”等话，必将受到他们的嘲笑。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随之提高。因而，今天爱惜人力，节约劳动力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裁减人员即实现了合理化、省力化的经营者都是伟大的经

营者。

战前，人们爱惜物资的故事被收录在修身教科书中，而战后成功地裁减了人员的经营者则被奉为“经营能手”。随着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日本人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因此，今天受推崇的生活方式与战前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象过去那种使用许多家庭佣人的做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指责和蔑视，并且，象那种“开关套窗就需要一整天时间的房子”在现在人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座不方便的破房子。现在的豪华住宅，是在几百坪地基上建造起来的钢筋混凝土的、装有大玻璃的建筑物，其内部自然要装有完备的、集中控制的空气调节装置，百叶窗及窗帘是电动式的，照明器具和万能插座随处都有。

总而言之，在使用大量资源和能源的竞争中，住宅中使用的资源和能源越多就越显得豪华。如果住宅中安有电梯，那一定会受到人们顶礼膜拜。

当然，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即使经济方面十分富裕的人，现在恐怕也不会想多雇几个家庭佣人以供差遣吧。如果公司说派十个人到总经理家里去帮忙，总经理夫人大概一定会叫喊：“那种讨厌的事情我可不干。”另外，假设有人在家庭中雇有十个男女佣人，那会被看成是非常特殊的职业。

在人手丰富的战前，认为使用人力很体面，但在物资丰富的战后，又相信大量消费物资很体面。这种变化到处都能看到。例如，战前，人们一般认为装在人工制造的杉木箱子里的糖果点心是高级的，然而今天，糖果点心如果不用几层包装材料包裹起来，就不会被看作是高级品。某大学曾在北起北海道，南

到鹿儿岛县的除冲绳县以外的全国范围内，对消费者认为“高级”的一千零三十六种点心进行了调查。据说，如将这些点心包装用的材料换算成卡洛里，其热量是能吃的点心本身热量的四倍以上。不论是过去就多少有名气的东西，只要它的包装不太好，在今天的消费者眼里就不会被看作是高级产品。

这种类似的例子，在交通手段及娱乐事业中也能看到。并且，这种潮流发展到尽头就是“用过就扔”。利用自动化流水线生产的大量产品之所以用过就扔，是因为它是一种用物资最多而用人手最少的方法。

战前与战后之间这种审美观与伦理观念的变化，不仅只是日本一国的现象，只不过从物资极度匮乏的状态急剧转变为物资极大丰富的日本，在这一方面表现最为典型而已。在欧美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能看到同样的变化。

当然，在这里所做的战前与战后情况的比较分析，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在虽然还不够全面，但已经实现工业社会化的战前日本，认为“大量消费物资体面”的拜物教思想已经渗透得相当厉害了。即所谓“节约物资为善”的说法只成了一条口头上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将它写在修身教科书等材料中。

但是，当时日本还不是完全的工业化社会，始终存在着物资紧缺、人手过剩的状态，因而事实上也使德川时代以来的以使用人力为善的思想保存了下来。

与此相反，在拥有辽阔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少数移民逐渐流入的美国，很早以前就已出现了“物资过剩而人手不足”状况。西部电影中出现的牛仔的收入水平，与明治时代日本的农民大体相同，应该说是很低的，但他们的物质消费资料却相当

的多。骑马兜风，乱打手枪，随意弄坏家具和带篷马车，随处点火烧肉吃。另一方面，却很少做理发及洗衣物等需要人手的工作。吃饭他们自己做，住宅、衣服、日常用品、备用品也都非常简单。

在以汽车和郊区住宅为特征的当今美国的生活方式中，仍可看到这种传统方式的遗风。今天，美国的产品及设施中虽然使用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精细部件的加工却比较粗糙。战后，美国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世界性的物资过剩。

实际上，这种拜物教思想，正象我后面将阐述的那样，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精神支柱。使它扩展到全世界的战后石油文明时代，可以说是工业社会的典型代表，即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

追求"规模经济效益"

由于资源和农产品变得非常丰富和价格低廉，无疑给生产或流通形态造成了重大影响。廉价的石油不仅使化学工业和火力发电事业发达起来，而且使生产设施和流通的规模迅速扩大。

在认为大量消费资源与农产品很体面的社会风潮中，人们自然就相信，让所有的人都能这样做对于社会、对于个人都是"正义"的。因此，认定不断提高每一单位劳动投入量所得到的资源、农产品的产量及其加工产品的数量是社会的正义行为。并且，未受任何阻挠地采用了所有使之成为可能的政策措施。

第一点是通过生产和产品的标准化所进行的少品种大批量生产。为了让一定的劳动力加工更多的资源和农产品并生产出工业制品，通过标准化仅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方式必定是有利的。

最好是减少花费人工设计的次数、去掉需要费工夫调换的品种掉换程序，利用流水作业进行标准化产品的生产。在工业社会里，所有工业产品的标准化都获得极大发展，并且农产品生产及服务业也采用了标准化。战后，日本在这方面也倾注了巨大努力，政府也强有力地推广这种做法。标准化、规格化曾是通商产业省长期采取的一个重要政策措施。

第二点是大型化。在工业化生产中，增加生产设备时劳动力并不同时按比例地增加。因此，如果技术上有可能，只要市场和资金条件允许，通过大型化生产常常能够提高每单位劳动力的产量。如果经济发展，并且市场规模和资本积累扩大，将推动生产大型化的发展。战后，油轮的吨位在二十年时间里扩大了二十倍，高炉的容积也扩大了数倍，石油化学工业成套设备的规模扩大的状况更是超过了上述二者。

第三点是高速化。为了增加每一个单位劳动量的产量，就需要加快机械设备的运转速度。因而从钢铁工业用的轧钢机到飞机都迅速提高了速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高速化与大型化竞争的情况下，更有利的一方——多数情况下是大型化——优先。因此，油轮的速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通勤电车速度的提高也不如其运输能力的扩大那样快。

第四点是迄今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即利用机械及资源代替人工劳动的省力化。这才是把人手替换成物质财产的最直接的方法，是最适合人员不足而物资过剩状况的技术进步。这一过程是从利用机械来代替简单手工操作开始的，随后逐渐将一些复杂的操作及检测过程等改成机器控制。并且，为了能够便于操纵这些设备，实行标准化、大型化是完全必要的。

总而言之，把上述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如果用一句简单

的话来概括战后技术发展和企业经营所追求的目标，则可以说是追求“规模经济效益”。并且，这种思想也适用于工业以外的领域。在其它领域利用工业领域中的技术进步和“扩大生产”，也产生了“规模经济效益”。

例如，在农业部门中，采用大型机械和普及标准化的化学肥料和农药，推动了单一作物的大面积生产。在流通领域，利用廉价的包装材料及自动化包装，使用顾客自我服务方式大量销售标准化规格化产品的超级市场兴盛发达。即使在娱乐产业领域中，由自动机械提供标准化服务的联营店也在增加。甚至连在家庭生活中，也出现了工业化生产的标准产品。洗涤剂、食品、家用电气化设备等已经都是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住宅的预制件化与标准公寓也增加了。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流通的快餐食品等更可以说是其最典型的例子。即认为大量使用资源而节约人力为善的审美观与伦理观念，使属非市场性劳动的家务劳动领域也发生了变化。

这些变化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前面提到的消费者的消费倾向的变化，这一点不应忘记。正是由于广大消费者们，不加任何反对就踊跃购买这些缺乏个性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的产品，然后又接连不断地将它们用过后转手扔掉，所以社会才能够采用这种生产与流通形态。

对此，不能轻率地做出“因为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便宜当然有人买”的结论；另一方面，是消费者在接连不断地扔掉那些实际上还能用很久的物品、为一些不必要的包装支付相当数额的货款、为使用超过实际需要的大型车辆而不必要地消耗汽油、等等，毫不吝惜地进行着高价的浪费。本来，人类并不是经常只根据经济利害关系忠实地活动的冷静而精于算计的

动物。人们的行为之所以看起来是合理的，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与各个时代人们公认的消费思想，即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相适应的。在从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人们看来，一切都是不可理解和不合理的。

总而言之，战后，在受惠于丰富廉价的资源与农产品的环境之中，认为大量消费物资体面、节约人手为善的消费思想与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进步及经营的发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一个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即长时期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因此，可以把这一从丰富廉价的石油开始，并通过大量利用这种石油而建立的文明称作"战后石油文明"。

工业社会的基本精神

"战后石油文明"的全面形成，就日本来看，大约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日本放弃国内煤炭工业，转而全面依靠丰富而廉价的进口石油，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而其效果深入到各个领域则是四、五年以后的事情。这一期间，沿海工业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地建立起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家庭电气化，私人汽车急剧增加。超级市场遍及全国各地，快餐食品和预制件住宅得到推广和普及，市内街面上的有轨电车逐步消失。可以说具有石油文明特色的消费资源多与节约人力型的各种机制到六十年代已全部建立起来了。

石油文明的形成期，西欧要比日本早五至十年，美国则更早一些。也可以说，物资过剩而人手不足是美国原本就有的现象，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其许多领域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但真正建成石油文明则还是在战后，大致是五十年代前期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战后，从发现中东大油田到石油文明扩展到所有发达国家，进展的确是非常迅速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石油文明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正处在工业社会思想的延长线上。即认为消费资源多体面的审美观，以及把使之实现视为正义事业的伦理观念，正是工业社会的基本精神。

工业社会，虽然有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也可称为潜伏期的准备阶段，但在现实社会中的真正发展，是从英国产业革命开始的。

那么，产业革命是怎么回事呢？从现象上来看，是采用和普及了以蒸汽机为首的工业动力源及由其驱动的大型机械设备，即工厂制工业的全面展开。它所带来的结果，是人们生产资源与农产品的能力及其加工运输能力飞跃式的扩大。也就是说，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正是“物资过剩”现象。

概括地说，产业革命及其之后的技术与产业的进步，几乎一直在创造着“物资比以前更为丰富的今天”。尤其应该记住的是，作为其起因的蒸汽机，最初是用来驱动矿山用的水泵的。英国的托马斯·萨弗里实际使用蒸汽动力的抽水泵，是在一六九八年。因此，蒸汽机的出现，首先带来了矿物资源特别是煤炭的大量供应。

因此，在产业革命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大量使用物资体面”的审美观，这时更呈现出了逐渐加强的倾向。所以，十八世纪以后，中世纪的清贫哲学及禁欲主义的思想在工业国家迅速没落下去了。并且随着工业社会的深入发展与高级化，它们越来越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今天，我们完全沉浸在工业社会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之中。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正义”的各种观念，全部都与为了能

够更多地使用物资这一目标相关。

例如，所谓“经济增长”。我们这些工业社会的居民，不管是资本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认为“经济增长是好事情”。但是，所谓经济增长是怎么回事呢？它不外乎是扩大全国的或是平均每一个人可能消费的物资量。

今天，恐怕早已没有人怀疑日本的经济增长已大大超过战前。但是，经济增长为什么能使现在的日本人比战前的日本人消费更多商品呢？在生活的三个物理性要素中，与战前相比，每个日本人使用他人的劳动大约减少了一半。土地空间也显著减少了。这是因为，在同样大的国土中，不仅人口增加了，而且战前作为宅地或耕地使用的许多土地都被放弃了。

增加的东西只有一个，即物资。现代观念当中，所谓经济增长，最终就是扩大物资的使用量。

在工业社会的精神风貌没有完全形成的战前日本，经济增长率及GNP还没有成为一般人的话题。战前的小学，即便教所谓“日本是个美丽而强大的国家”，也决不讲“富足之国”及“经济增长率高的国家”一类的内容。在工业化社会还不充分发达的战前日本，将“只有增加物资使用量才能增进幸福”这种工业社会的观念，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抑制下去了。

“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属此类。今天，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作被认为是绝对正当的事业。其内容即是提高一定劳动投入量所生产的资源与农产品的数量或加工这些产品所得的附加价值额。并且，在多数情况下，计算这一新创造的价值额时，要通过物价减缩指数等指标加以修正，并尽可能还原为简单的物资数量。在这种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是扩大全社会的物资使用量。

进一步说，“勤奋”这一观念也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今天人们所说的“勤奋”，意味着热心从事经济价值的生产，非常积极地生产物资及提供服务。在这个意义上的勤奋所以被人们尊敬，不外乎是因为它能使社会和本人的物资使用量得到增加。今天，几乎已听不到“勤奋学习”或“勤奋修业”这一类的说法。但是，直到战前，这还是最为常见的说法。

由于产业革命而真正建立起来的工业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追求增加物资使用量，并把对此作出贡献的事业视为正义事业的社会。工业社会的技术和学问主要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而工业社会的社会组织与经济体制也是为使其顺利发展而建立的。并且，我们把符合这一目标的事情视为“合理的”，而把偏离此目标的东西作为“不合理的陈规旧习”予以谴责和清除。

如果真是那样，使消费极其丰富的物资成为可能的战后石油文明，才是彻底实现了工业社会理想的时代，也即是说，它是达到了工业社会顶点的时代。

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增加物资消费量才是人类唯一的幸福。并且，人类也不是在所有历史时代或在任何地区都相信这一点的。如同后面将要详细叙述的那样，在人类历史上，既有这种审美观和伦理观念成为发达地区主流观念的时代，也有完全不同的观念统治全世界的时代。工业社会所尊奉的增加物资财富的信仰既不是万古不易的，也不是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观念。它常常只不过是在变得比前一个时代更富足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被培育、固定下来的一种特殊的现代现象。

即使在今天，在发展中国家中，还有不少国家存在着许多阻碍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宗教性社会习俗。习惯并且喜欢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的人们，抨击此为“不合理的陈规陋

习"，然而不应忘记的是，生活在非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还持有拥护这些东西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伊朗那个曾经一心一意想实现工业化社会的"洋里洋气"的国王，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残酷地驱逐出境，可以说就是一个戏剧性地表现这种状况的事例。

说今天的发达国家的文化，即建立在工业社会上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上的文明——它被称为西欧现代文明——具有普遍意义是错误的。而若将其看作是万古不易的绝对真理，那就更只是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表现。

二、"新社会"诞生的征兆

"资源有限论"成为定论

今后的社会是"高级社会"还是"新社会"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工业社会今后能否永远继续下去"的问题。并且也是一个"今后人们是否继续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的问题，即"工业社会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在近年来，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的动向当中，就可以发现有几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即人们对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的欲望正在衰退的现象正逐步扩展开来。

而造成这一明朗契机的，恐怕还是"石油"。七十年代戏剧性地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这样的疑问："资源和农产品真的就是这样丰富吗"？时至今日，甚至连习惯于在从海外进口大量廉价的资源和农产品中得到丰衣足食的日本人，也开始具有资源和农产品供应不足的预感。例如，一听

到油轮在波斯湾被炸弹击中的消息，就会惊呼："唉呀呀，要发生第三次石油危机了！"如果发现冬天下的雪少了，立即就会大惊失色，担心"今年大米短缺"。结果，尽管目前石油、大米都十分充足，但在人们心灵深处，"物资不足的危机感"、"资源有限论"已深深扎下了根。

从更长时期的预测来看，对资源、能源、粮食供应持悲观态度的情绪更为严重。实际上，许多人都认为，"到二十一世纪还有十五年左右时间，石油这类东西也会逐渐采尽用光吧。"也有不少人担心，世界森林资源的急剧减少及土地的沙漠化，将造成木材及粮食供应的紧缺。还有许多人担心稀有金属原料及环境资源也具有同样的危险，并有人担心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将导致粮食危机。总而言之，就在这十年左右时间里，"资源有限论"也已广泛地深入人心。由于产生了"资源与农产品就真是那么丰富吗"的疑问，因而从"大量消费丰富的物资很体面"这种现代社会的"良知"中产生"大量消费资源与农产品真的就那么体面吗"的疑问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大约在一九八〇年左右，这种演变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以这一时间为界线，在所有领域中，人们的审美观与需求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直到七十年代，所谓"高级"和"大型"的概念，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欧美，其内涵几乎是共同的。例如，就轿车而言，说到"高级车"必定是指"大型车"，而如果是"大型车"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辆"高级车"。家具也是一样，大型即为高级，高级必是大型。电冰箱及电视机也要买大个的，甚至连食品以及杂志等也要追求大型、大开张的。因为"大型"的需要更多的资源。

住宅问题更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倾向。提出"日本的住宅量已

经饱和了。今后必须进行质的充实"这一口号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前期。因为那时日本的住宅套数已超过家庭户数，超额实现了"一个家庭一套住宅"的目标。

但是，一说"那么，日本的住宅的质量那儿不好呢"，回答必定是"每一套的面积(太小了)"。虽然说的是"质"，然而其实际内容却是"宽敞"、"大小"这类量的概念。人们认为面积大、冷暖气设备齐全、有若干抽水马桶、装有许多照明灯具及万能插座的住宅，也即只有那些在建设、居住使用方面大量消费资源与能源的住宅，才是真正"质量好的住宅"。

如果有人说"我家的房子是十五坪的木质平房，也没有冷暖气设备，但非常高级"，一定会有人讥讽说："别在那儿硬充好汉了。"然而，在工业社会的审美观还不十分普及的战前，在宽敞的日本式庭园中，建有考究的书斋式的木质平房小住宅，曾是一种人们公认的非常高雅的情趣。

"轻薄短小"和超现代(post modern)

然而，从进入八十年代开始，情况为之一变。如"轻、薄、短、小"等词汇所表示的那样，体积小、重量轻的产品开始流行，"大型"与"高级"的概念出现分离。

七十年代以前，在公路交通法规和税制允许的范围内，轿车的每次改型都是使车型和马力更大；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则改为减轻车身重量和提高燃料消耗率。① 从人们的消费倾向来看，七十年代以前，人们也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偏好大型车，而最近则有不少人买节油车及轻型四轮车。认为庞然大

---

① 燃料消耗率$=\frac{\text{km(公里)}}{\text{l(公升)}}$。

物式的美国车土气已成定论。不仅如此，甚至有一些中年人也开始使用一度曾被认为在体育锻炼以外使用不体面的摩托车和自行车。在大城市近郊的车站前，大片停放摩托车、自行车，就是最近这十年里的事情。

家具及电气产品也是一样。七十年代还逐年趋向大型化的高级家具，进入八十年代就急剧转向小型轻质化了。"大"、"宽"这一类词汇也从电冰箱的广告词中消失了，而"修长"、"节能"等词则很引人注目。至于电子计算器及盒式磁带录象机，已用毫米为单位计算厚薄程度来竞争优劣。

这种倾向并不是日本特有的。众所周知，在美国，以一九八〇年为界，燃料消耗率低的大型轿车销售不动，而日本生产的小型轿车十分畅销。这不仅是由于汽油价格急剧上涨而出现的经济选择的结果，消费者审美观的变化对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八十年代初，美国汽车厂家的不景气，就在于没有预见到消费者的审美观的这种变化。

一九八二年春，我访问了处于危机谷底的底特律城，看到了美国汽车业三巨头之一的某家公司的内部资料，着实大为吃惊。这是一份一九七五年所做的关于预测美国汽车市场的调查材料，当时他们已经预计到了汽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其中这样明确写着："到一九八〇年，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将达到一美元四十美分左右。"这一价格与汽油价格最高时的美国东部各州的价格大致相同。该公司以此为前提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调查，但其结果却是：即使汽油价格达到上述程度，美国人喜欢大型车的状况也不会变。这种回答在被调查者中占绝大多数。因此，美国的厂家不必倾注力量开发小型轿车。但是，到一九八〇年，实际情况却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以这一年为转折，美国

人也抛弃了过去那种不是大型车就不体面的看法。

从一九八三年前后开始，由于美国经济回升和石油价格下跌，以及由于日本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使小型轿车价格上涨等因素，小型轿车的竞争力大大降低，从而使大型轿车的销路又有一定回升。但是，其市场占有率依然比七十年代低得多。考虑到近二、三年正值大型轿车的更换时期，可以说，大型轿车市场占有率的结构性缩小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用过就扔的作法也到此止步。据说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耐用消费品的更新周期延长了二成到三成。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与其接连不断地买新东西用一次就扔掉，不如采取买中意的东西长期使用的生活方式更好。

在建筑美学领域，出现了更为极端的变化。直到数年前，说起"现代化漂亮的大楼"，就是指"固定式全玻璃墙"的大楼。原因在于人们视外壁面全装着玻璃，窗子不能开启的固定装修样式为时髦。如果插图画家们画一幅"二十一世纪的东京"之类的画，画出来的图案一定是：在圆形或四方形的玻璃塔式的超高层大楼的楼群之间，大型轿车在层次交叠的高速公路上奔驰。

为什么"固定式全玻璃墙"的大楼就是现代化的呢？实际上，这是一种最消费资源能源的设计。由于窗子不能开关，因而必需不间断地供应冷暖气；由于外壁只是一层玻璃，隔热效果也很差。因而一年到头都要开动空气调节器，人为地创造出恒温的室内空气，实是一种大量消耗资源的建筑。

但是，最近"固定式全玻璃墙"的大楼已经显得陈旧过时了。近年所流行的是外面为砖墙和有独立小窗户的式样。这种式样不仅开口部分小，而且瓷砖的隔热效果也绝佳，因此自然就是一种节能型建筑。不仅如此，从目前得到极高评价的安藤

忠雄氏的住宅建筑设计等来看，甚至显示出减少冷暖气供应而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天气自然变化功能的倾向。自行车及手工制作的商品的恢复同样反映了反工业主义的思想的抬头。

这些倾向也不是日本特有的现象。甚至在“玻璃塔”林立的美国，八十年代以来设计出的许多大楼，都强调采用石质或混凝土的壁面。麦克·库勒布斯及汉斯·霍莱因的一系列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权威建筑设计师菲利浦·约翰逊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设计的大楼也是同一类风格。建筑美术是二十世纪最发达的艺术领域，但即使在这里也显著表现出了脱离石油文明的现象。

在艺术领域，把这种现象叫做“超现代”。至于超现代现象具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或者说它目前是否具有固定发展趋势等问题，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是一种与建立在通过大量消费资源和能源，从而追求机能性和数量型舒适的工业社会思想之上的所谓现代主义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最近——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的经济变化中，这种审美观的变化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不能忽视的。并且，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能懂得，对于产业经济的发展变化，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而必须把它作为有关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问题来把握和分析。

“走下坡路”的石油文明

战后石油文明的基础是认为“大量消费物资体面”的审美观。它是在产业革命以后的工业社会里培育出来的思想。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的今天，这种审美观已经开始动摇了。这既

是石油文明的后退，也是已达到顶点的工业社会的质变。

实际上，在一九八〇——一九八三年发生的笼罩全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之中，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是在石油文明的产业社会中被称之为“基干产业”的资源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在战后石油文明的经济增长中，人们是在“大量消费物资体面”这种前提之下建设生产设施的。然而，由于这时人们已认识到“未必如此”，因而，在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中产生了生产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差距。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仅生产原料物资的资源产业和农业中，还有对此进行粗加工的基础材料产业领域。在一九八〇——一九八三年的世界性危机中，所有资源产业、农业、基础材料产业都陷入了显著的萧条之中。即使在日本这种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国家，资源的需求量也大幅度减少，钢铁、有色金属、石油精炼、石油化工、水泥、木材等基础材料产业的开工率大大下降。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情况更为严重。并且，基础材料行业的萧条使与之相关的海运、建筑、造船等行业也陷入了萧条之中。八十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最突出的特点，即是基础材料产业出现的严重萧条。

从一九八三年夏季开始，以美国经济为首，世界经济明显回升。但是，此时也出现了不少与七十年代以前的石油文明时代明显不同的现象。第一点，资源及材料的需求并未随着经济回升而按正比例增加，无论是在日本抑或是欧美国家，对钢铁、有色金属、石油、水泥等材料的需求，都没有太大的增加。

第二点，与此相关联，资源、农产品、原材料等商品的国际市场行情低落。以往，只要世界经济状况好转，国际市场上商品的价格自然也就上涨。而这次却一直没有上涨。不仅如

世界主要国家的石油消费量

（百万桶）

年\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西德	日本	苏联	中国
1960	3,577	343	204	230	241	869	62
1965	4,201	544	398	588	635	1,318	84
1970	5,366	763	690	837	1,405	1,934	226
1971	5,522	763	748	953	1,526	2,427	288
1972	5,975	818	814	1,007	1,591	2,226	232
1973	6,318	840	883	1,066	1,851	2,398	409
1974	6,077	781	825	953	1,810	2,559	504
1975	5,957	683	781	916	1,642	2,727	577
1976	6,373	679	832	989	1,741	2,792	613
1977	6,727	686	814	1,037	1,909	2,986	668
1978	6,880	675	792	1,113	1,876	3,092	661
1979	6,756	704	872	1,121	2,000	3,132	675
1980	6,277	632	825	989	1,810	3,252	668
1981	5,826	585	725	891	1,680		638
1982	5,567	606	712	884	1,565		
1983	5,382	560	686	854	1,602		
1984	5,545	672	666	856	1,665		

此，进入经济情况进一步好转的一九八四年后，价格反而下跌了，频繁出现了所谓“漏底现象”。在石油方面，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一九八四年以后采取了对应措施，但也毫无作用，石油行情还是出现了漏底现象，并且金、银、锡等金属的国际市场价格也在进入一九八五年后进一步下跌了。木材、砂糖、小麦、玉米这一类产品的价格情况也大体相同。

这些都是以往经济变动中所没有见过的现象。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们建立在现存工业社会的知识和理论基础上的预测，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弄错了。在预测一九八四年的美国经济时，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物价上涨率将会非常高，而结果却是，由于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低落，实际的物价上涨率非常低。

第三点与以往不同的现象是利率的动向。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以往的经济变动中，通常是在利率降到低水平后，投资及消费才开始兴旺起来，随着经济回升，具有某种程度滞后性的利率也回升了。但是，这次却不然，美国在商业银行的利率保持在百分之十三至十四高水平的情况下即出现了急速的经济回升，而进入经济增长阶段以后，利率却反而不断下跌。

美国经济学家们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对一九八四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明显估计过低。而这显然是从下述老观念出发的：既然利率水平在百分之十几左右，经济增长率当然不会太高。由此看来，建立在工业社会的知识和理论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不仅已经失去了提供政策建议的能力，而且对短期经济变动进行预测也不准确了。

第四点，产生以上所有变动的动因，是小型企业的兴旺发

达。这虽然是在日本和欧洲都能见到的现象，但仍然以美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在美国，甚至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危机情况下，新建企业的数目仍达到了五十年代大繁荣时的十倍。不用说，这些小企业不会从事基础材料产业及大型装置型产业。它们大部分活跃在电子及其软件、流通、服务业或设计及信息这些领域中。

日本也是一样。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但却产生了比以前更先进的增长型企业。它们在服务、流通、信息、软件、设计等所谓新产业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实际上，这次经济回升的主力，正是这些领域中的中小企业群，而作为石油文明时代的“基干产业”的基础材料型或装置型大企业，已经被甩在后面。可以说产业经济的主力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今后还会有经济的繁荣与萧条，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也会随此而变动，但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资源与原材料的需求量决不会象经济增长率那样增长。既然人们的审美观将从追求“更多的消费物资”转向别处，出现这种倾向就是不可避免的。

石油文明已经渡过了它的顶峰期，开始走下坡路了。

显现工业社会终结的诸现象

作为工业社会顶点的战后石油文明已经渡过顶峰期，开始走下坡路，也使人们感到了工业社会及其进程的终结。因为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这些现象，使具有工业社会特点的社会倾向出现了逆转。前面谈到的在以建筑为中心的艺术领域出现的对“超现代”的探索是这方面的一种表现，产业界内小企业群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一种表现。另一个突出的现象表现在技术发

展的方向上。

产业革命以来，技术的发达主要是面向大型化、大批量化和高速化。高炉、成套化工设备、轧钢机都陆续实现了大型化，船舶与飞机也趋向巨型化。楼房、饭店也越建越大了。七十年代以前，连电子计算机开发也倾注全力搞大容量的大型机器。产业技术不用说，即使在生活、娱乐、信息等领域也是以大型化、大批量化作为主要的技术开发目标。

与此同时，高速化也是技术开发的重要目标。从纺织机械、轧钢机到飞机，所有领域都在无止境地追求高速化。在铁路这种衰退领域，只有高速化取得了进展。在家庭炊事用具方面，以速度快为特色的电子烤炉很快流行起来了。谈论未来技术的人们，几乎都谈到了制造速度更快的超音速喷气式客机及磁力悬浮列车的"理想"。

当然，当时在降低原料消耗、节省资源方面也取得技术进步，但为了进行这一开发研究所投入的资源和人力，只是大型化、大批量化、高速化的几十分之一。七十年代后期，即当我还在通商产业省的工业技术院担任研究开发官的时候，还是这样一种研究气氛，只有大型化、高速化技术才是能激起一流研究人员热情的领域，节省资源技术的研究则是二、三流的现场工程师的任务。

上述情况在国营铁路公司、电气通信研究所，甚至在大学以及民间企业的研究所里也能看到。例如，在国铁公司的铁路技术研究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技术开发费被用于开发更加高速的新干线及磁力悬浮列车，投到原有线路改造上的费用微乎其微。因此，研究人员及技术人员都喜欢从事开发更加高速的铁路的工作，该领域的领先地位成了国铁引以为荣的资本。

但是，到了一九八〇年，无论是日本或是欧美国家，上述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用于建造更大型的高炉及五十万吨以上油轮的技术开发，几乎已无人问津。而试图铺设时速三百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的计划全然不见了。即便在速度就是生命的飞机制造业领域，开发比"协和式"(英法共同研制的超音速客机——译注)更快的客机的计划也销声匿迹了。不仅如此，甚至连"协和式"本身是否停用也已成为人们正在研究的问题。

即使在不那么注重经济效益的军事技术方面，大型化和高速化的开发也完全停止了。没有建造比"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美国海军核动力攻击型航空母舰——译注)更大的航空母舰的计划，不再研究开发航速在三马赫以上的军用飞机。似乎可以无限增大的核武器也正在迅速朝小型化方向发展，甚至连一百万吨级的核弹头也嫌太大，成了旧式的。现在，省资源化、多样化、信息化等领域已经取而代之，成为技术开发的核心内容。汽车及船舶的轻型化、节能化已经为人们所了解，大楼、住宅也在朝节省资源的方向发展。在工业设备领域，由于采用了工业机器人及"机电一体化"，已经能够进行多样化生产。就电子计算机来看，虽然还在进一步开发大容量的机种，但小型的个人用计算机及办公用计算机的普及与改良却更加引人注目。时至今日，安装一个象神殿一样的巨型电子计算机，然后由全国各地的终端分时共同使用的办法，显然已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了。

石井威望把这种技术进步方向的变化概括为"从偏重硬件的发展路线转向注重整体发展的路线"，并指出，它是从工业社会型技术进步出发的大转变。发生在二十世纪人类最杰出的技

术开发中的这一变化，对于分析下一个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此处不应忽视的是，技术开发方向的这一变化，不光是作为技术进步的结果产生的。的确，在实现生产多样化方面，电子计算机及采用电子技术的工业机器人等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省资源及信息化的领域中，情况也是一样。但是，并不是说实行多样化、信息化完全不会使成本上升，并且，在电子计算机技术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的领域，多样化、信息化也在发展。

例如，近十多年来，日本盛啤酒的容器的式样从八种增加到一百三十余种。因此，啤酒制造与流通所需要的费用也增加了二成以上。在快餐食品及时髦衣料方面，其多样化商品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其成本上涨的比率也很大。象汽车这种典型的大批量生产型的工业产品也在朝车型、内部装饰和色彩等的多样化方向发展，虽然大量采用了工业机器人，但引起了不可忽视的成本上涨现象。

这些事实表明，多样化不是因经济效益及技术进步所致，而是由于消费者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们的审美观的变化而引起的，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了技术开发，其结果，便形成了进一步引起并满足消费者欲望的循环。

社会的这种循环，是人们希望得到更多财富的欲望和为适应这种欲望而推进大型化、大批量化、高速化的所谓工业社会型循环的逆转。如在后面将要详细论述的那样，如果这种倾向今后仍然继续下去，就可以认为它必将导致工业社会的终结以及新社会的出现。

“良知”还在起作用

那么，今后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呢？

本书并不是为预告工业社会之终结而写的，而是以预测“下一个社会”，即以今后将开始的新社会为主题。关于这一点，我准备在第四章集中进行讨论，在此仅先概要地介绍一下社会变化的方向和原因，以及对因此而产生的新社会的看法。

当然，要准确地预测超越了工业社会的“下一个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过去考察分析工业社会而产生的现有学问和理论没有多大作用，并且仅靠以往使用过的概念是极不够的。为了探讨新的社会，必须提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概念。创造用来描述这种“新的社会”的语汇和逻辑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为此，至少要从工业社会以前开始探究人类的文明和经济社会的变迁，即超出工业社会的范围进行更长时期的考察。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为了使大家能对此有更清楚的理解，想首先考察一下作为导致社会产生根本性变化的媒介物的“良知”的作用。

前面已经谈到，人们心目中存在着接受“大量消费丰富的物资很体面”这一审美观所必需的“良知”。创造出战后的石油文明和工业社会本身的，归根结底，还是这一“良知”的作用。并且，今后它还必然会发挥作用。历史证明，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在任何地区，它都会起作用。

因此，在探讨今后的社会时，如果能先探明“今后社会中什么东西将变得丰富起来”，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得到一个重大的线索。

那么，今后将变得丰富起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一定是广义的“知识”。

“知识”这种东西，因过去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而增加，因教育和信息流通的发达而普及，由人们的感性和思辨而创造。

但是，今天，由于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飞跃发达，加工、贮存以及传递知识的手段急剧增加。特别是近年来个人用电子计算机、办公用电子计算机以及沟通它们之间联系的通信技术的发达与普及，使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场所中陆续出现的“知识”迅速增加。

即今后将成为“知识”丰富的时代。因此，在今后的社会中，大量消费“知识”的生活方式将受到人们的尊敬，含有大量“知识价值”的商品将会十分畅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下一个社会设想为“知识的价值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即“知识价值社会”。

作为“知识价值之容器”的物质财富

那么，所谓“知识的价值”或“知识价值”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目前在经济学者及评论家中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强调知识的价值的学者与评论家虽有不少，但其中大部分人仅将它与教育产业和信息产业联系在一起，将其解释为经济的“软件化”及所谓“脱离物资”等含义。这样一来，社会变化的实际状况更加不明朗了，并且有时还遭到拥有传统的工业社会知识体系的人们理论上的反对和感情上的厌恶。

的确，教育产业和信息产业(这也是个在概念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被四处引用的词)无疑是出售“知识价值”的行业。因此，今后它将会有大的发展。但是，这些行业是把“知识价值”作为单个的“知识价值”出售的产业，在经济全局中所占比重决不会太大。

“知识价值”的绝大部分，恐怕是以转化为有形的物资或以以往就存在的服务等形式来满足社会的需求的。

以领带为例。如果它是“爱尔梅斯”或“拉肖尔”这些世界名牌商标的产品，每条售价就要二万日元以上。但是，即使是同质材料——例如丝绸——的领带，如果是无商标商品，则在四千日元以下。用不着再提出更特殊的商品来说明这一问题，就是同样材料的领带其价格差距也达五倍以上。但是，如果将二者的情况作一比较，无论是所耗资源、能源，还是在纺织、染色与缝制等工业生产过程中所花费的工夫，都看不出有那么大的差别。爱尔梅斯的领带价格昂贵，既不是因为它比其它领带长三倍，也不是因为它是精心制作的刺绣珍品。

然而，它的价格却是别的同质领带的五倍。虽然没有谁强制人们去买它，但买它的人却非常之多。因为这一名牌商标领带的二万日元的价值已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那么，在这个名牌商标的领带当中，除了其材料费及加工费之外，还包含了什么价值呢？那就是，人们对这一商品具有良好的印象和它的式样非常好等“知识的价值”，即“知识价值”。

同样的例子，在新技术、新材料和具有特殊性能的机器中也能看到。今天，利用新技术制造的产品，用高于其原材料与工业加工费合计之成本数倍的价格出售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商品仅在适当的地方用很少一点儿新材料，就将价格提高到原来的二、三倍。还有些商品，由于具有独特的机能而受到某些特殊顾客的狂热追求，成了超高价商品。并且，陆续出现了一些尽管收费很高，但由于实行了特殊服务方法而招徕了许多顾客的娱乐业和服务业。它们都是含有大量“知识价值”的商品。

“知识价值”的增大这件事本身，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产生“脱离物资”的现象。如后面所述，物资作为“知识价值之容器”，其重要性是不能否定的。问题在于，在物资的价值构成中，“知识

价值"所占的比重也在迅速地扩大。

由于我们这样来看问题，也许会有人说："什么呀，你说的那种事情过去就有过。在以往的经济学中，曾将这类事情作为艺术品及宝石等的价格决定问题进行过研究，并作为例外的事例解决了。"

这种说法也许有些道理。但问题是，在"知识价值社会"中，这种现象不是个别而是一般、不是偶然而是普遍地存在着，它甚至成了社会中主要的价值形成形态，并且，还以此为前提决定着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行为方式。这是因为，人们对"丰富的东西"即知识的欲望，将由于"良知"的作用而增加起来。决定"一个社会之性质"的，不是"存在着什么"，而是"最主要的是什么"，进一步说则是，"这个社会的一般性社会规范是什么？"

"知识价值革命"的前兆

即使在工业社会，艺术品、时髦货、特殊的新技术的价格与原材料及工业生产的成本也没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这些商品中都包含着一种"知识价值"。

但是，这些毕竟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因此，这些费用即价格关系没有能够成为衡量整个社会的社会规范。工业社会的一般性生产体制即是以标准化大批量生产为前提的工厂制工业生产体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物一价的规律才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原理和基本的社会规范。

今后，在我们即将迎来的新社会即"知识价值社会"中，物资的价值中的绝大部分将由"知识价值"所占据的形态，才是商品价值的一般形态，而唯有"知识价值"的创造才是价值形成的主要形态。

如果真是这样，整个社会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首先从易于弄懂的地方来说，届时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的方式将发生变化，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将扩大。“知识价值”这种东西，正是依靠强调与其它商品不同而产生的。如果某人通过创造“知识价值”获得了巨大利润，其他人一定会拿出别的“知识价值”，并且必然会说：“我们这个更好。”这样，商品的种类就会无限地多样化，各个商品的生产单价也会逐渐缩小。与此同时，在这种竞争之下，商品流行的周期必将越来越短，新技术的寿命也将缩短。社会当中一定会发生“知识用过就扔”的现象。即新的设计式样及新的改良技术、装配技术接连涌现，然而也就不断地被抛弃。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多样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和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倾向的出现，就是知识价值革命发生的前兆。因成功地创造了“知识价值”并急剧发展的小企业，即所谓风险企业的大批出现也是这一倾向的一个侧面。在文化方面，现代派的固定模式已经消失，没有出现大的流行风潮及大名星，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表现。现在，已经能看到产生“知识价值社会”的大变化，即所谓“知识价值革命”正在发生的前兆群。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知识价值”具有依赖社会主观意识而存在的本质。

以往工业社会的基石是资源、农产品及其粗加工品等原材料，它们都有稳定的价值。例如，一袋大米、一吨钢材、一匹棉布等等，各自都有稳定的使用价值。因此，即使由于需求关系的原因造成了价格波动，其使用价值也不会变化。因此，如果价格大大超过了成本，迟早总要降下来，低于成本的则要涨价。即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这种设想至少是可以成立

的。

如果这些资源与原材料以及进行过工业加工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是主要产品，那么制造它们的手段通常也是有价值的，也会有价格。生产大米的稻田以及炼钢的高炉、织布的纺织机也都有稳定的价格。可以设想，即使目前钢铁及棉纺织行业因萧条出现赤字，不久经济回升后也能赚钱。

但是，“知识价值”却与此不同，例如，去年某种样式的领带流行，一条二万日元还十分抢手。而到今年就成了过时的旧货，实行大减价，一条降到了四千日元。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即去年人们还承认它有一万六千日元的“知识价值”，而今年却成了零。此时，由于价格仅在一年就降低了五分之四，大概不会有人认为，如果早先大量地买入还能以二万日元畅销吧。

技术和机能也是一样。某个企业因发明了非常高明的技术而赚了大钱，但如果其它公司的技术超过了它，这种技术的价值立刻就会降为零。个人用电子计算机的软件等商品实际上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

即是说，“知识价值”不仅是可变的，甚至是短暂性的。并且，在这里，十分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时尚及技术的变化，创造“知识价值”的机能本身常常因此而失去了价值。

例如，某个时期某位设计师所设计的式样十分受欢迎。因此，拥有该设计师的大企业出现大发展，成长为大型流行商品厂家。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但是，若干年后，如果该设计师的作品不再受欢迎了，那么不仅该企业的产品会出现大跌价，而且该企业的“知识价值”创造机能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技术开发、商品与事业规划、艺术与技艺等等所有创造“知识价值”的机能都是如此。即“知识价值”的短暂性，导致了

其创造机能的短暂性。

在以无限多样的"短暂性"知识价值为主流的社会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兴衰变化将会是非常剧烈的。但是，这种优胜劣败的过程，正是这个社会的进步，也是能够充分满足人们欲望的有效方法。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大变革

如果要分析前述"知识价值"的本质，一定会想到这种创造机能的属人性。这种属人性导致了"知识价值社会"的另一个特点——与工业社会有严格区别的特点，即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一体化倾向。

工业社会是通过产业革命正式建立起来的。所谓产业革命，通常是指"十八世纪末在英国开始，十九世纪中叶扩展到西欧、美国以及日本的工厂制工业生产的普及现象"。这个看法是十分正确的。

那么，在此之前及在此以后都曾多次反复出现过技术革新，为何只把这次特别称为"产业革命"呢？这是因为，这次变革不仅"通过技术的飞跃发展而使产业的形态及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人们看到它使社会的基本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所谓基本结构的变化，是指劳动力和生产手段已开始发生了分离。

在中世纪以来的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生产形态是以农民自己拥有土地耕作权和农机具的农业、工人自己拥有工具的手工业以及商人自己拥有店铺及经商用的车马的商业。尽管有许多例外情况，但一般说来，这些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态，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本身拥有作为生产手段的土地及工具的使用

权(这与现代的所有权的概念是不同的)，并因此而被束缚在这些物资和职业上的生产形态。

但是，“十八世纪末从英国开始，十九世纪中扩展到西欧、美国以及日本的产业革命”，由于产生了利用蒸汽机驱动大型机械的工厂制工业，这些生产手段便同劳动力分离了。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生产手段所有者的资本家和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的两极分化更由此产生了。

“产业革命”不仅仅是技术革新或产业形态的改革，而且还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并且，无论是二十世纪初采用内燃机及电力，还是二十年代化学工业发达时，这一倾向都在发展而从未后退过。在这些变革过程中，工厂设备等生产手段的规模越来越大，价格更加昂贵，但从未向个人拥有、自家几个人能够进行运营管理的方向发展过。即“产业革命”以后的技术革新，只是使工业社会的特点变得更加完备突出，而并没有改变这些特点。

然而，今后将开始的“知识价值社会”会是怎么样的呢？在这里，对于不断增加的参与创造“知识价值”的人们来说，所谓生产手段将是什么呢？设计师需要桌子和制图工具，摄影师需要照相机，计算机软件的编制者需要小型电子计算机。然而，这些东西的价格都不是太高，个人也完全能够拥有。即使在技术开发及新产品开发等方面，近年来，不需要巨型研究设施，中小规模的所谓“街道研究所”就能够完成的项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因为，技术进步的方向，正从巨型化、大批量化、高速化等大型技术转向多样化、节能化、装配等方面。

结果，对于从事创造“知识价值”工作的人们来说，是本人的知识、经验和感觉成了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并且这些手段与

劳动力本身已经不可分割地一体化了。

如果今后从事创造"知识价值"工作的人继续增加，产业革命以来不断发展的生产手段与劳动力相分离的倾向将发生逆转，生产手段和劳动力再次结为一体的生产形态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也就是说，将开始向与工业社会相反的方向发展。并且，这种发展将导致产生在第四章详细叙述的那种社会结构变化．它必然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经济组织和国家观。

我所以认为，目前即八十年代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是走向"高级社会"，而是在产生"新社会"，其理由是，这一变化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而是伴随着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及美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是产业革命二百年后发生的又一次重大变化，是可以称之为"知识价值革命"的大变革。

"知识价值革命"目前已经开始

毋庸置疑，建成完整意义的"知识价值社会"，还需要相当长的岁月。在此过程中，某个时期急剧发展，某个时期又停滞不前，有时甚至还会发生明显的倒退逆流。但是，作为大的潮流，社会确实在进行从工业社会向"知识价值社会"的全面转换。

我们把工业社会的起源称作产业革命。然而在产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工业的生产额并没有超过农业，工业中的就业者也没有超过农业。以产业革命为契机，工业(或者说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形态)成了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开始了走向工业社会的进程。

与此相比较，是不是也可以说，"知识价值革命"目前已在

这八十年代开始了呢？当然，这不是说"知识价值"的产量很快将超过工业生产的规模，也不是说从事"知识价值"创造工作的就业人员很快将超过工业。不用说，也没有创造"知识价值"的生产形态很快就将成为社会的主流的意识。这里只是在下述意义上谈这个问题，即，经过八十年代的这一变化，"知识价值"的创造将成为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将开始从工业社会向"知识价值社会"转变的进程。

以资源环境和人口及技术的变化为动因，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将发生变化，结果，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将发生变化。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全面预测在这之后产生的"知识价值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并且，传播其概念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新社会中，肯定将建立与将我们哺育成人的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规范。因此，从考察分析工业社会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许多知识体系已没有作用。为此，至少要对包括工业社会以前的社会在内的漫长的人类社会进行考察和研究。

因此，我们在这里将回顾古代历史，讨论决定人类文明的各种主要因素，并对所谓"文明的犯人"进行探讨。为了使我们的思考对下一个社会作出想象，必须越出工业社会的理论和常识的范围。为此，确认曾经长期存在着具有与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规范的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章 探寻文明的“犯人”

未知的未来

以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契机，“资源有限论”在人们心目中普遍扎下了根。人们已经既不相信资源、能源及农产品是无限丰富的，也不相信它们今后会变得越来越丰富。许多人既害怕偶尔出现的短期性的供应不足造成的戏剧性恐慌，更对向长期的物资紧缺时代发展深感不安。

曾经孕育了“大量消费丰富的物资很体面”的审美观和“节约紧缺的东西是正确行为”的伦理观念的人们的“良知”，对此又作出了机敏的反应。进入一九八〇年，大量消费资源、能源的石油文明已经越过顶峰，开始走下坡路了。战后三十余年时间来一直追求“多、大、快”的大量消费资源型的消费文明，以一九八〇年前后为分水岭发生了逆转，“轻、薄、短、小”成为时尚，朝着多样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最初，将这一动向看作是因价格体系的变化而出现的暂时性变动的观点曾一度占上风。人们认为，由于一九七九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石油价格猛涨至原来的两倍半，因而受其影响大的原材料需求出现衰退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此之后，尽管许多资源、农产品的价格下降，但资源、农产品以及其粗加工制品的需求仍然停滞。甚至在一九八三年以后经济出现回升的情况下，资源、能源、农产品及原

材料的需求也没有太大增长，这些产品的国际价格，出现了所谓“漏底”一般的跌落。

这是与石油文明时代的状况完全不同的倾向，即使同石油危机以后的七十年代的动向相比较，也有明显的不同。

不仅如此，在工业生产及流通运输领域，标准化批量生产、批量流通的发展也趋于停滞，相反，多品种小批量和多样化服务却有显著扩大的倾向。因此，十年前还认为是最合理的“规模经济效益”已不能实现，而多样性的设计、新的技术、特殊的技能、独到的服务等的价格却很高。

甚至在二十世纪人类最为自豪的技术开发领域，作为以往中心课题的大批量化、大型化、高速化的研究开发几乎完全偃旗息鼓，而多样化、省资源化、信息化开始成了主要课题。在艺术领域之中，对追求物质方面的便利和舒适的现代主义的批评和反叛早已出现，现在，它已经在“超现代”的名义下成为主流。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艺术方面，试图消费更多资源能源的欲望趋于消失，而是把主要力量用于满足精神上的欲望。

我认为，这些状况不仅意味着以大量廉价的石油为基础的战后石油文明的衰退，而且标志着十八世纪末开始的工业社会本身的终结。

近代工业社会，是通过十八世纪后期在英国开始，十九世纪中叶扩展到西欧、美国和日本的产业革命建立起来的。产生工业社会的产业革命，从现象上看，是以采用蒸汽机及由它驱动的大型机械，即普及工厂制工业的形式推进的。然而，推动这一进程的精神方面的前提，乃是认为消费更多的物资很体面的审美观，以及认为能够满足这些欲望的有效率的物质生产是正义事业的伦理观念。如果没有这种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以及

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规范，恐怕就不会那么迅速地消除传统体制与社会性利益的对立并使工厂制工业发展普及起来。

我们“现代人”常常把能够提供更多物质财富的东西称之为“现代化的”、“合理的”予以赞赏，而将妨碍这一目标的所有东西斥责为“非现代化的”、“不合理的”予以排除。国家制度、企业组织、教育制度、家庭制度全都如此，概莫能外。由于从我们刚一懂事时起，就接受了工业社会及其社会规范的教育，所以思想上对它连一点怀疑都没有。因此，人们深信唯有建立在工业社会的社会规范基础上的现代文明才是万古不易的，甚至完全相信它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希望更多地消费资源、能源与农产品等物资的欲望淡薄了，这一状况意味着作为工业社会基础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土崩瓦解。它并没有停留在已经开始了的改变商品及生产的形态和技术及艺术的发展方向上，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以这一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为基础建立的社会规范本身。并且，这一变化意味着工业社会的终结，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社会即将出现。

那么，这一新的“下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呢？它的全面形成恐怕需要若干个世纪的漫长岁月。而对这样一个需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建成的社会，仅从几年的变化情况出发作预测，显然是很困难的，也可能是不够慎重的。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仍可获得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因为人类毕竟已经拥有六千年的历史，并经历过几次巨大的变革。

如果能从这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寻找出产生主要的文明变化的各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的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研究，就能了解“下一个社会”的概况。即如果找出了“文明的犯人”，

并掌握了他们的现行表现，就可以大致设想出它的下一个“罪行”及其结果。

“下一个社会”不是工业社会，这已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仅从对工业社会的考察和从工业社会的道德规范中产生的知识体系出发进行研究，是不可能预测和理解“下一个社会”的。当然，用工业社会以前的知识体系进行研究也同样无济于事。这种研究只是能够从中了解文明的各种主要原因(犯人)及其机制，以及它们同各个不同的变革有什么相互关系、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已。

但是，在这一相互关系和作用的模式之中，如果加进目前正在发展的各种因素的变化，就完全有可能提供推测未知的未来社会的线索。尽管这肯定是非常不可靠的方法，但作为处在这一伟大变革时期，又是生活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一的日本人，不正是有义务勇敢地向这一困难的尝试挑战吗？

一、文明的起源和变革

观察社会变化的着眼点

翻开人类的历史，无论谁都能清楚地看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产生过几种不同的文明文化，建立过不同的社会形态，现代历史学将它们称之为历史“发展阶段”。

这一名词的确有点“现代”的沉思。这种以发展阶段将漫长的历史区分开来的作法，是以“人类社会是经常发展进步”的这一所谓“进步史观”为基础的。虽然如此，许多历史学家却仍把欧洲公元五世纪以后的几百年时间，确定为“辉煌的古代文明走向衰退的黑暗时代”。因为从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观上来看，

无论怎样偏袒，中世纪前期也不是“进步与发展的时代”。

不用说，这一结论也仍然还是现代人所特有的价值观在起作用。即人们所以说中世纪是“黑暗时代”，是从现代人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即把增加物资生产和能够消费的物资量作为唯一最大的进步这种工业社会的道德规范出发的。换言之，即中世纪人们的思维、行为准则和社会体制与增加物资是格格不入的。

可是，中世纪欧洲人本身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对于他们来说，物质财富更丰富的古代社会才是“没有神的黑暗时代”。中世纪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及中世纪的社会规范，与现代人是完全不同的。中世纪的人们不是因为无知和懒惰才丢掉了古代的技术和合理主义的思想。他们按照自己认为更重要的目标，热心执著地追求“更进步的状态”，其结果，便抛弃了古代文明的低劣成分。

在探讨新的“下一个社会”时，这一情况是不可忽视的要点之一。在讨论越过工业社会的“下一个社会”时，不能把工业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判断问题的标准。因为我们目前要做的工作是，探讨新的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并且也正是为了达此目的，需要调查了解工业社会以前各个发展阶段上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

立足于上述观点来重新认识历史时，需要有全新的思想。第一点是，不能被一些细微的实际现象所束缚，重要的是要全面把握各个不同社会的基本的道德规范。

在芸芸众生的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事实。不会有所有人都具有一种完全相同的思想、统一行动等现象。因而，无论在任何地区或任何时代，都不是一种审美观及伦理观念统治

一切。即使把观察问题的焦点局限于各时代中号称拥有对其它地区产生影响的文化的发达地区(常常被称为“中心地区”)，其社会现象仍然是纷繁复杂的。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把各个时代的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规定为一元性的作法，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但是，即便在这种多样性的社会里，统一该社会的社会规范应该认为是一元性的。例如，现代工业社会，就是被认为消费更多的物资很体面的审美观，和提供更多的物资是正义的伦理观念所支配的，所以，就能根据认为只有按“一物一价”的等价交换才是正常的流通形态的社会规范进行运营。当然，现实当中也有许多例外的情况。大的如国际间的经济援助，小的如选举时的政治捐款及人们对相扑的偏爱，都是不期待任何回报的赠与。然而，虽说存在着这样一些例外情况，但是，它并不能成为怀疑现代社会具备了把等价交换原则看作正常流通形态的社会规范这一事实的根据。

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是，各个时代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规范。因此，在这里请允许我仅以各个不同社会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时期为例进行讨论。

即使仅就局限于各个不同时代的先进地区来看，具有人类社会和文明典型特征的时期也非常之短。人类史几乎完全是一个从“前一个社会”向“下一个社会”转移的连续过程，所谓具有典型性的时期，只不过是“现实社会与一个社会概念最为接近的顶峰时期”。然而，在这里，就它是依据于一种社会规范的社会形态得到最充分实现的时期这个意义来说，正是这个短暂的顶峰时期才十分重要。

然而，即使这么说也遗留着问题。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

下，上面所说的这一典型的时期或顶峰期，作为一个现实的历史时期是不存在的。在组成社会的许多领域中，如同后面所叙述的那样，既有抢在变化发生之前采取措施的先进领域，也有不容易发生变化的后进领域。因此，当后进领域好容易建立起某种社会规范时，先进的领域已经开始向“下一个社会”变化，所以，在多数情况下，社会形态没有纯粹的形式。

毋庸赘言，我在这里不是指进步的人种与保守的人种在各个不同领域中的差距。如前所述，只要分析的是社会规范，就不会是某一个领域中个人或集团的行动迟早的问题。但是，因为不同领域中的先进性与落后性分别都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所以不能予以轻视。在这方面，重要的事情是，要注意那些具有几十年、有时甚至是上百年、二百年差距的、在各种表面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一致性。

以往的历史学，从来没有拘泥于这些不同领域变化的迟早，即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变化及其完成的时间差。而所谓现代历史学，就是由于过于详细地划分并限定了自己研究的对象领域，因此在这类问题上挡住了自己的视线。例如，政治史、经济史、技术史及美术史，只要能单独作为不同的专业领域独立并有独特的时代区分标志和自己的理论体系就行。

这种根据对象领域来详细划分的历史研究的手法，对于加深特定领域的研究是有利的，但它不便于进行整个时代的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对于探寻一种社会规范及其“犯人”甚至是有害的。因为那些对综合研究不热心的历史学家们，以“时期相近”为由，将先进领域向“下一个社会”的变化与后进领域的“目前的社会”的实际现象混同起来了。

在探讨社会形态的变化时，认为不要过于拘泥于时代划分

的“特点”的理由之一，正是这一点。因此，在以下的历史叙述中，我在时间问题上就大胆地采取了粗略计算的办法。

绿洲农业和城市国家——原始时代

回顾人类的历史时，从什么地方开始看作是一个“历史时代”，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然而，如果从本书探讨人类的文明和社会之形态变化，追寻在其中起作用的社会规范和创造这些规范的“犯人”这一目标出发，不妨从人类文明和社会稳固建立的时期，即农业兴起的时候谈起。

从远古开始，人类就掌握了许多技术，但农业的兴起则在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一部分学者重视狩猎和捕捞技术的进步，把人类掌握了这方面技术称之为“第一次技术变化”，但我觉得这种提法似乎不够慎重。狩猎与捕捞的技术在动物界也是存在的，文明开化以前的人类也具有。否则，人类一定早就灭亡了。不过，人类所掌握的技术，无论是就使用石器与木器这一点来看，还是就有组织地进行活动这一点来看，与动物的本能技术是截然不同的，但推测农业社会以前人类的狩猎和捕捞活动达到了怎样的技术水平和组织程度的史料实在太少。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指出，在农业以前还有畜牧业，畜牧社会的出现才是人类文明的起源。的确，畜牧业是在人以外的动物界所不曾有的生产活动，就其需要组织性、连续性、计划性这一点来看，是一种名符其实的文明的活动。

但是，要推测农业兴起以前的畜牧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技术文明和社会形态的形成是很困难的。我们所了解的畜牧社会，不是农业社会开始以前的畜牧社会，而是农业社会出现

以后存在于其周围的畜牧社会。至于表明农业社会以前的畜牧业与存在于农业社会外围的畜牧业相同的证据，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

与其相比，很明显的是，农业的出现形成了与以前根本不同的人类文明和社会。由于有了农业，人类从而能够长期定居和有计划地生活，正常的有组织的生活由此开始。农业的兴起，无疑成了建立以巨大建筑物、大型工具和连续性为前提的社会组织的基础。因此，我们把从事这种早期农业的时代称之为"原始时代"。

话虽这么说，但是若把几千年前——甚至是一万年以前——就开始了的早期农业，同现在的或古代及中世纪的农业同样看待，显然是错误的。例如，阿尔温·托夫勒说："目前正在进行着的信息技术的革新，是继农业技术的发现和机械制造业的开发之后的第三次浪潮。"然而这是易于引起人们误解的新闻记者式的说法。人类掌握的农业技术，不是在远古时代一次学会了的简单技术，在社会的影响方面，也并不是始终一致的。

早期的农业技术，恐怕只有播种和收获而已。然而到后来，还要再加上保护播下的种子和收获的作物所做的事情——与动植物争夺作物的工作。

实际上，原始时代的人们在农业生产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耕翻土地——即把土地翻过来使之产生与空气和水分混合的作用，直到如今还是个疑问。从在各地的遗迹中出土的极简陋的农具来看，一般推测，当时或是完全没有耕翻土地，或是仅仅是在地上捣一个小洞，把种子埋在里面而已。定期浇水、施肥是很久之后才有的技术，人工灌溉设施等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最早进行的农业生产还很难说是真正

的耕耘。

在这样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能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仅限于有自然水利条件的松软的土地，即河流两岸及绿洲地区。因此，远古的文明首先产生于河岸及绿洲地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于是，居住在这些小块分隔开的可耕地上的人们，各自形成自己的城市国家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尽管如此，农业的出现赋予人类以有计划地生活和生产的思想。因为为了持续进行农业生产，必须将收获的一部分产品作为翌年的种子保存起来。

显然这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与今天的农业相比，当时需要保存的种子量要多许多倍。据乔尼布普·道格尔推算，在公元十世纪前后的法国，小麦的收获量平均只不过是播种量的三倍。杜庇根据公元九世纪前期沃尔芬宾特尔的文章推算的数字更小，麦类作物几乎都在二倍以下。河岸及绿洲地区的土地的生产率一般来说较高，但即使这样，原始时代的收获量也不会大大超过中世纪的欧洲。并且，接连不断的灾害及异常气候、病虫害、外敌的破坏等造成收获剧减的时候肯定不会少。

在那样一种条件下，要把全部收获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留作来年的种子，当然需要有很强的自制能力和强制手段。甚至到十八世纪享保灾荒时，为留下一袋麦而饿死的伊予地区的作兵卫还被称为"养农"，不能想象远古的人们能情愿留下收获量的三成以上作为种子。我认为，这一保存种子的必要性，对于原始社会城市国家的形成和国王权力的产生，特别是"国王的再分配机能"的产生，一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由于农业的出现，人类的定居文化和结成固定组织的活动得到了飞跃发展，但并不是很快就建立起了物资丰

富的社会。即使在引入农业的初期，曾产生过暂时性的物资丰富的社会，若干代人之后也一定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消失了。在非常有限的河岸及绿州上从事着“幼稚的”农业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不得不奉行对物资的严厉的禁欲主义，并始终处于警惕外敌侵略的紧张状态。

原始社会的文化，是由这种技术、资源及外敌的关系决定的。有限的可耕地形成了城市国家。贫薄的收获和保存大量种子的必要性加强了“国王”的权力，因为他们在共同体内部必须强制实行无偿的供给或再分配。

这一时代，在共同体内部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商业交换，物资的交换首先在共同体相互之间发生。设有“市”的地方被称之为“街”即“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场所”，与仅供人们群居的“村庄”相区别。这说明，在日本，物资交换首先不是在共同体内部，而是在同外部之间开始的。当然，这种交换也还谈不上是等价交换。

然而在物资方面被迫实行禁欲的环境中，人们的注意力与其说集中于物质性的方面，不如说更注意精神生活方面。产生认为“大量消费丰富的物资很体面、节约紧缺的物资非常正确”这种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人类的“良知”使原始社会的人们相信：关心物资是卑劣的坏事情，而利用大量时间进行思考才是一种美德。

这样一来，原始社会的人们的宗教信仰开始萌动，把精力集中在超自然的偶像上。原始社会，城市国家时期的美术绝对不是写实的。无论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是西印度或黄河流域，都能够看到明显象征性的人物及动物像，以及陶器和铜器上极端抽象的图案。就写实这一点来看，狩猎时期未开化人所描绘

的洞窟画倒有许多十分精美。

没想到，开创了农业文明，建立了坚固的城市城墙的原始社会的人们，虽然具有描绘那么精致的抽象图案的技术，但在写实技术方面却显著低于未开化的原始猎人。这一时代的人们，一定是认为，比起客观的写实来，思辨性的象征意义的以及抽象化了的图案有着更加高贵的美感。

产生了“古代社会”的“农业革命”

在几千年之后，一场大的变革结束了。耕翻了坚硬的土地，开发了将河水引到干燥地方的技术，找到了扩大可耕地的方法。

创造了这一文明开端的“犯人”究竟是谁呢？没有人能明确指出来。也许是偶然地发现了资源，也有可能是由于某些天气条件的变化。组织的发达尤其是个重要的嫌疑犯。因为在埃及，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尼弗尔太提王妃时代，就已成立了早期的不同机能的组织。

但是，第一个“嫌疑犯”仍旧是技术。公元前十五世纪初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及西北印度，就开始在城市内及河岸和绿洲地区建立了水渠，公元前一四〇〇年前后，铁器也出现了。或者说，也即是在这些小地区内积累的技术由于不同机能的组织的发达而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从而使农业耕地有了飞跃扩大。

但不管怎样，灌溉事业的普及使得在干燥土地上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可能，而铁器的发明在开发森林及在坚硬土地上进行的耕作中发挥了重大威力。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铁是非常贵重的物品，但人们并不是傻子，他们没有把易锈的金属只用作武

器和祭器。

这是农业技术方面的一场重大革命。在此之前只是在自然条件所能允许的土地上种植植物的人类，由于发明了铁器，对土地本身进行改良，“开垦出了”可耕地，所以它是一场超过了在工业领域中引入原动力和大型机械的产业革命的变化。

从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前后开始，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接着是在印度西北部和中国黄河流域开始的这场“农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为之一变。在河岸及绿洲中孤立存在的城市国家的周围，出现了星罗棋布般的“农村”的广大地区，人类社会自此逐渐发展成物质财富丰裕的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加促进了物质财富的交换，同远方的物资交流也开始出现。于是，这一状况产生了第二个重要的变化，即交通手段的重大进步。利用马匹的技术和行船技术因此而发达起来。

游牧民和渔民的生活也起了变化，出现了牵引着大批役畜的商队和张帆驾船的水运商人，他们虽然有时会送来异国他乡的珍品奇物，但有时又发动暴力袭击。这种事情动摇了人们的“良知”，并使人们的目光投向物资，使人们树立起如实观察事物的思想。用剩余产品同外国交换产品的人们，当然具有深入观察了解物资的习惯。此后不久，产生了如实反映客观事物的写实美术，培育出了分析探讨事物本质的科学思想。

同时，对物资的关心导致了对创造出该物资的土地的关心。闭塞地生活在孤立的城市国家的人们，开始以支配土地为目标，向周围地区扩张势力，不久，又以控制商业交通道路为目标，无限制地膨胀起来。城市国家变成了区域国家。

在人类历史上，从公元前十世纪前期开始，就存在着赫梯

人①、古巴比仑、埃及新王朝等建立了巨大统治版图的“国家”。但在其初期，只不过是“由统一的国王统治着数个城市国家”而已。上述意义上的区域国家的成立，在西方是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建立的亚述帝国、在印度是公元前七世纪前后的摩揭陀、拘萨罗等四强时代、在中国则是时间与此大体相同的春秋时代前期。孔子所说的：“虽说古之周(朝)很昌盛，但比之今天春秋七雄之一还要小”，可以说表现了从城市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转换过程。

但是，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强制他人劳动以获取剩余产品的生产形态的出现。对物质财富具有强烈占有欲并从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中感到幸福的人们懂得，扩大可耕地的可能性和远距离商业交易的发达，使每一个人的劳动可以获得超过本人生存需要的物资，即出现了剩余生产。于是，他们就驱使一些人从事生产活动，仅给其以维持生存的物资，而他们自己则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资。结果，将这一事实制度化的奴隶制度，便广泛地建立起来了。

在欧洲、中东、印度和中国，普遍发达的奴隶制度都是其古代史的重要特点。过去的历史学家们曾推测，古代社会的人一定十分残忍，他们大多严酷地驱使奴隶干活。然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几乎完全否定了这一推论。要想建立奴隶制度，就必须具备足以使奴隶劳动从事剩余生产的资源与技术方面的条件，但只靠残酷虐待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有人认为越是古代社会人越野蛮，因而有许多毫无人权和生存自由的奴隶。这只不过是把权力平等和人道主义与进步史观联系在一起的特

① 即指小亚细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的古代部族，一般认为属印欧人的一支，约公元前十七世纪由塔巴尔那建成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译者注

殊的现代主观主义的观点。

反过来说，从生产形态方面来看，奴隶制的广泛发达是具有“古代社会”特色的产物。在以往的历史学中，“古代”这一名称通常是指中世纪以前的所有历史时代。但是，站在以社会的发展阶段这一标志来划分时代的观点上来看，这是一种极为笼统的概括方法。在“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之间，有农业形态的急剧变化，有以此为基础的商业的发达，有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并且，在其最深层，有人们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即价值观的一次巨大变化，还有社会规范的重大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原始社会”与“古代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就象“中世纪”与“近代社会”完全不同一样。

特别关心物质财富的古代社会

古代社会，是物质财富相对丰富的时代，也是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时代。对于生活在古代文明的先进地区(文明的中心地区)的人们来说，甚至在他们的记忆之中也能经常确认，物资比以前更丰富了，物资的种类更多了。用一句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能够亲身感受到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古代文明最为发达的中心地区——地中海沿岸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以及中国的相当广阔的地区，一般市民(自由民)生活物资的丰富程度就超过了今天最贫困国家的水平。并且，在他们那里，经常在几十年当中就出现新的交易对象及新技术，过去不曾见过的物资能够为一般庶民所拥有的现象也每每发生。

人们的“良知”对这种现实生活作出了敏感的反应。古代社会的人们对物资越来越关心，认为拥有更多的物资才是幸福

的。

有许多古代故事都讲到帝王们花天酒地极端奢侈，而普通老百姓各自都勤奋生产积蓄财富的情况。在这些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当中，伟大的国王必定是大富翁即是腰缠万贯拥有无数财富的人。对他们的一般性评价，似乎是由财产之多寡决定的。当然，另一方面，斯多葛哲学及墨家的哲学思想虽然对这些“现代风俗”进行了批判，但它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种留恋过去的“原始社会”的怀旧情绪。社会风气中伊壁鸠鲁斯学派的享乐主义到处传播，并朝着法家的实用主义方向发展。

关心物质财富，以拥有大量财富为幸福的人们，当然不愿意廉价卖出自己所有的物资而高价买进别人的东西。当所有的人都为追求最高价格而展开竞争时，等价交换的原则就随之产生了。这即是古代社会的一个社会规范。并且因此而能够正常并且大规模地开展商业活动。

在古代社会，商业活动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在下列史实中我们也能清楚看到这一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① 期间，斯巴达及其同盟军曾长时间地包围封锁了雅典，但是，由于雅典已用坚固的城墙同比利牛斯外港联结起来，因而不但没有出现物资的紧缺，甚至也没有给工商业活动带来障碍。人口三十万以上的城市，如果想在没有周围农村的供应的情况下维持几年的生活，就必须有大规模的运输能力和工商业收益。

城市人口正是因此而膨胀起来的。据说，在古代社会的兴盛时期，罗马及长安的人口已逾“百万”。尽管这个数字尚有讨论的余地，但如果考虑到当时世界人口已达到两亿几千万，那

① 指公元前四三一——四〇四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发生的战争。——译者注

么是完全有可能建起这种巨型城市的。这种大城市的发达，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和手工业的繁荣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了发展商业繁荣城市，货币是不可缺少的。在古代社会，铸造货币和保持货币信用是“国家”的重要任务。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同时谋求统一货币的历史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卡塔戈这样的商业国家，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就发行了一种用毛皮制作的“兑换纸币”(是否应称皮币呢)。

古代人不仅格外喜爱并信任货币，而且也认为它有某种程度的资本机能，用它来获取利息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中国，自战国末期的范蠡以来，有不少关于通过商业和放债积蓄了巨额财富的人的故事，其中大部分是充满尊敬之意述说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其所著《史记》中特意增添了“货殖列传”一节，对善于生财聚富的人们表示了敬意。前汉兴盛时期，汉武帝时代的人们一定十分憧憬致富之举。顺便说一句，“货殖列传”在《汉书》中还有，但在南北朝时代编撰的《后汉书》中就没有了。

在欧洲，希腊的神殿就是利用金钱借贷来赚钱。公元七九年去参观维苏威火山(在意大利境内)爆发而去世的维斯佩申，据说是位具有高尚品德的人物，但他洋洋得意地写道，“利息的标准为年息百分之五”。如果把稳定的物价作为前提，这一比率与现代的利率水平相近。古代社会也和今天一样，认为货币是有益的财产，不止如此，甚至是把货币作为资本看待。

除了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努力发展经济以外，重视物质财富的古代人所表现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写实美术和“科学意识”的发达。

过去，人们倾向于认为精致的写实美术是欧洲，特别是希

腊、罗马文明所特有的产物，古代东方美术中缺少这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最近以秦代兵马俑为代表的考古新发现，证明了在古代社会的兴盛时期，中国也大规模地存在着丝毫也不逊色于古希腊、古罗马的精美的写实美术。于是，基于这一事实，人们已开始认为中东及印度存在的写实美术未必就是受希腊文明的影响而产生的艺术。

这一情况证明，受惠于丰富物质财富的人们，不论其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增强了对物资的关心，从客观如实地观察及写实中感受到了美的存在。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深入观察客观事物的人，他们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就事物不同的形状及运动的原理和原因进行探讨，即萌发了“科学意识”。

就这一点来说，以往的学说就不免有点过于强调希腊文明的科学性之嫌。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医学、农学、理学、逻辑理学等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并具有理论性的内容，古代印度的数学及化学也具有毫不逊色于希腊的水平。与写实美术一样，“科学意识”也并不是欧洲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东西，而是关心物资财富的人们共同具有的精神现象。

在古代社会，不仅在经济原理方面，而且在美术及科学的领域中，也富有所谓“合理主义的近代性”。

以扩大物资生产为目的的古代国家

在这样的古代社会中，要求国家发挥的作用也是“近代性的”。第一点作用是为扩大、保卫生产物资的领土和运送这些物资的商业通道而进行的军事活动。因此阿尔瑟西兹王朝的波斯、

希腊的各城市、罗马等地也都将强有力的军团和舰队派遣到遥远的地方驻扎。印度的孔雀王朝①及巽加王朝的国王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中国的秦、汉帝国为保卫领土修建了延绵几千公里的长城。汉武帝执掌朝政后，又派遣卫青、霍去病率军队成功地控制了西域商路。

在健全的古代社会，兵士是通过专门的征兵制招集起来的。但是，古代国家的士兵都有强烈的物欲，并且具有满足同胞们的物质欲望的使命感，战斗力非常强。希腊人曾以少数兵力击溃了“蛮族”②的大军，罗马军团则自称无敌于天下。汉武帝时代的汉朝军队被誉为“一个人完全能够抵挡三个狄夷”的军队。高水平的文化和经济必将导致军事力量的强大，这是古代社会并且也是近代社会的特色。

“国家”的第二个作用是，增加物资生产、降低流通费用。为此，国家采取了与今天相同的公共事业的形式。古代国家，不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十分热心于治水、兴修水利、修筑道路、港湾、水渠等公共事业。众所周知，波斯及罗马修建的水上通道和公路十分出色，古代波斯人及罗马人为了整个地中海海域的运输和补给而修建了港口设施。

在古代中国，也大规模地推进了治水及水利事业，并统一了车体宽度，修建了公路。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开凿了连接华北和江南的大运河。在其建成后的二千年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再也不曾修建过拥有同样宽度和长度的内陆运河。

“国家”的第三个作用，是稳定物价和进行公平分配，即保

---

① 古代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译者注

②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日耳曼人、克勒特人等其邻族以及其它亚洲民族的侮蔑称呼，这里指日耳曼人的军队。——译者注

证等价交换原则的实行和实行公正的税收负担。为此，必须制定成文法并严格实施之。古代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是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法典及摩西十戒等。其法思想的继续发展完备，在欧洲是从公元前七世纪，在中国则是以公元前五世纪法家思想的确立开始的。最后形成了集大成的罗马法、律令制度及印度的摩奴法典(公元前二〇〇年前后形成)。

与此同时，租税问题也被明确提了出来。重视物资的多寡并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人们，当然不会对租税问题掉以轻心。汉武帝时代，中国发表的堪称世界上最早的财政论的《盐铁论》，就是其突出表现。从汉帝国对盐和铁实行专卖的例子中可以了解到，古代国家不是实行单一的地租税制，工商业也是国家的重要财源。

上述这些“国家”的作用，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十分类似。如果在这里再加上古代社会末期成了重大问题的社会福利问题，那么，可以说除了教育以外，现代国家所具有的一切职能，在古代国家时期也以大体相同的目标执行着。

生长在工业社会的人们也许会说：“国家当然应该是那样的”。然而，古代国家的这种状态，无论是在其之前的原始时代，还是在其之后的中世纪都是不曾见过的。

相反，原始时代的“国王”们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宗教事务，在古代国家中却显著地缩小了。

古代社会也存在色彩浓厚的宗教活动，并作为“国家”的惯例举行祭典，但其内容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仪式，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一种娱乐性质的活动。在原始时代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传达神意及占卦，到古代国家已不大受重视，并且神官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也降低了。因此，“神”的数目急剧增加，对异教徒

也很宽大。

在当时的罗马，各种宗教都传了进来，后来甚至容许象埃勒加伯勒斯(在位时期为公元二一八——二二二年)那样奇怪的异教徒色彩的人当皇帝。在本来就是“不信神的无畏的人民”的中国，不仅完全不相信神，甚至连儒教道德也受到注重实利的法家思想的压抑。甚至出现了秦始皇活埋儒生，汉高祖在其王冠中撒尿的情况。不仅宗教，一切非现实的意识形态都受到了蔑视。甚至在宗教气氛最为浓厚的印度，也容许多种宗教并存。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公元前二六八——公元前二三二年在位)及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一世(公元一四四——一七二年在位)等皈依佛教的国王，也不敢镇压印度教。国王的信仰，虽然通过国王个人的权力变成了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但还没有发展到成为统治国家的原理的程度。

在具有尊重物质财富，如实表现自己所见事物和科学精神的古代人看来，宗教并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情。古代国家所镇压的，只是那些否定他们的现实主义思想和客观的社会规范的原始时代或中世纪式的教义的宗教。

古代文明的发展与局限性

认为拥有更多物资体面的审美观、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社会规范、如实反映所观察到的事实的现实主义和试图调查其原因的科学精神、以及以军事、公共事业、保证公平交易和租税的司法这三个方面为主要作用的国家等等，都是古代社会同现代社会相类似的地方。但是，在另一些方面二者却迥然不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生产形态的不同。

在古代的文明区域，所有生产领域都在相当程度上采用了

奴隶制度。这方面有着最准确记载的是西洋各国(欧洲)。特别是在古罗马帝国时代，从农业耕作到手工业、驾船、甚至民间艺人及学问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奴隶的存在。据蒙塔内尔记载，在公元二世纪的罗马市，连普通庶民家庭最少也有一个奴隶。当然，在罗马帝国，除了意大利半岛以外，奴隶好像没有那么多。

中国及印度的奴隶制度虽不象欧洲那样典型，但一般认为也有相当数目的奴婢及家奴的存在。虽不能说他们处于同希腊各城市及罗马帝国的奴隶一样的境地，但可推测其发挥的是同后者相类似的作用。总之，说奴隶制生产是古代社会的唯一生产形态是错误的，但说它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形态则是正确的，这可以说是古代社会的特点之一。

过去，我曾设想过原始时代的国家可能也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情况类推一下，为了建造象埃及金字塔那样的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巨型建筑物，一定动员了几十万奴隶。然而，现在这种论点几乎完全被否定了。当然，当时是有奴隶的，但数目非常少。建造金字塔及叠级方尖塔的，是对拥有和消费物资不感兴趣的原始时代的人在宗教和地区性团结方面表现出的巨大热情。

要建立奴隶制生产，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技术性条件，即驱使劳动力生产所得的物资要比养活奴隶所消费的物资多得多；二、资源条件，有能够适合奴隶制度的劳动场所，尤其是存在广阔的可耕地；三、组织条件，即能够监督那些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奴隶，并通过组合搭配完成生产的全过程。在农业技术简单、可耕地非常有限而又没有职能组织的原始时代，奴隶制度是难以作为产业制度建立的。大量使用那些缺乏自觉

的劳动热情和技术上、经营上的改善能力的奴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奴隶制度呢？现代人总是从现代的感情出发，容易把它想像成宛如十八世纪曾在美国南部存在过的那种奴隶制度一样的东西。但是，古代人的感觉及行为方式与现代人是有很大差别的。所谓古代的奴隶制度，与其说是人们的“身分的差别”，不如说是人们的“观念性的限制”。因此，许多奴隶与其说是劳动力，不如说他们是劳动的工具，一种装有原动机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石井威望把奴隶作为一种“能源”的见解颇引人注目。

实际上，如果把教育奴隶及娱乐用的奴隶作为例外，那么，古代社会的奴隶既不能自主地劳动，也不能自己作出独立判断。在这一点上，与其说是劳动者倒不如说更近似于役畜。事实上，在古罗马帝国时代，曾将在农场经营上是增加奴隶有利还是增加马匹有利这样一种选择，作为重要的经营问题进行过讨论；而在古代中国，也曾记载过这样的交换比率，即五个奴隶换一匹马。

公元前七、八世纪，在中东、印度西北部和中国黄河流域发源的古代文明社会，在不断扩大其疆域的过程中延续了近千年。在此期间产生了许多新技术，文明的中心地区出现了转移，政治势力的盛衰兴亡也反复出现。然而，上述古代的特点一直在深化扩大，从未出现过倒退或变质。

人们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土地改良，扩大生产，物资交易不断扩大并向远距离发展。写实美术变得更为精美，探究事物形态和现象的科学进一步发达。于是，生产形态中的奴隶制度的规模越来越大，遂成为社会的一般形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的疆域也在扩大，终于产生了巨大的统一的国家。在欧洲，以亚历山大的暂时性的统一为中继点，建立了包括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在内的罗马帝国。在中国，经过战国五强争霸之后，由秦、汉帝国完成了统一国土的大业。在印度，孔雀王朝和巽加王朝实现了全国统一。并且，这些巨大的国家都十分热心于扩大和保卫国土、确保通商道路、开展公共事业以及公正地执行法律。

总之，依据对丰富的物质财富感到幸福的审美观及其视使之能够实现的事业为正义的伦理观念，将等价交换原则作为社会规范的社会，曾朝着不断巩固的方向发展。这样一个经历了约千年时间的，无论是经济方面、文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取得显著发展的时期，之所以被称之为“古代”这样一种“社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但是，这种必须依靠于奴隶制度这一生产形态的古代文明，有着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如果把奴隶作为“劳动力”，那么，它确实是一种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如果将其作为一种“装有原动机的工具”来看，那么他还会是一种需要花费管理费用及燃料消耗量大的工具吧。不论允许怎样粗暴地使用，但为了长期使用还是需要挡风遮雨的住处，并且需要大量粮食。每天还要给八小时睡眠时间，并要处理大量的排泄物。甚至还有反叛暴乱和怠工的危险性。必须依赖这种效率低下的动力源的技术体系，正是古代文明的局限性所在。

在写实美术、科学及哲学领域，古代文明显示出了较高的水平。土木建筑及一部分手工业的技术也十分高超精湛。但是，一般性产业的技术水平，则远远没有达到同等程度。因此，古代文明对土地和奴隶的依赖非常突出。这也就是古代文明“发

展的局限性”。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每个人还在继续追求物质财富的丰裕，结果，分配问题当然就成了重要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在古希腊的各城市，还是在古罗马或汉朝，发展速度一放慢，社会福利问题就会作为“国家”的重大课题出现。并且它还有无限扩大的倾向。因为在追求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审美观中，包含着要求公平分配的内在要求。并且这种“公平”的标准，常常是主观随意的。

在受追求物资丰裕的审美观支配并拥有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社会规范的社会里，扩大能够进行更廉价生产的生产形态，以及让更便宜的其它产地的物资流进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一定阶段里，这是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另一方面，过去的自耕农业及文明地区的一些没有效率的生产也因此而接二连三地垮台了。文明地区的人们，为获得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生活上的便利而流入城市。并且为了体面和安乐而寻找能坐着工作(手工业)的职业。其结果，适合于自耕农业的大家庭和地区公社土崩瓦解了，与手工业相适应的小家庭和疏于交往的城市社会扩大起来。

这一事态也意味着家庭福利和地区福利的消失。正当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丰裕和生活的便利，为找到手工业职业而来到城市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在境遇不佳时借以逃避的安全的小社会。

但是，生长在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且拥有文明之国的市民权及国籍的人，未必就具有适合于在城市从事手工业的才能、性格和命运。社会的需求，如果能够急剧地转向人们希望就业的产业领域的产品当然很好，然而，事实上并不能总是出现这

种情况。很明显，如果对手工业行业的产品及服务的需求并没有什么增长而希望从事手工业的人一个劲地增加的话，势必出现大量的落伍者。留给这些已经没有可以逃避的小社会的人们的道路，只能依赖于可以说是“最后的财产”的市民权(国籍)所带来的政治力量，要求得到公共的福利。

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给这种要求赋予正义感的学说，并会出现想乘此机会扩展势力的政治家。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政治家是一帮与这些福利适用范围等无缘的富翁。已经在经济上得到满足的人，因其具有优越感和追逐名誉的欲望，易于同情那些贫困的人们。同时，企图通过反对这样做来获得富有才干和幸运的人们及今天仍滞留在那些没有效率的自营业中的顽固派的支持的政治家也会出场。当达到追求物质丰富的社会的顶峰时，新旧之间的对立必然会在这种形式下激化，两方面的政客就会拼命活动起来。

但是，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是，家庭和地区社会的瓦解将导致军事实力的下降。这不仅是从事城市手工业的人不象在农村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那样向往当兵这样一个纯体力的问题。因为脱离了大家庭和地区社会，已没有必要再顾及家庭的名誉和在村庄里的面子的人们，不愿再冒着生命危险去奋斗了。自诩无敌于天下的古罗马军团，夸口“一人能抵挡三个夷敌”的汉朝精兵，随着农村社会的土崩瓦解，战斗力逐渐削弱。还在勉强支撑国家军事力量的，只剩下了优良的装备和比较稳固的组织形式。

这样一来，古代社会从可称为其最高峰的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开始，就遇到了政治性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古代文明已开始出现质变现象。作为具体的政治现象有，印度孔雀

王朝的倒台（公元前一八〇年），古罗马共和制的崩溃（公元前二七年），汉帝国被疯狂的王莽篡夺了帝位（公元八年）。

时隔不久，这一危机便被新的体制克服了（印度的情况稍有不同），其方法是通过更强有力的皇帝的权力扩大市民权和重新组建以雇佣兵为核心的军队。此后，无论是古罗马还是汉朝，市民权（国籍）都被无限制地扩大，并被廉价地卖给周围的异民族。经济上或军事上都没有什么作用的市民，作为取得福利的代价，不得不忍受市民权的贬值。

文明衰亡的症状群

经过重新改组的古代帝国——罗马帝国、后汉王朝、印度的巽加王朝，都是堂堂正正的大帝国，有时还显露出超过前代的辉煌业绩。然而，古代文明本身显然已越过了顶峰时期。死亡来临前的内部的分崩离析确实正在迅速地发展。其第一点是资源环境恶化，特别是土地的局限性和能源不足。

古罗马、汉帝国或者是孔雀王朝，在它们的疆域急剧扩大之时，也就达到了“世界的尽头”。在其周围，或是不毛的沙漠，或是寒冷的原始森林，或是人类无法居住的热带雨林地区；总而言之，都是一些在当时条件下，人们在感觉上和技术上无法利用的土地。古代的文明人发展到公元前后，就失去了物理意义上的新边疆。在那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直到黑德里埃纳斯皇帝执政时止，古罗马帝国一直在北方和东方进行领土扩张，但结果却没有获得能够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成果。因此，在其之后的安托奈纳斯·派厄斯皇帝主动放弃了相当多的领土。不论什么样的帝国主义者也不可能为了保卫那些不能生产人们需要的物资的地方而长期承受巨额负担。后汉王朝及巽加王朝在

铸成错误事态之前就贤明地认识到占有土地的局限性。例如，后汉帝国抛弃将军班超，放弃了西域大片土地。

无论在那种情况下，都已不再采用通过扩大领土使物资量增加的办法。这不仅意味着资源的有限性，也意味着本国生产的粮食能养活的奴隶也是有限的。如果说奴隶是装了原动机的工具的话，那么此时古代文明已经到了连增加工具也很困难的境地。

然而，比这更严重的问题是能源危机。作为古代人类的唯一的能源是森林资源，而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开始，它就急剧地枯竭了。从具有最古老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到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在北非地区，这一现象尤其显著。腓尼基人曾经用其制造过大船队的黎巴嫩杉树林、养育过汉尼拔率领的大象的突尼斯大森林、奥林波斯的神们居住的希腊大山里的广阔的森林等，其辽阔壮观的身姿都逐渐地消失了。

在中国的噶尔多斯地区森林消失了，荒山秃岭甚至进一步扩展到了华北。印度西北地区，也开始变成干燥的沙漠，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区域即使不是象今天所看到的这种严重的状况，至少已经变成了非同往日的干燥的土地。

为何会变成那样呢？究其原因，有各种说法。既有说是气候条件变化的观点，也有人认为是过多地采伐木材所致，还有人将其归罪于这些国家周围的未开化人类实行烧荒种地的农业方法。这些恐怕都是其中原因之一吧。但最大的罪过是放牧妨碍了树木的再生。而最凶残的破坏者是老实温顺的绵羊。

由于森林枯竭引起的能源不足，给产业活动以毁灭性的打击。金属生产和烧砖业也随之减少，农机具也开始短缺，水利灌溉设施的整修也变得困难了。当然，船舶和房屋的建造也难

以进行。不仅工业、农业、商业和建筑业也不得不一起衰退。

执着追求丰富物资的古代人，在这一事实面前一定会感到绝望，因为用当时的技术是不可能制造出替代木材的能源的。文明的重心开始向森林比较多的意大利北部、希斯帕尼亚、加里亚、长江以南、四川以及印度中部转移。

发达地区的人口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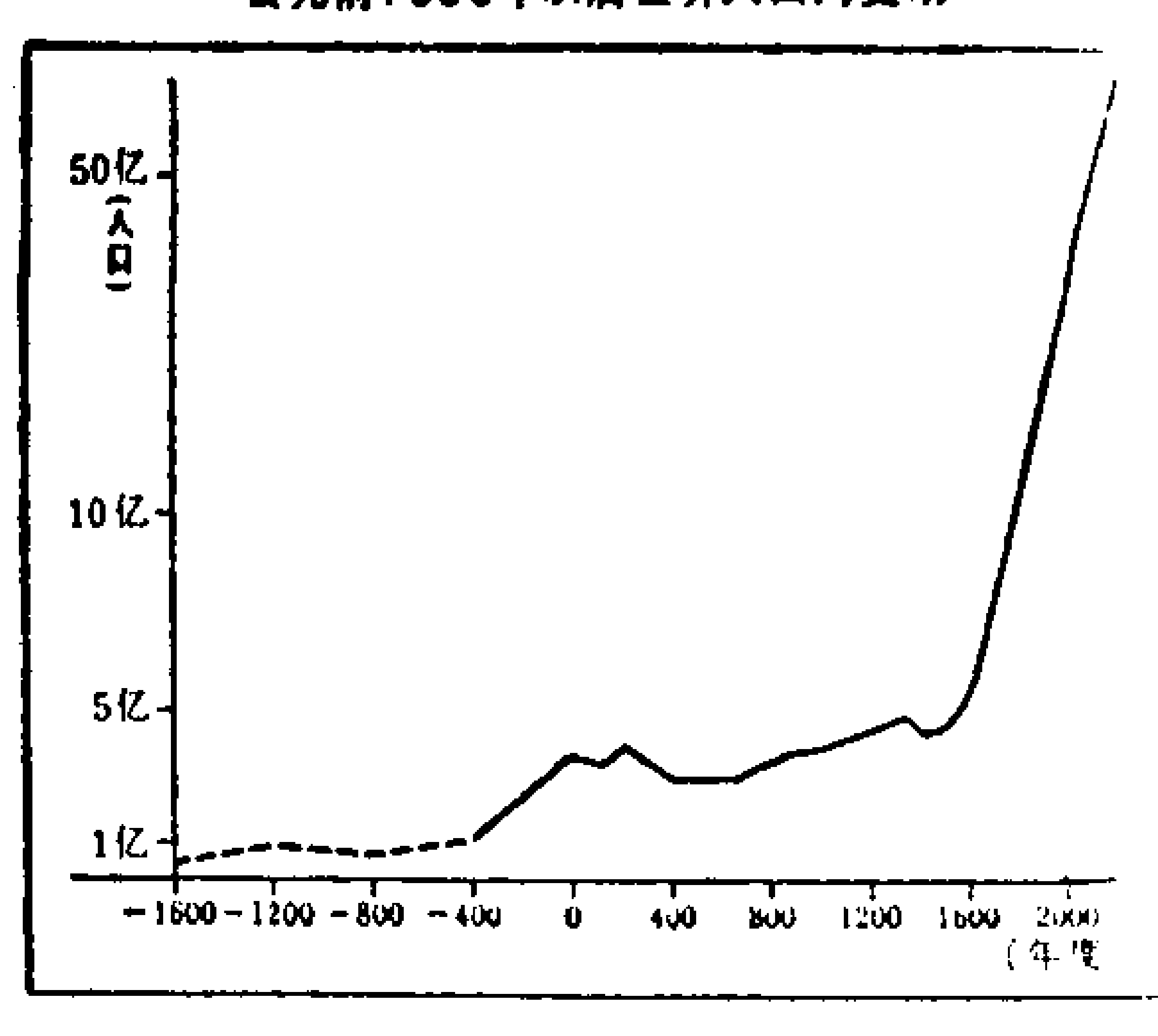
第二个症状是发达文明地区的人口减少了。比拉蓬在肯定了迪朗的推算的同时，又根据他所计算出来的世界人口数据推算，到古代社会正式形成的公元前八〇〇年前后为止，世界人口总量至少有四百年以上时间稳定在一亿一千万人左右。在此之后转为增加，到公元前后的最多时期达到了近三亿人。即八百年间约增加了一倍半。特别是在地中海沿岸、印度中央地区、中国的黄河流域等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人口的增加尤其显著。至少增加了五倍，有些地方甚至增加到十倍。即在“能生活的发达地区”，人口的增加被看成是“健康的情况”。

但是，从公元前一世纪初开始，发生了发达地区人口骤减，相反在其周围落后地区人口增加的逆反现象。世界总人口在经过公元后一世纪一个小小的谷底后再度增加，在公元二世纪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就其内容来看，便是这种人口增长的地区性替换。然而，在此之后的约四百年时间里，人口持续地急剧减少。世界人口恢复到公元前后的最高值，是在发生一种“次近代化现象”的十一世纪以后的事情。

当贫穷的落后地区人口进一步迅速增加的同时，发达地区的人口却日趋减少。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正是追求物资丰裕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濒临衰亡的时代潮流。

如果相信技术进步和扩大资源供应是无限的，那么追求物资丰富的人们也就不会讨厌人口的增加。因为人们天真地相信更多的劳动力能够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但是，一旦感觉到资源供应的局限性，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有限的资源供应之中，为了使自身享受到更多的物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减少必须分配物资的家庭数。


公元前1600年以后世界人口的变动



依据这种设想，在追求丰富物资的思想指导下，在失去新的开拓地的同时开始限制生育。这一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上述自营农业的衰退和大家庭的解体。而对家庭劳动的多少不影响生产量(收入)的城市手工业者来说，家属越少，就越能保证得到更多的人均物资量。这样，当然就会讨厌孩子太多。不，若没有孩子就更好。反正孩子也不能养老送终，没有孩子也不是不能度过晚年生活。因为“面包和马戏”国家都能给予保证。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还促进了人口减少和家庭的瓦解。

失去了家庭的约束、也没有生儿育女之辛苦的男女们，如果每天无所事事，就必然要发生性道德的堕落。不问地之东西、时之古今，这一点似乎是人类的通病。古罗马进入帝政时期以后，不堪入目的淫乱行为四处泛滥。这一时代的许多名人贤士都曾有过多次婚变；上流社会乱搞男女关系和从事变态的性行为的人比比皆是。儒略·凯撒、庞培、奥古斯都、(大)普林尼这些被称为贤人的人物也是多次结婚和离婚，把精力都用到了婚外恋和变态的性行为上。因此，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没有孩

子。

小加图曾把政敌凯撒称之为“所有女人的丈夫，所有男人的妻子”，对其变态的性行为进行了攻击。不过，那时还算是比较好的。到了一百五十年之后，已经没有一个人批评黑德里埃纳斯皇帝玩弄美男子的嗜好。

女人的淫乱行为丝毫不在男人之下。几乎所有的皇后和王妃都有其肆无忌惮地乱伦的艳闻。甚至连有着“美德之化身”的马尔克斯·奥里利厄斯皇帝，对王妃法厄斯蒂娜的淫乱行为也佯装不知。总之，这一时期，在古罗马的上流社会，如果谁的妻子只有两个情夫，那么他就会被看成是一个“幸运的丈夫”。

这时的罗马社会，如果说还有什么“好风尚”的话，大概就是那些没有孩子的富裕老人不用担心晚年生活的孤独一类的事吧。因为那些企图继承遗产的男女都会蜂拥而至。然而，自不待言，这种所谓“好风尚”只会更加助长不想生孩子的风气。

上流社会既是这样，平民百姓也毫不逊色。地区社会和家族体系逐渐瓦解，提供“面包和马戏”的国家，其负担则不断膨胀。这样，就不能指望从市民中征得优秀的士兵。于是，军队里尽是些雇佣兵，并且其中有许多是解放了的奴隶和异民族的人。这样一来，“国家”的财政也十分紧张。曾经是那样强盛的罗马帝国也陷入了深刻的财政困难的泥沼。因而出现了象维斯佩希埃纳斯皇帝那样的想从公共厕所中取得财政收入的“发明家”。该皇帝主持修建了大量的厕所，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向不使用的人收取罚款。当然，罚款要比使用费高。

在中国，这类情况好象出现得更早一些。前汉末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自耕农的衰落，富豪们则大规模地扩大自己的庄园。许多没落的农民后来成了富豪们的长工，一部分逐渐变

成了流浪者，形成土匪团伙，还有一部分成了豪门贵族的私人军队。汉朝初期曾用来表示军队编制单位的“部曲”这个词汇，到公元前后竟然成了意味着是富豪们的私人武装的用语，可见私人军队之多。因为存在着流浪的打家劫舍的强盗土匪团伙，所以富豪们必须雇佣私人军队。没落的中国的庶民们，由此创造出了一条分裂为敌我双方相互蚕食的道路。

顺便说一句，“部曲”这个词汇，到唐代成了法律用语，专指那些比奴婢身分高，而比自由民身分低的农奴一类人物。这一情况充分表明了从前汉末期到后汉时富豪的私人军队“部曲”们的身分等级。即这些私人武装不是从自由民中招募而来的，而是失去土地后出卖了人身自由的没落阶层。甚至可以说，这种人的逐步增多，是“中世纪化”已经开始的证据所在。

的确，在公元前后，反对这种趋势，主张回到古代社会去的势力也很强大。公元八年，篡夺了汉朝的王位并建立起名为“新”的王朝的王莽，就是以此为理想的一个代表。这个篡位者，废除了汉皇室的各家诸侯，以取得富豪的土地和解放人民为目标，并一笔钩销了自由农民的借款。王莽当时已具有为进行病理研究而令人进行生理解剖的合理主义精神，还有让军队把兵法六十三家的武器都收集起来的物资嗜好，的确是一个古代文明的代表性人物。正因为如此，濒临没落危机的自耕农似乎都对他寄予期望。

但是，也不知是何故阴差阳错，王莽建立“新”朝之后却步入了歧途，他憧憬古代社会之前的太古的原始时代，热衷于卜占之术及祭天。并且，其改革也过于急躁，计划是臆造的，再加上有许多豪门出身的官僚们的消极对抗，因而新朝不久就垮台了，王莽被砍了头。发起这次叛乱的是赤眉军等流浪者集

团和各地豪门贵族的"部曲"，由此充分显示出了中国社会的质变。因为此时自由民已经没有维持政权的力量和进行改革的愿望。

在家族制度和崇拜祖先的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上层社会的家族观念虽然很强，但也不象后来南北朝及唐代那么团结。汉皇帝的同族甚至是位居诸侯高职的家族，其弟弟或表兄弟是穷人的情况也不少见。在平民百姓之中，家庭关系就更不清楚了。即使是在《三国志》中出现的英雄豪杰，连平民百姓家庭出身者的兄弟是谁都看不出来。刘备、关羽、张飞结拜兄弟是非常有名的，然而，他们真正的同胞兄弟是谁呢，我们全然不知。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三人都是独生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出现了出生率下降，人口急剧减少的现象。该国从古代社会开始就有人口统计资料。在《汉书·地理志》当中，记载着前汉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的总户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余户，总人口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余人，但到后汉后期也即质帝驾崩的本初元年(公元一四六年)，总户数则为九百三十四万户，总人口为四千七百五十六万人。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户数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当然，也有后汉初期的光武帝去世的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户数为四百二十七万，人口为二千一百余万人的记载。因而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王莽的苛政和国内动乱使人口大量减少，后来在后汉的太平岁月中又有相当大的回升和恢复的缘故。但是，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可靠。这是因为，由于光武帝试行解放奴隶，因而豪门贵族们都不申报奴婢及部曲的数字，所以人口调查的结果明显偏小。人口并不是因为稍微一点小小的战乱

和苛政就会那样大幅度减少的。

与此相反，在发达地区周围的落后地区人口反而迅速增加。这是由于发达地区的技术、物资、风俗习惯等的流入，提高了落后地区的出生率，促进了人口的增长。然而，尽管发达地区的技术、物资、风俗习惯等传入了落后地区，但人们的审美观及伦理观念都没有那么简单地发生变化。由于先进文明的影响，落后地区的经济虽然也在发展，但却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就是说，虽然从整个社会来看还是食不果腹，但人口却开始增加起来。

这样一来，在出生率低下的发达地区和人口增长显著的落后地区之间，人口的比例变得越来越不平衡，于是，不久就发生了人口从“人口过剩”的落后地区流向“人口不足”的发达地区的大迁徙，这恐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给古代文明以最后一击的民族大迁徙，其原因就是这样形成的。

古代社会的终结——审美观的变化

“古代(社会)”是何时结束的呢？对此，人们也有多种说法。

西洋史的一般说法是，以公元四七六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为标志，表明了“古代社会的结束”；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古代社会的实际结束要比此早许多年，即把公元三一三年基督教正式得到社会承认及三七五年的西哥特族在罗马领地内的迁徙(民族大迁徙的开始)看作为“古代社会的结束”。

在东洋史中，虽然也有把唐帝国以前的社会看作是古代社会的观点，但最近一个时期，以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灭亡，五代十国的大动乱开始时为“古代社会的结束”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一部分学者中，也有将移都江南的东晋灭亡的那一年(公

元四二〇年)及南北朝时代开始之时(公元四三九年)视为古代社会和中世纪之分界线的观点。

中东和印度的情况非常复杂，还有很多时期缺乏史料。许多史学家采取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即不做古代社会与中世纪的划分，而把伊斯兰教居支配地位以后看作“新的时代”。据此来看，中东地区“古代社会的结束”是在波斯萨姗王朝灭亡的公元六五一年。而印度则把实现了临时性大统一的戒日王去世的六四七年看作是“分界之年”。虽然从此时到穆罕默德·本·卡西姆率领的伊斯兰军开始进攻信德地区(现印度信德省——译注)的七一一年为止，中间还有近七十七年时间处于混乱和分裂的状态，但如果在“古代社会的结束”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划分方法大概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如前所述，这里并没有必要仅仅按一个具体时间把“古代社会”明确地区分开来。实际上，古代的文明和社会规范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逐渐衰落了。

无论是在西方、中国或其它地方，古代社会都从公元前后出现危机时就逐渐开始变质了。然而，使这种质变不停顿地进行的原因，则是作为产生并培育了古代文明之根基的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规范的变化。也就是说，构成古代文明之基础的物资主义，以及对丰富的物资感到幸福的审美观和将实现物资丰富视为正义事业的伦理观念，被整个社会丢掉了。

这一变化是从下述两个方面产生的。第一，是生活在古罗马帝国及汉帝国等先进国家的人们自身的意识变化。在公元前后，古罗马和中国实质上都已不能再扩展疆域，同时，由于森林资源枯竭，物资的生产水平也难以提高。加之，奴隶——

装有原动机的工具——的供应也开始减少。帝国的军事实力衰退了，结果，领导未开化民族的机能显著下降。总而言之，在耕地、能源、工具等三项条件的制约之下，古代社会的生产力难以发展，因此，人们不得不认识到物资丰富的时代结束了。

在古代人的内心世界中，“良知”也对此作出了反应。即对物资的关心淡薄了，对物资丰富感到幸福的审美观开始瓦解。到公元二世纪，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关心超过了对物资的关心，将追求可望得到丰富物资的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多收入的人看作是“卑劣的小人”而予以轻蔑或回避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在古罗马帝国，崇尚清贫的未开化的异教开始流行；在中国，求仙之术及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广泛传播，就是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

五贤帝之后，位居古罗马帝国权力中心的尽是一些象科莫德斯、卡勒卡勒、埃勒加伯勒斯这样一班只会向糊涂透顶的皇帝阿谀奉承的俗不可耐的卑劣小人。进入公元二世纪以后，在中国的后汉时期，花钱买官的风气很盛，宦官们的势力很大，高洁自尊之士忌避做官和赚钱，不太顾及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满足于空想式的清谈和借酒浇愁。著名的“竹林七贤”① 等就是其典型代表人物。逃避现实，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古代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

古代人引为自豪的科学领域，其衰退也十分显著。公元二世纪以后，无论是在古罗马帝国还是在中国，新的科学进步完全停止了。尤其是在作为一切时代变革文前驱的美术领域，写实艺术彻底衰落了。甚至在精美的写实雕刻大量遗存的地中海

① 魏晋间七个文人名士的总称。——译者注

文明圈，公元二世纪以后，也几乎没有值得一看的艺术品。在中国，尽管拥有许多象秦代兵马俑及前汉时期的飞燕马那样优秀的写实艺术珍品，但在进入后汉时期以后，艺术表现却令人奇怪地变得拙劣起来了。

当然，这既不是由于人类的大脑突然变得愚笨了，也不是因为人们失去了创造写实美术的技能。庞大的帝国还很稳定，其领土的大部分都还平静，经济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完全具备科学家和艺术家专心致志从事研究和创作的条件。尽管如此，科学研究和写实美术的创作却几乎被彻底放弃了，这无疑是人们的注意力脱离了物资，抛弃了如实观察和表现事物的思想和审美观的结果。从这时起，"中世纪"已在发达地区人们的心中诞生了。

中世纪的起因——人口结构的变化

使古代文明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遭到严重破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人口和财富的不平衡，周围落后地区的人口大量流入了发达地区。

前面谈到，进入公元以后，出现了发达地区人口减少和落后地区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其结果，人口从贫困的、无法生活的周围落后地区，大量涌入富足的、人口出现减少倾向的发达地区。而且，并不只是落后地区的过剩人口强行进入发达地区。在发达地区，由于人们都希望在城市从事手工业，因而也需要落后地区的人们来从事农业及土木建筑事业。在初期，即到公元二世纪前后为止，在古罗马和中国，这种情况都很普遍，流入的"蛮族"几乎都是奴隶或低级体力劳动者。

但是不久之后，在这些人中不仅出现了自营农民及自营工

商业者，并且也还出现了学者和富翁。不用说，混血儿也在不断增加。

进入发达地区的更快的捷径是当雇佣兵。在物资丰富、生活方便的城市，依靠手工业及社会福利生活的人们不喜欢过军队生活。为了保持帝国的军事实力，只能从“蛮族”中招收雇佣兵。

无论在任何时代，国家权力的最后依靠都是军队。如果军队没有了忠诚心，帝王和议会就都不能保持其权力和地位。到了雇佣兵时代，需要采取能够博得士兵欢心的优惠措施。于是，便提高了奖金，并规定士兵离开军队后分给土地。即使是蛮族胡人士兵也不能拒绝发给。这些措施当然促进了异民族的自立和巩固。

异民族的平民一增加，投靠他们的异民族同胞就会纷至沓来。如果他们受雇于同一民族的雇主，就不会因语言及风俗的不同而苦恼。移民的人数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他们的想法和习惯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底层。尽管如此，在他们还对先进文明的富足和便利怀有憧憬和尊敬的时候，还是想竭尽全力去适应它。这一点与今天移居美国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完全一样。然而，那终究只不过是表面上的适从。即改变服饰，学习语言，服从生活方式及制度，遵从等价交换的原则，总之是想方设法生活下去。然而，这只是一种“充满烦恼的适从”。

当时，在未开发的森林及草原上生活的日尔曼人和胡人，主要还是依靠放牧和狩猎维持生计。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他们还是生活在古代文明以前的社会里。他们对古代文明生产出来的物资的丰富程度及以此为前提的物资缺乏兴趣。

当然，他们也是需要物资的，并且也希望能拥有更多一些

物资。但是，他们所缺乏的是象古代文明人那样，对物资丰富感到幸福的审美观和为了生产丰富的物资而牺牲一切努力奋斗的伦理观念。跟以等价交换原则为前提的社会规范更是毫无关系。在他们内心世界的最深处，古代文明以前的部族共同体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总也消除不了。因此，他们一抛头露面，就会遇到发达地区的文明人投来的轻蔑和警惕的目光。

但是，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异民族也逐渐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异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或集团。在这些地方，没有必要严格遵守文明地区的习俗和制度，甚至连语言通常也是用本民族的。当然，也没有必要隐瞒自己原有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不，倒不如说，遵从它的人更能获得邻居和周围人的喜爱。如果谁硬要去顺应发达地区的文明，那么他就会被叫做“叛徒”或者是“溜须拍马的混蛋”，而遭同族人的白眼。今天，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及亚洲人集团中，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种多民族社会一扩大，就会形成一股政治、社会势力，并对文明发达地区的制度和习惯产生影响。至少使得它必须允许多种风俗习惯存在。当然，在发达文明的人们当中，也会有人对此抱有兴趣，肯定并理解这些客观存在。提出即使在落后国家的文化当中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的“进步”人士，他们与模仿异民族风俗的轻浮之人将同时存在。到了公元三世纪末的戴克里先时代，古罗马军团都穿起了西服裤，在《三国志》时期的中国，财主们也几乎都睡床了。当然，不同民族的特点在社会的结构中混合起来，社会规范也随之复合化了。

总而言之，对古代文明缺乏知识的落后地区的人们的大量流入，改变了发达地区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理所当然地促进了古代帝国的质变。因此，到了公元二世纪以后，

在以现实的合理性自诩的罗马帝国和后汉帝国，宗教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既是镇压的对象，又是政治势力的基础。后汉由于太平道教徒的叛乱趋于衰落，古罗马围绕基督教的是非发生了动乱。公元三世纪初建立的波斯萨珊王朝，虽是一个把祆教定为国教的“半中世纪”(封建关系已经开始萌芽)的国家。但也在为怎样对待涅斯托利乌斯教派的基督教和犹太教而伤透了脑筋。在这一时期，精神方面的“中世纪化”已经相当明显了。

如上所述，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古代文明发展到西罗马帝国及西晋王朝灭亡之前已经彻底衰败了。帝国的灭亡只不过是给它的最后一击。

联结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印度“后古代”

然而，印度的情况却略为复杂一些。本来，印度次大陆就缺乏政治上统一的经验。即使不说将其全部统一，至少大部分实现了统一的，也只有阿育王时的孔雀王朝和鼎盛时期的莫卧儿帝国以及近代的英国。根据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而统一起来的二十世纪印度的状况出发来对印度历史作出判断，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这块次大陆的历史，比中国史还近似于欧洲史，充满了政治上的分裂和对抗。

加上古代印度由于拥有辽阔的土地，而流入了许多少数民族。创造了印度文化的印度雅利安人，也是太古时代流入的民族，但古代也流入了亚历山大王遗留下的波斯人等势力。公元以后的民族大迁徙时期，哌哒(白匈奴)族和巴尔西族从北方进入了印度。就由于落后地区的人口增加而成为过剩人口的流入地这一点来看，印度同地中海地区及华北平原没有什么区别。最后，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拉吉普特族从公元七世纪前后正式开

始侵入，曷利沙伐弹那·戒日王所建立的大帝国彻底崩溃了。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地区温暖多雨，森林资源的丧失现象比起地中海沿岸、中东以及中国来要迟缓一些。所以，由于能源不足产生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变化相应地也就迟一些。因此，印度的“古代社会”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曷利沙伐弹那·戒日王去世的七世纪中叶。

当西方和中国的美术渐渐脱离写实时，在印度，刺激感官的写实美术却方兴未艾，并且科学也比较先进。然而，在异民族增加的同时，美术形式也变成了感官刺激性的东西。到了拉吉普特时代的钱德拉的达罗毗荼王朝初期(公元九世纪)，又都画起了象卡朱拉霍寺院外墙那样的奇怪的裸女群像。印度教创造出独特的妖怪式偶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科学研究的对象也逐渐脱离具体事物而转向纯理论的探讨，在化学、天文、数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漫长的印度“古代社会”所留下来的最大的科学研究成果是“零”的发现。遗憾的是，这一成果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同技术和生产结合起来。从公元四世纪到七世纪的印度社会，也许应该是被称为“后古代社会”或者是“次中世纪”时代。

漫长的印度“后古代社会”，对人类文明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度古代合理主义的存在与发展，通过中亚——西域的移民刺激了中国。不久，中国也产生出了应该可以称之为“次近代社会”的宋代合理主义。

在欧洲，关心物质财富的风气之所以能够恢复，是因为通过从十一世纪末开始盛行的圣地巡礼和十字军运动，东方世界的珍奇的物质财富经由中东大量流入进来。从七世纪前后开始，中国也开始出现类似的动态。产生这一重大转折的是由胡人带

来的西方即印度出产的“奇异之物”(煤炭)。并且，在十世纪的宋代，煤炭利用技术的普及，在造成“物资过剩”现象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

联结印度和中国的狭窄的通道，当然也就成了把漫长的印度的“后古代社会”同早产的中国“次近代社会”联系起来的时代桥梁。

二、文明的“犯人”及其现状

文明的“犯人”——技术、资源及人口

前面我谈到，在决定社会特点的社会规范的基础中，生活在该社会的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一直存在并且发挥着作用。但是，人们的这种审美观和伦理观念既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因特定的个人或集团的宣传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只有决定作为形成这一社会规范之基础的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东西，才能够说是具有不同社会特点的“文明的犯人”。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文明的“犯人”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必需指出的是“技术”。也正如熊彼特等人已经指出的那样，技术对于社会和文明的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是熊彼特仅考虑了技术开发在工业社会中对经济周期和社会进步的革新效应，思想过于狭窄了一些。尽管如此，熊彼特的思想中仍然包含着重要的因素。可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通俗的历史观中，与其说把技术看作是“文明”的原因，不如说更多的是把它作为“结果”来看待的。例如，有这样一种说法:“由于文明的程度高，技术也就发展了。”在熊彼特的思想中，包含了彻底修正这一看法的观点。

既然说技术是文明的“犯人”，就必须假设在文明程度提高以前技术进步的状况。也即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文明处于低水平的条件下，在某个特定的重要领域却出现了技术的飞跃进步。事实上，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无论是古代社会初期开发铁的冶炼技术时，还是九世纪前后煤炭利用技术在中国传播时，或者是十八世纪蒸汽机在英国普及时，情形大半都是如此。这些技术都不是从当时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产生出来的，确切地说是从其周围地区产生的。

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技术进步也需要有它的苗床。就象说“需要是发明之母”一样，要把人类的智慧转化成技术发明，需要外在逼迫的条件。许多发明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然而，不见得所有的技术都是“需要”这一社会性要求的结果。特别是那些成为改变社会全貌的契机的“关键技术”(Key technology)，常常是人们偶然的发明创造。这也有一点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突然性变异。

另外，即使是从“需要”中产生的技术，也不能说不是文明的“犯人”。因为，一般情况下，技术的飞跃进步使超过前人的梦想多少倍的事情成了现实。自古以来，许多人都做梦幻想人类能够象小鸟一样在空中自由飞翔；然而，恐怕没有人梦见过乘载着几百名旅客的飞机以音速飞越太平洋吧。这是因为飞机出现之后，人们对飞机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

因此，技术的飞跃发展使一部分东西过剩而使另一部分东西不足，动摇了人们的“良知”。其结果，建立了以一个技术体系为前提的社会规范。古代文明首先具有包括改良土地在内的“灌溉性农业耕种”的特点。现代文明则把“工厂制工业”作为自己的特点。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文明只有技术这么一个“孤

立的犯人”。技术即使不变，社会也会变。在技术停滞的过程中，古代文明衰亡了。

文明的第二个“犯人”是资源。更广义地说是环境或风土。

正如和辻哲郎① 说过的那样，日本人非常喜欢“风土论”，尤其是自然风土论。对从文明的性质以及社会形态、最终到个人的性格等问题，不少人都试图通过产生和培育过它的自然风土来加以解释。确实，能最直截了当地打动人们的“良知”的条件，即决定物资过分不足的大部分条件，是自然风土的因素。沙漠中的人们，无论其技术上取得多么了不起的进步，也不可能得到象日本人那么便宜的水。

但是，如果不是就不同地区的文化差距进行讨论，而是谈不同时代社会和文明的变化，那么就不应该将这一环境或风土仅仅限制为自然条件。毋宁说，应该把它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资源”的变化来把握。因为即使是同一地区，由于时代不同，资源的供求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当然，资源供求的变化还有其它原因。技术的进步常常使资源的供应量显著增加，而经济的增长又增加了新的需求。然而，偶然的大发现以及由于自然界本身的剧变造成供求变化的事例也不少。例如，古代文明圈中由于森林资源的枯竭就导致了古代文明的衰落；在中东地区发现的巨大油田，成了培育战后石油文明的条件，等等，这些前面已经谈到过了。总而言之，资源作为另一个独立变量，动摇了人们的“良知”，也是使社会和文明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犯人”。

① 和辻哲郎（一八八九—一九六〇年），日本著名伦理学家、文化史学家、哲学家，兵库县人，一九一二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专门研究尼采哲学思想和日本伦理思想史，著述颇丰，其代表作有《日本伦理思想史》、《日本古代文化》、《风土》、《锁国》等。——译者注

第三个“犯人”是人口。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经济学家们都把人口作为经济的结果，即认为“在能够生活的地方人口增加”。因此，甚至有人把人口的增减看成经济增长的标志。例如，有人以在德川时代后期日本的人口几乎没有增加为由，过分强调了这一时期产业经济的停滞状态。

然而，如同今天从各个发达国家所看到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实际上也不一定就是“能生活的地方 人口增加”，而“不 能生活的地方人口就不增加”。目前，在日本及西欧国家，虽然人们生活丰衣足食，物资极其丰富，但出生率却在显著下降；相反，在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却发生了猛烈的人口爆炸。这种事情，并不一定是二十世纪后期的特殊现象。古代社会末期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人口不一定是经济及资源条件的因变量。因此，它不仅是文明的“受害者”，而且也是文明的一个“犯人”。

以上三者——技术、资源、人口，都是某种形式 的“文 明的犯人”，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可疑的角色。其中最为可疑的是民族环境，即本国（民族）同周围各民族是否处于紧张状态。

与其它民族相脱离，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远海的孤岛”的岛国之上的日本人，对有关军事外交问题，实在是非常迟钝。因此，对自然环境谈得比较多，这样就往往容易忽视民族环境问题。但是，对于居住在与陆地相连的大陆及邻近岛屿上的人们来说，周围民族的动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它有着实力强大的敌对民族，这不仅会明显地改变它对资源和时间的分配，而且也会改变人们的思想和紧张

感。因此，它当然也会影响该国的文化和社会规范。

诚然，对于这些不同的民族和不同质的文明，既有明确意识到了的时代，也有没有那么清楚地意识到的时代。并且，即使已经意识到了，对异民族的划分方法也不尽相同。

对于古代社会的人来说，“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差别是很重要的。例如，在秦、汉帝国及古罗马，对于上个时代还是异民族的人，只要他们文明化了，就逐步将其吸收进来，并给予市民权。与此相反，中世纪的人们则认为所信仰的宗教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人的差别则是“人种”的差别。这些不同点，确实改变了人们对军事防卫的设想和资源的分配。

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民族环境本身也有着受文明状况制约的一面。民族环境似乎已给社会和文明的形态带来了变化，但至于它究竟是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则是以我个人肤浅的知识所不能够说明的。希望这方面的专家们能对此进行研究。

再一点是“组织”问题。社会和文明的变化确实改变了处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之组织的机能、性质和结构。无论是充分发挥一种技术的作用方面，还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能够从事的事业的规模、效率和精密程度方面，都会因组织形式的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别。因而，即使技术相同，如果组织上发生了变化，社会和文明完全有可能发生变化。有不少学者认为，导致从原始社会到古代社会之变迁的灌溉农业的诞生的，与其说是技术的进步，不如说是组织的变化。另外，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作为接受近代工业技术之前提的是分工，即不同机能的组织的发达。

但是，当组织史的研究在所有历史领域之中处于异常落后

的状态的情况下，对这一问题已不能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了。在此只想指出一点，即社会的变化必将使组织原理也产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在后面，即在讨论下一代社会——“知识价值社会”时，是非常重要的。

在“不能生活的地方”增加人口

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有几个类似之处。尤其是在对物资丰富感到幸福的审美观和将对此作出贡献视为正义的伦理观念这方面，以及以此为基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贫乏的信息环境中将等价交换原则作为一个社会规范建立起来这一点上，二者是完全相同的。

上面我们列举了创造培育了今天这样的社会和文明，并又使它衰亡的“犯人”们。那么，目前这些“犯人”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了解了这些情况，在把握今日之现代工业社会的命运方面，将会得到重要的启示。

首先出现最显著变化的是“人口”。

根据前述比拉蓬的推算，从古代社会末期的公元二世纪开始，世界人口急剧减少，到十世纪前后出现显著回升。到十四世纪又一度大幅度减少，从十五世纪开始迅速增加起来。这也是开始听到近代社会的脚步声的时候。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后期的产业革命之后，随着工业社会的正式出现，人口出现了空前的急剧增长。并且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今天。根据联合国组织的推算，公元一八〇〇年，世界人口为九亿八千万，一九〇〇年为十六亿五千万，一九五〇年为二十二亿五千万，一九八〇年达到了四十四亿。按联合国的预测，到公元二〇〇〇年，世界人口将达到六十一亿，到二〇二五年，实际人口将为八十二亿。

若按年平均增长率来计算，十九世纪为百分之零点五，二十世纪前半期为百分之零点八，而后半期为百分之一点九。

仅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说，人口越来越迅速的增加是工业社会的特点之一。但问题是其“内容”究竟如何。

一八〇〇年，在世界九亿八千万人口之中，发达地区(东、西欧洲、北美、日本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人口为约二亿五千万人，其它发展中地区是七亿三千万人，大体上是一比三。到一九〇〇年，上述两地区的人口分别为五亿七千万和十亿零一千万人，即一比一点八左右。一九五〇年分别是八亿三千万人和十六亿九千万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比例稍稍有些上升，超过了一比二的比例，但差距还不是太大。并且，很明显的是，在这一数字当中，由于包括从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特别是向拉丁美洲及南非的移民，所以实际上发达地区人种的人口增加更多一些。无论是威尔科克斯及卡·松德斯的推算，还是联合国组织以二十世纪前半期为对象的推算，如果考虑到这些社会性的人口迁涉，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确实要比发展中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高得多。特别是十九世纪后期，前者大约是后者的四倍。这就是“在能够生活的地方人口增加”的情形。

但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到二十世纪后期，情况完全逆转了。五十年代，发达地区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三，而发展中地区为百分之二点二，六十年代分别为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二点三，七十年代为百分之零点八和百分之二点二，进而八十年代为百分之零点七和百分之二。

并且，目前发达地区的人口增加的大部分是老年人口的增加和从发展中地区流入的移民。如果仅就出生率来看，发达地

世界人口的变动(1750－1980年)及未来预测

(百万人)

年	全世界	发达地区	发展地区
1750	791	201	590
1800	978	248	730
1850	1262	347	915
1900	1650	573	1077
1950	2255	832	1693
1960	3037	945	2092
1970	3695	1047	2648
1980	4432	1131	3301
1985	4826	1170	3656
1990	5242	1206	4036
2000	6119	1272	4847
2010	6988	1321	5667
2025	8195	1377	6818

世界各地区人口(1960－2025年)

(百万人)

地区＼年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25
非洲	275	355	470	635	853	1542
拉丁美洲	216	283	364	459	566	865
东亚	722	887	1058	1204	1346	1581
南亚	877	1116	1404	1731	2075	2819
北美	199	226	248	274	299	343
西欧	328	356	374	386	391	401
大洋洲	16	19	23	26	30	36
日本	94	104	117	123	129	131
苏联 东欧	311	345	375	406	431	486

世界人口增长率的变动

(%)

年	全世界	发达地区	发展中地区
1800－1850	0.5	0.7	0.5
1850－1900	0.5	1.0	0.3
1900－1950	0.8	0.8	0.9
1950－2000	1.9	0.9	2.2
1950－1960	1.8	1.3	2.0
1960－1970	1.9	1.0	2.3
1970－1980	1.8	0.8	2.2
1980－1990	1.7	0.7	2.0
1990－2000	1.6	0.5	1.8

区的许多国家呈现出人口减少趋势。如果人口的平均寿命象古代社会那样不曾提高的话，发达地区出生的人口数，在八十年代必然会出现相当大的减少。

与此相反，发展中地区的人口依然急剧增加。虽然增长率稍稍降低了一点儿，但绝对数仍然非常庞大。据联合国推算，发展中地区每年增加的人口数，六十年代为五千二百万人，七十年代为六千八百万人，八十年代为八千五百万人，九十年代将达近一亿人。因而发生了目前这种"能够生活的地方人口减少，不能生活的地方人口急剧增加"的悲剧性的现象。

其结果，如同大家都已充分了解的那样，在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之间，正在产生财富和人口的极端不平衡的现象。并且，由此出现了从"不能生活"的发展中地区向"能够生活"的发达地区大量移民的现象。特别是从拉丁美洲各国涌向美国的移民非常多。

最近这十年间，仅从拉丁美洲流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就约有一千三百万人，其中有四百万被逮捕后遣送回国了。即使美国拥有强大的力量，恐怕也已经阻止不了这一巨大的移民浪潮。不，不仅如此，最近甚至出现了政府正式允许"船民"大批乘船离开本土的国家，以及对强制遣返非法入境者提出异议的国家。目前，人们甚至不再认为本国国民"非法"逃往外国是"国家的耻辱"。

说不定会有那么一天，几十万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结成一个大的群体，向发达地区蜂拥而来，并如此无限重复下去。这样的事即使在二十一世纪发生，也并不是不可思议的。"民族大迁涉"的可能性，在最近的将来也还是存在的。

这样的人口动态，与古代社会末期——中国的后汉、三国

时代，以及西洋的罗马帝国时代出现的人类大迁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今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历史学，只重视在晋朝末期及罗马帝国末期北方蛮族有组织的军事入侵而导致了文明区域大帝国垮台的事件，但在这之前，由于财富和人口的不平衡，大量的野蛮人作为下层劳动者以及奴隶、雇佣兵已流入文明国度了。今天 美国及西欧的状况可以说正好与此相类似。

“资源”的变化和土地的沙漠化

文明的另一个“犯人”即“资源”的情况，也以七十年代为分界线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关于能源资源的情况大家都十分清楚了。如同在下一章要详细叙述的那样，培育出了近代工业社会的最大的资源是煤炭。进入二十世纪后，又采用了石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石油成了最主要的能源。因为接连在中东地区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大油田，能够大量供应廉价的液体燃料。

本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在中东发现了大规模的石油资源，如同十六世纪在墨西哥发现大银矿、十九世纪末在南非发现大金矿一样，这次大发现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矿物大发现”，但其社会影响是其它两次所不能比拟的。这一时期中东石油的大发现，也许可以说是人类“偶然的幸运”。总之，其勘察与探明之比(为勘察而投入的费用与探明的蕴藏量之比)如此之高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托其之福，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人类受惠于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丰富廉价的能源，进入了做梦都没有想过的“物资极端丰富的时代”。

但是，新的中东油田的发现已告一段落，加之依靠各个发达国家的力量已不能控制这一地区政治上、军事上的不稳定因

素的状况表面化以后，丰富廉价能源的时代也就迅速地结束了。在此之后陆续发现的新的石油资源，有墨西哥、北海(英国)、北极海等等，但其勘探费及生产成本都要比中东地区高十倍以上。

另外，现在人类已经探明的可开采的煤炭蕴藏量，据说大约可供开采二百年，但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利用它需要花费比一九七〇年前后中东开采石油高十倍以上的费用。二十世纪后期人类所发明的新能源——原子能的利用成本大约与此相同，而地热及太阳能等，目前其成本则要远远高于石油。

现代文明大概不会由于能源资源的枯竭而突然发生全面崩溃。毋庸讳言，只要在中东的石油出口地区爆发大战乱并出现石油供应急剧减少的“油断”现象，日本等国的产业经济就会因此而受到沉重打击。但是，就全世界的情况来看，大概并不会造成文明的终结，并且日本经济也是可以恢复的。自古以来，有许多文明地区遭受到了游牧民族的野蛮破坏，但却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文明因此而消亡了。

然而，能源资源逐渐短缺并且价格昂贵已成为改变文明和社会之本质的问题。并且，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已经发生了，这一点在上一章已作了详细叙述。古代文明曾以森林资源的枯竭为转折，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类似的变化，完全有可能正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发生着。

可是，比能源问题更严重的资源问题，今天正在地球上蔓延扩展开来。这就是土地的沙漠化。

人类，至少说发达国家的人们，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可以说已经丧失了物理意义上的可开拓的疆域。从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南非、中国东北地区，到西伯利亚等残存的全部可开拓

的疆域里都已开始看到了"人的住处"。几乎与此同时，在欧洲及美国东部地区，城市公害及矿业公害十分严重，环境保护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这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人们感觉到了"空间的有限性"的第一反应。

然而，十分幸运的是，这一状况由于代替煤炭的石油的登场和运输机械的高度发达而大大缓和了。即使如此，本世纪三十年代袭击了世界各地的干旱、风沙、冻灾等，仍然表明了依靠技术进步扩大空间的局限性。社会生态学在三十年代广泛流行就是以这些现象为背景的。

战后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和以此为基础的农业的化学化与汽车交通的发达，似乎再一次突破了自然条件的壁垒。但是，从一九七〇年前后开始，显著发展起来的、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森林资源的丧失和土地的沙漠化，目前已经达到了人类的知识和技术无能为力的巨大规模。

一九七〇年以后，全世界每年有十八万平方公里的森林消失，有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逐渐变成不毛之地的沙漠。每年丧失的森林面积大约相当于日本国土的一半，沙漠化的土地相当于日本九州与四国两地面积之和。并且，这一倾向只会进一步扩大而不会停顿下来。丧失了森林的土地将反射太阳热，减少降水量，不仅自身趋于沙漠化，而且还会促进周围地区成为不毛之地。

今天，沙漠化最显著的地区是非洲撒哈拉南部，但中东和印度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甚至十多年前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泰国和巴西，森林面积也不知不觉地大幅度减少了，红褐色的土地裸露了出来。如果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公元二〇〇〇年，全球的森林面积将减少百分之十七，而此后将进一步急剧

减少。最为悲观的看法是，到二〇二〇年，全世界的森林面积将是一九七〇年的五分之一，而沙漠的面积将扩大到原来的两倍。

人口迅速增加的发展中国家，其土地正在急剧地变成不毛之地，这已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大问题。现在，这一情况在非洲已成为饥饿问题的原因，导致了难民的迁徙。不仅如此，还有人担心：不久的将来，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将使气候发生变化，并将产生全球性的影响。

目前，人类不仅失去了地域上的发展余地——可开拓的新边疆，而且适合于人们生产和居住的土地也已开始缩小。与古代社会末期的文明区域因森林资源的枯竭和土地沙漠化而衰落大体相同的状况，正在二十世纪后期出现。

世界植被与土地资源状况变动预测（1975～2000年）

（单位：百万公顷%）

	1975年	2000年	变动情况	变动比率
沙漠	792	1,284	+492	+62
森林	2,563	2,117	-446	-17
受盐碱侵蚀的水浇地	111.5	114.6	+3.1	+3

不过，也许会有人说，能源问题可以通过煤炭的液化及有关原子能技术的进步而得到解决。而粮食问题，则有人认为，即使土地的沙漠化在发展，也可以通过生物技术及合成蛋白取得突破。然而，依靠这些高级技术，是否能够解救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

更为实际的事情是，不管技术上能否解决问题，在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资源有限论进一步加强了。并且，这一思想

一定会动摇人们的"良知"，并将迅速地把物资丰富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撞得粉碎。恐怕不要等到二十一世纪，这方面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技术进步的方向发生"逆转"

那么，第三位"文明的犯人"——技术——将会怎样呢？

唯有技术才是现代人最引以自豪的领域，也是今天正在迅速发展的领域。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即使在这方面，其"内容"即技术进步的方向也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在一个时期里，特别是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对技术进步及其社会接受能力等问题，非常悲观的看法在人们当中颇为流行。下述看法就曾广为流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技术开发的顶峰；在此之后，技术进步的速度一直在逐步下降。今后恐怕不会出现能够大大改变社会整体的新技术了。"另一方面，强调巨大科学及巨型技术的危险性及反人性之特点，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很难说就一定能给每个人都带来幸福"的看法，成了一句颇为流行的"俏皮话"。

在这些"反科学"、"反进步"的想法背后，不正是表明人们迷失了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向了吗？

但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这种对技术进步全局持悲观态度的人的影响减弱了。这是因为，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在电子技术迅速发展，电子计算机以及新的通信机器爆发性地普及的同时，在新材料及生物技术领域，有了几个大有希望的新发现，这些科学技术的新的发展领域，在性质和机能方面，与过去曾引人注目的"巨型"科学技术明显不同。如上一章所叙述的那样，以往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是大批量化、大型化、高速化，与此

相反，今后可望发展的领域将是多样化、信息化、省资源化。

技术进步的方向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在于技术进步的效果是递减的。

这一点只要看一下交通工具的发达怎样缩短了时间就会明白了。过去直达列车在东海道干线上运行时，东京至大阪之间大约需要二十四个小时。即使如此，那也比以前徒步走花十二天时间缩短了十一天时间。然而，五十年后的特快列车“燕子”号大约只需要七个小时，即又缩短了十七个小时。新干线虽是铁路技术的大飞跃，但在东京至大阪之间所需时间仅比“燕子”号少四小时。将来，即使建成象HSST那样的超高速铁路，所需时间也只能缩短一个半小时左右，因此，已不能说是根本性的变化了。

即使将发现治愈结核病的抗菌素与控制癌变的方法相比，也是如此。结核病的治疗可使二十岁左右去世的人活到七十岁左右，而癌变的控制则不过是让七十岁死的人活到八十岁。技术进步程度的大小姑且不论，其社会性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利用核聚变及太阳能发电，由于它所生产的东西是与水力发电及石油火力发电同样的电力，因而其社会影响就更小了。

仅就这一点来看，在现阶段，过于看重技术进步的社会环境也许是很危险的事情。认为人类的技术开发能力从长期趋势看是下降的，技术方面将面临一个停滞时期的看法虽是错误的，但说目前技术进步的社会影响力不会象二十世纪中叶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则是正确的。

产业革命以来(不，应从那以前的近代社会胎动时期开始)，技术进步的重要方向是：“更大、更多、更快”。总而言之，其核心就是增加物资的生产量，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消费更多的物质

财富的“进步”。然而，这个意义上的“进步”，无论是从其社会影响方面来看，还是从增大人们的满足感方面来看，其效果是递减的。人们反而认识到了随之产生的“损失”方面。这无疑是七十年代科学技术发展“迷失方向”的一个原因。

与此相反，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改变了科技发展方向的新的科学技术进步，适应了具有“资源有限论”思想的人们的需求。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再一次有了明确的设想，这可以说是人们的需求同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向相一致的结果。

总而言之，进入到八十年代，产业革命以来曾构成技术进步主流的追求大型化、大批量化、高速化的技术进步已经停滞。这几年取得显著发展的技术，是多样化、信息化、以及节省资源化。就是说，技术的进步已经不是追求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开始朝着根据每个人的嗜好和时尚的变化创造出更加多样化的物资和服务的方向发展。

所谓技术开发，如果是以满足人们的欲望为目的而进行的，那么，这一变化作为人们即消费者欲望的变化的反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暗示了决定文明之本质的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根本变化。

作为先行指标的美术

上述三个文明之“犯人”的现状，似乎暗示了工业社会的终结。进入八十年代后变得更为突出的现象——省资源文化的流行及个性化与多样化的进展，在价格决定过程中重视主观因素等等，决不是暂时性的现象。即使今后还会出现几次逆流或有难以预料的波折，但历史潮流是朝着推动这一变化的方向前进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旁证。即每当社会发生变化时，常常率先行动的美术领域已发生了变化。在原始时代曾表现出了极端的象征性、有时又是抽象性的美术，从古代社会初期开始迅速地转向写实化了。这一变化说明，人们把事物作为客观物体进行观察，并且不夹杂个人主观因素将其再现出来的合理的、写实的精神此时已占据了优势地位。

相反，人们一看到古代文明衰退的预兆，美术界的写实手法很快地衰落下去，并转向了形式化、象征化。中世纪穆斯林美术所表现的抽象图案，可以说是这一社会印象性的、暗示性的精神结晶。

另外，在近代文明繁荣起来之前，写实艺术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恢复了。博提切利·吉尔兰达约及列奥纳多·达·芬奇最为活跃的时期是一五〇〇年前后，米开朗琪罗着手画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是一五〇八年的事情，都比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路德的宗教改革要早，同伽利略相比，也要比他早一百年左右诞生。英国发生“光荣革命”(一六八八年)，制定了《权利法案》(一六八九年)，纽科门发明排水用的蒸汽机(一七一一年)，也是在写实美术建立二百年以后的事情。

在被称为现代化的各种现象之中，美术的写实化要比宗教和科学的变化先走一步，并且比政治和技术的变化早得多。这决不是偶然现象。现代化的根源，可以说就在于客观地观察并认识理解事物的合理主义精神。当然，这一观察是从对外表的观察开始的。并且，产生了如实地描绘出这一观察结果的心情，写实美术由此兴旺起来。

然而，人们在努力正确地描绘客观事物外表的过程中，不久就对其内部结构和运动原理产生了兴趣。在十五世纪的威尼

斯，人体解剖者就是出自画家的行列。因为画家比医生更早地提出通过解剖了解人体的内部结构的要求。

这种对客观事物内部结构和运动原理的研究，与科学是紧密相连的，也形成了对违反客观事物的宗教进行改革的思想。然而，为了改变政治结构，这一精神需要同社会整体的自觉意识和政治势力结合起来。为了使科学转化成技术促进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活动本领、资金和经营能力。而要培养、具备这些条件，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不言自明的。

也就是说，美术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就其作为具有最敏锐的感觉能力的人们的个人活动，并能够廉价而迅速完成这一点来说，它具备了易于走在文明变化前面的条件。

但是，在这美术的世界里，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已经显露了写实美术衰落的蛛丝马迹。印象派的画家们所作的一系列名画，其主观性要大于客观性，其印象性要强于合理性。二十世纪初，由康定斯基和波洛克发展起来的抽象画，已经进入了印象造型的境地。这些天才的作品确实具有一种高贵的美感。然而，它也就因此而脱离了现代化时代的具有朴素的合理主义精神的原则。

事实上，在那些被称作抽象派、印象派的艺术家中间，有不少远远超出了艺术家式的固执的古怪之人。患酒精中毒及精神异常病症的人也并不罕见。当然，尽管艺术家的人格及性情偏离一般人的常轨，但其作品的价值并没有因此而降低，问题是，在赞赏这些奇异美的二十世纪的美术界的精神之中，存在着与产生并培育了所谓合理的、客观的工业社会的现代精神不同的其它因素。具有最敏锐的感觉的人们，在社会性、经济性束缚最少的领域里，早在百年以前就开始看到了超工业化社会

的动向。如同在教会和中世纪诸侯的势力还十分强盛的十五世纪末，文艺复兴的天才们就创造出了精湛的写实美术一样。

引人注目的是，在美术领域中出现的这一反合理主义的、超工业化社会的动向，它所得到全社会承认的时期几乎和新开拓地的消失期同时到来。这一现象决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

因此，在美术世界发生的这一现象，现在正在向所有艺术领域和生活文化领域扩展。

无标题的音乐、分不出情节的电影、幻想性的照片，以及尽管既不方便也不华丽但却极其昂贵的时兴衣料和十分闷热的蓄长发及蓄胡须风尚的流行，等等，这些现象都包含了对合理主义精神的反动和超工业性的思想。硬壳虫乐队和玛丽·坎特兴起的"文化革命"，不是暂时性的流行风尚，而是社会巨大变化的先驱。

向超工业化——知识价值社会发展的潮流，并不是这十来年在某地突然一下子开始的。它早已经有了一系列先驱者的活动。只不过是他们还缺乏综合地观察、体验整个社会和这场变化的眼光。

现在，在看到八十年代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新的社会来临了。"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下一个新的社会中的社会规范是什么样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再一次地回顾历史。在与现代工业社会有若干相同点的古代社会结束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尽管这样做非常地绕弯子，但为了找到问题的线索，进行一下这方面的研究也并不是没有用处。否定以物资丰富为幸福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中世纪社会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又拥有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呢？通过分析这些问题，

就能够确认与现代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也能在经历过高度物质文明之后建立起来这一事实。

未来决不会是历史的简单重演。因此，不能从对中世纪社会的考察入手来推测未来社会。但是，我认为，已经完全被极其深厚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淹没了的我们，有必要通过了解与此完全不同的社会来恢复思考的自由。

第三章 下一个时代是“高技术中世纪”吗

产生“新社会”的胎动

今天，发达工业国家已拥有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质财富。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对现代社会，即“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这一点深信不疑。

当然，人们的生活从来也没有象在今天的发达工业国家里那样普遍富裕、便利和安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甚至已经过剩了的物质财富，为数众多的文明的器械和社会服务，使家务劳动、工作、旅行和通讯联络都变得极为简单、方便。尽管还存在着产业公害、食品的复合污染、文明化导致大型事故频发和人们长期精神紧张等问题，但同处于恶性传染病、寄生虫、强盗袭击等威胁之下的过去相比，现在无疑是极为安全的。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现在可望得到前所未有的长寿。

此外，信息现在已经可以迅速地得到广泛传播，初等教育几乎已经完全普及，依靠能力、努力和好运气而接受高等教育的道路已经打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社会现象也受到了细致的观察和详细的分析。人们的生命得到充分尊重，人权也受到很好的保护。经济力量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差距虽然还很大，但是，能够威胁人们生命的贫困、镇压显然是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少了。

在现代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当中，虽然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问题，但它在许多方面比以往的任何社会都优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确实取得了“进步”。

但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并不是沿着笔直的大道一直“进步”到现代社会的。仅从各个时代里创造了最先进的(或最典型的)文明的地区，即所谓文明的“中心地区”来看，就会发现各类文化的文明方式显著不同，有的甚至走到了按现代社会标准来看是相反的方向。

虽然不是所有的人，但从整体来看，人类总是在追求着理想境界，为建立更美好的社会而不断作出努力。而且，很难想像整个人类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智能和动作灵敏度会在某一时期里显著退化。然而，人类的文化文明却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向与现代的发达工业国家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一事实说明，人类追求的理想及人们的观念并不经常是同一的。也就是说，将现代的这种“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视为“最先进的社会”的评价标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件事还向我们暗示：继现代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新社会”很可能会具有与今天不同的观念和社会规范。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观念和规范。而且，在这些社会的基础当中，又都存在着肯定其观念和社会规范的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将这两者加在一起就是价值观)。在工业社会中，人们的审美观是“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体面”，伦理观是“能使人们增加这种体面程度的事情是正确的”。在工业社会中，消费着大量物质财富的人们受到了他人的尊敬和羡慕。毫不吝惜地购买、消费大量物资的阔佬，正是大部分人心目中的理想形象。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物资才能生产和使用的东西都被人们视为

高级产品。例如，高级轿车都是马力大的大型车，高级住宅也都是冷暖气设施完备的宽敞住宅。用粮食饲养家畜再食其肉要比直接吃粮食高级得多，因为吃肉要多消耗十倍左右的粮食。

而且，在工业社会中被认为是“好事”的概念，如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勤劳等都与“能使人们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相联系。工业社会的重要课题——“公正”或“公平”的概念，归根结底，也意味着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努力程度和运气来适当地分配物质财富。参政权平等的意义在于通过纳税和财政支出公平地对物质财富进行再分配；信仰自由则意味着通过宗教来防止在物质财富的分配当中出现不公正的现象。

当然，在关于应在多大程度上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努力和运气进行“公正的分配”这个问题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经济与统制经济之间有很大差别。然而，它们却都根据各自的观念主张要对物质财富进行公正的分配。在这一点上，它们无疑都是立足于重视物质财富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它们达到可称之为工业社会的阶段时，如果不对物质财富进行“公正”的分配，就根本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处于工业社会之中，只不过是在体制上有所不同而已。

自产业革命建立了工业社会以后，或者说包括作为其准备阶段的近代在内，世界各先进国家所面临的各种条件，一直在朝着有利于追求这种重视物质财富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方向发展。而且人们也向同一方向努力，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功。

战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石油文明”，可称之为这种追求的顶点。人类，特别是生活在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可以说已经充分发展了这种增长期追求过的审美观。

但是，这并不是人类能够持有的唯一的审美观。非但如此，在当今的八十年代，正在兴起的"文明的犯人"们的变化表明，在迄今的工业社会中为人们所信仰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动摇。正如在前一章中所详细论述过的那样，在决定文明的形态和社会规范的主要"犯人"——人口、资源、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已发生了在迄今的工业社会中没有见到过的现象。

从工业社会形成的十八世纪前后开始，世界人口急剧增加，现在也仍在继续增加。到二十世纪中叶为止，富裕的发达工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六十年代开始，这种现象发生了逆转，富裕的发达国家的人口逐渐减少，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却出现了爆炸性的增加。这种"逆反现象"至今仍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着。

在资源(或环境)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迄今的工业社会当中，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积累的增大，几乎都会使资源的供应量增加，扩大了人类可以利用的土地面积。即使在资源不足、粮食匮乏和环境恶化已成危机状态的本世纪初和三十年代，资源供应和可利用土地的绝对量也从未长期减少过。但是，从一九七〇年前后开始，石油等几种重要资源的供应极限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亚洲、非洲等地森林资源的减少和土地的沙漠化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现在，即工业社会建立二百年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资源和土地的绝对极限。

而且，即使在工业社会中人类最引为自豪的科学技术方面，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自产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是大型化、大量化和高速化。也就是说，技术开发都是为了进一步增加资源、能源、农产品的供应、加工和流通而进行的。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技术进步几

乎都已停止，多样化、信息化和省资源化则成了技术开发的主流。

这种倾向今后恐怕还要长期持续下去。世界的人口动态不会发生急剧变化，森林资源的减少和土地沙漠化也没有停止的征兆。目前，甚至连技术再次向大型化、大量化、高速化方向发展的根据也看不到。毋宁说，现实生活中的技术开发，越来越向多样化、信息化和省资源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上述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工业社会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终结，而以与迄今不同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为基础的全新的社会必将诞生。不，这种社会现在也许已经出生了。

这样，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对于生活在最先进的工业社会之一——日本的我们来说，预测新的"下一个社会"的状态及其观念和社会规范，就是我们对历史应负的责任之一。

然而，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预测尚未见过的未来通常是困难的。如果要对与当今社会完全不同的"下一个社会"作出预测，那么现有的观察手段和知识体系就不能发挥多大作用。这是因为，现代的社会观察手段和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完全是在产业革命之后以工业社会为对象建立起来的。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线索。在人类走过的道路当中，曾发生过几次这种社会的观念和规范的变化。而且，也有过构成社会基础的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完全改变的例子。从这些过去的历史当中，找出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况相似的部分，再看看当时发生的事件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改变了社会和改变后的社会状况，就会在我们思考未知的未来的时候得到一些启示。

"历史之父"修昔底德说得好："人性将使今后的历史同迄今的历史一样在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相似的状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过去的类似事态，当能成为我们探索未来的方向的路标。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要探讨与我们所面临的事态有某些相似之处的历史，当然就要把我们的视线转向曾以光辉的物质文明和科学的合理精神著称的古代文明的崩溃，以及与其完全不同的中世纪文化的成立这一历史过程。

一、反物质文化的产生与特点

否定物质文明的"进步"

前面讲过，古代文明在许多方面与近代文明有着类似之处。

由于有组织地建设和使用灌溉与排水设施，农业的可耕地迅速扩大。这种"农业革命"的结果，使人类社会拥有的物质财富比以前丰富得多。于是人类的居住空间扩大了，剩余生产增加了，担负交换和流通的商业成为经常性的活动。统治形态也自然而然地从仅仅支配有限的河岸、绿洲等天然可耕地的"城市国家"发展到支配周围农村和商业通路的"区域国家"。

同时，大量的可耕地与进行剩余生产的可能性，产生了把人作为"有机工具"加以使用的制度。"农业革命"前极其有限的奴隶制度在古代社会得到了大规模的普及，结果生产出越来越丰富的物质财富，使越来越多的交换成为可能。

这一过程作用于人的"良知"，使人们的目光转向物质财富。古代的人们细心观察物质财富，产生了将其加以正确描绘的写实美术和探索其形状与运动原因的"科学意识"。

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丰富，所以很自然地要把科学成果应用于物质财富的生产。结果古代出现了技术的巨大进步。这主要被用来生产和输送更多的物质财富，并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财富。古代文明同近代一样，是把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同扩大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组织和统治形态等等的重要作用，也是为了提供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在古代社会，出现了各种不同机能的组织，并且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军事、公共事业以及司法和福利，分别是为了确保和扩大生产物质财富的土地(领土)和用于流通的商业通路；增加物质财富的供给；以及公平地分配物质财富。这同近代国家的任务几乎是一致的。而且通常是采用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对丰富物质财富抱着正义感的古代人，为确保土地和商业通路，为维护国家组织以进行扩大生产的事业，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战斗。

导致古代文明形成的观念，是以扩大物质财富的供给、到达物质更加丰富的世界为目标的。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不同机能的组织、以及以扩大领土、公共事业、公平司法和福利性再分配为主要任务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同一个观念为基础，即为了丰富物质财富。根据这一观念建立的社会规范之一，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只要因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感到幸福，并认为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正义的，那么就没有比这更能为社会所接受的交换方法。

然而这一古代文明的发展也并非永久不变。大概地说，在中国，从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在地中海周围的罗马帝国领地内，从公元三世纪末到四世纪末，古代文明实际上已走向衰亡。虽然古代大帝国作为政治组织还在苟延残喘，但其内在的

文明已不及古代全盛时期。

印度的情况比较复杂，这一变化进行得更为缓慢，但至迟在八世纪中叶戒日王的大帝国灭亡时，古代文明也已完全消失。

一个社会的崩溃，意味着“下一个社会”的诞生。所谓古代文明的崩溃，也就是“下一个社会”即中世纪文化的建立。二、三世纪的中国和三、四世纪的地中海周围，也是中世纪文化的形成期。“旧社会”古代的崩溃和“新社会”中世纪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

与古代文明人具有同一种审美观、生活在与古代社会类似的社会规范中的近代人，往往容易重视古代文明的崩溃，认为其间的变化是“文明的衰退”或“人类社会的退化”。而且强调与之相应的破坏性事物。把古代文明的崩溃归咎于“北方蛮族的入侵”及其“野蛮的破坏行为”，即是其中的一例。

西罗马帝国由于北方日耳曼民族的入侵而灭亡，中国的西晋王朝因漠北之民的进攻而崩溃，印度的大王朝由于北方哌哒族和拉吉普特族的南下而消失，这些固然是事实，但如认为这些蛮族的军事入侵破坏了古代文明，带来了“黑暗的中世纪”，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古代大帝国在此以前就已经变质，古代文明在政治性的国家组织灭亡之前就已经衰退。

在西罗马帝国，早在鄂多亚克把皇帝的徽章还给拜占庭以前，东方的宗教已经传播开来，各个小区域的独立不断发展。在中国，西晋王朝时流行佛教和道教，地方小区域的分立开始出现。人们心中认为“物质财富消费越多越体面”的审美观和信奉“能让人们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是正确的”伦理观念开始消失，崇尚清贫和隐居山野竹林的中世纪精神流行起来。

使古代文明崩溃灭亡的，不是北方蛮族的无知和凶暴造成的文明破坏，而是在此以前就在发生的人们审美观和伦理观念的变化。正因为如此，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高度文明和压倒多数人口的大帝国，才会被贫穷野蛮的少数北方民族所打败。

当然，这种结局是当时文明圈里的居民所不欢迎的。中国西晋最后一位太尉王衍，在其王朝被北方蛮将石勒征服时，曾慨叹"若非耽于无益之清谈，致力于国防与理财，当不会如此矣"。这恐怕是当时晋朝上流阶级共同的感慨。然而在出现这一结局之前，正是这个王衍耽于清谈，被称为名门琅琊王氏之俊秀，众人为其高雅所倾倒。

在现代人看来，王衍身为太尉，应负责国防，却不理政务耽于清谈，只能说是一个头号傻瓜。这种不负责任的蠢人作为战败的罪魁理应被杀。然而就连野蛮的匈奴王石勒，也因王衍的过度高雅不忍将其斩首，而是当其从石墙边走过时推倒石墙将其压死。可见在被称为永嘉之乱(三一一——三一六年)的这一事件发生时，甚至在北方民族中间也出现了如此评价人物的倾向。

同样不可思议的现象在西洋也有很多。公元四五二年，已逼近罗马的匈奴王阿提拉，听从教皇利奥一世的劝告去了北方。据说这位蛮族之王特意放过富裕之都罗马，是因为害怕被教皇开除，这肯定是后来基督教会为加强开除的惩罚效果而编造出来的。阿提拉王不是基督教徒，决不会害怕什么被开除。倒不如说这个蛮族之王也同那个见到王衍的风采不忍处刑的石勒一样，已经进步到具有中世纪人的思维方式，懂得比掠夺罗马这种物质上的利益更高的精神上的满足。

总之，古代文明不是由于退步和破坏而衰亡的。而是由于

在此之前先进文明地区的居民们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发生变化，不断地向其他方向“进步”而被抛弃的。这也是建立在同古代文明完全不同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基础上的新社会，即中世纪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就是说，如果以中世纪文化为标准进行评价，那么古代文明的衰亡之期，正是脱离低劣的物质文明，形成神所支配的合理文化的伟大“进步”之日。

现在，我们相信社会还在继续取得“更大的进步”。科学技术正在更加高度发展，经济还在持续增长。生产与生活设施更加完备，信息流通越来越广泛。但是正因为如此，“明日的社会”不一定会成为更加高级的工业社会。

假如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审美观与伦理观念和工业社会的不同，那么进步的结果所产生的社会也会具有和工业社会不同的观念与规范。而且即使那是一种比今天消费物质财富量还要少的、远离所谓“合理精神”的社会也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中世纪人“伟大进步”的结果，创造了物质财富消费量比古代少的不合理社会。

重视社会主观的中世纪社会

十三世纪末欧洲发行一种《植物图鉴》。上面详细地绘着各种“植物”的图案，这当然很好，但与此同时尽是些奇形怪状的草木。曼德拉哥草的茎是人体，叶子上拴着一条狗，油鲟草的根成了有脚的鱼，等等。每一幅图的下边还详细地标有产地、采集时间、调制方法和药效等等。

十三世纪时的《植物图鉴》之一部分



图中左起分别为曼德拉哥草、油鲆草、天南星草

当然，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植物。但是当时的植物学家却极其认真地出版这样的植物图鉴，当时的人们也相信它。

如果说"人是神创造的"，"地球是一块平板，太阳和星星在它上面的天盖上运行"等等，这不能不归咎于观测手法的落后。即使在今天，如果这样讲给孩子听，他们也会天真地深信无疑。但如果是周围常见的植物，说它的茎是人体，叶子上拴着狗，那么就连三岁的孩子也决不会相信的。

但是在十三世纪末，这个欧洲中世纪正趋结束的时期，竟然发行和通用这样的《植物图鉴》。不仅这一点，在中世纪各方面都有这样的现象。

在中世纪的欧洲，有一本大部头的《恶魔大全》，是长期以来的权威书籍之一。它不愧是大学和教会的学者文人们的几十年研究之集大成，对"恶魔"的性格、行动、形状、影响等等都有着极其详尽的记述。其中尤为重视的是恶魔的性行为，对它的

阴茎有一段很长的说明，说它又细又硬象冰一样冷。

与“恶魔”性交的女性就变成了“魔女”，贻害世上，使人不幸。由于相信这一点，对“恶魔”性行为和性器官等的研究格外盛行。在欧洲，数百年来最受重视的“法令”之一就是“烧死魔女”。库特·巴休匹兹写道，岂止上百万男女成为它的牺牲品。

“烧死魔女”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但其起源当然是在中世纪。甚至在牛顿时代的英国和独立前的美国，仍盛行对魔女处火刑，这也是中世纪精神的残余。

这两个事例——绘有奇怪草木的《植物图鉴》和对恶魔研究的狂热努力，是中世纪文化的象征。就是说，对于世上的事物不想照耳闻目睹的那样去理解。

这一点虽然在欧洲基督教文化圈内最明显，却不是欧洲特有的现象。在中国、印度、中东伊斯兰世界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倾向，美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古代美术无论是希腊、罗马，中国的秦汉时代，印度的曼陀罗美术，都是极为精巧和写实的。但是一到了所谓中世纪，严谨的写实就见不到了，出现了甚至是幼稚的象征性美术。

中世纪欧洲教会的圣母像等，形体和面庞极不相称，拜占庭的镶嵌画中，基督和圣人们身体细长得根本不能直立。人物像一律是一身九头，注重写实的画家被认为是拙劣的而遭驱逐。

在中国，南北朝时代起(五世纪到六世纪末)也开始出现模式化的美术作品。帝王的脸千人一面。尤为突出的是，把中心人物不合理地放大，帝王的脸比随从的大两倍还多。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帝王长相相同，或是清一色的巨汉，而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画家不是去写实，而是按照心目中的标准去描绘

"理想人物"。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中东伊斯兰美术。它否定写实的造型，只喜欢复杂的抽象图案。在伊斯兰寺院和中东的王宫等地见到的华丽而复杂的图案，充分显示了当时艺术家的高超技术。但是他们无意正确观察和描写世上的事物。留传至今的中世纪伊斯兰圈内的肖像画，其拙劣程度与那些精巧的抽象图案根本无法相比。而且帝王等也被不合理地放大并画在中央。

就是说，到了中世纪，人们不再正确地观察事物，而是重视自己心中的想像和社会上信奉的神话。可以说与物质财富的客观性相比，充满了重视社会主观的文化精神。

中世纪人对物质财富缺乏关心，对物的数量也没有正确的认识。无论是西洋、东洋还是印度，中世纪时代记录的数字都是明显地夸张的。"尼伯龙根之歌"、"罗兰之歌"中的夸张说法，中世纪战记中异教徒的惊人数目，"白发三千丈"所代表的唐诗特有的夸张等等，都是中世纪独特的非现实的表现。在日本也同样，中世纪思维方式最盛时代的《方丈记》和应仁之乱的记录中，军队人数之多都远远超出实际情况。中世纪的信息传达不是强调正确性和具体性，而是注重主观的心情描述。

所以，那时不会产生观察事物、探索其形状和运动原理的所谓"科学意识"。中世纪，特别是相当于其前半期的中国南北朝时代和五世纪到十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不仅完全停滞不前，而且甚至是倒退的。到了中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唐朝和欧洲的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技术又有了相当的进步，但其速度并不是很快的，许多领域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恢复到古代的水平。

接受后进地区宗教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按照以往的一般说法，首先要举出“宗教的束缚”。的确，中世纪是世界性的——至少在文明的“中心地区”——宗教全盛时代，其影响是相当大的。但是，宗教为什么会被人接受，并长时期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呢？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

在中世纪，整个欧洲被基督教所统治；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印度，以后又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地区都被伊斯兰教所统治。这两大宗教本是同根的一神教，具有一神教特有的严格戒律和不容批判的圣典。这一点是同神话集中人性味十足的、充满矛盾的奥林匹斯众神和日本八百万神的信仰完全不同的。在不容许批评的一神信仰中，对戒律和圣典不能有丝毫反对，那怕是亲眼见到的事实也不例外。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美国的一些州还在审判公立学校能否教授违反圣经的“进化论”的案子。由此可知在中世纪宗教束缚是何等强大。

但是寻根究底，贫穷的巴勒斯坦被征服者中间产生的基督教和阿拉伯沙漠的小商旅中产生的伊斯兰教，为什么会被具有高度科学技术和经历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的罗马希腊以及中东、印度的居民们所衷心信仰呢？这难道不奇怪吗？按照现代的情况，技术和思想都是从较先进的地方传向较落后的地区的。

不仅如此，宗教的一个特点是，尽管它具有自己原来的戒律和圣典，但随着其传播和确立，最后总是同当地当时的思想方法和习惯相结合并融为一体。基督教在向欧洲传播的过程中，其形式和内容也都起了很大变化。产生了政教分离的教会组织，本应是犹太人的耶稣变成了金发，本来是在夏天的圣诞节

同日耳曼人的冬至节合为一体，等等。伊斯兰教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向波斯、印度传播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中国也同样。中国人自古就是所谓“不信神的无敌民族”，缺乏宗教意识。中国的儒教和老庄思想等是阐述人生处世和社会统治方法的哲学，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宗教。儒教与祖先崇拜相结合，老庄思想与道教等相关联，因而具有宗教色彩，但这毋宁说是与朴素的习俗信仰相结合的结果。但即使在中国，从相当于中世纪的三国时代到唐朝，宗教特别是佛教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其说不一。一般认为是始于前汉末的公元前二年，由大月氏国的使节口授给景卢。以后约六百年间，中国的佛教以西域的为样本。就是说，佛教对中国人来说，不是先进国家印度的宗教，而是西域的野蛮后进弱小国家的宗教。在这一点上，它同巴勒斯坦被征服者中产生的基督教进入罗马希腊，阿拉伯商旅中产生的伊斯兰教传播到波斯和印度一样，都属于文明的逆输入现象。

曾是蛮族信仰的佛教，在南北朝以后的中国已具有强大的势力。热衷于建造云岗、龙门等西域风格的大石窟寺院也主要是在南北朝时代，即中国的中世纪前期。这也是因为具有一种为贫穷落后国的思想所倾倒的精神。

中世纪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停滞的原因之一是宗教的束缚，这固然是事实，但是在先进地区的居民中间具备着一种接受并欢迎严厉的、束缚性的后进国宗教的精神，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形成这种精神的是什么呢？其中之一就是前面讲到的先进地区居民自身的变化。公元二世纪以后，无论在罗马帝国还是

在中国的华北、印度西北部，原来的先进文明人数都在减少，北方的蛮族等大量流入。后进国的宗教在这些不谙古代文明的人们中间找到布教对象也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能说明问题。在古代和近代，流入先进地区成为下层劳动者的后进异民族想要同化先进文化，他们不愿学习与后进地区、也是与自己家乡不同的地方产生的文化。不仅如此，当基督教进入罗马世界时，佛教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传入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时，原来的先进民族中也出现了大批愿意皈依的人。因为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种倾向，愿意放弃自己的创造了光辉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古代文明。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是对物资的生产量的增加感到绝望，这种绝望是由于不可能再开拓新疆域和能源危机而显露出来的，同时也是由于自由时间的过剩而产生的一种瞑想。

“物资不足、时间有余”的文化

古代文明社会因追求物质财富的丰富而发展、扩大，但西洋在公元前后，中国在比这更早的时期，已不可能再进一步扩大疆域，同时由于森林资源的枯竭，能源渐渐不足，难以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只能加重土地的荒废和能源的不足，因此“有心人”开始谴责物质财富文明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财富消费得越多越体面”的审美观和“节约紧缺物质是正确行为”的伦理观念所培育的人类“良知”，开始转向反面，即对以消费更多物质财富为荣的古代文明加以否定。

人们不再追求生产和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而认为获得更

多的自由时间，追求"心灵的丰富"才是高尚的生活方式，对没有染上古代物质文明"毒素"的后进地区宗教表现出极大兴趣。

希腊人和罗马人被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和北方日耳曼的朴素信仰所吸引，就是基于这种反物质主义的精神。在中国，外来宗教的传入比西洋晚，有一个时期曾流行自己的反物质主义思想——老庄思想，流行清谈。后来它被西域传来的佛教所取代。在中东和印度，伊斯兰教兴盛以前，祆教和印度教等也有很大的势力。中国和中东的例子说明，并不是宗教创造了中世纪，而是比宗教更早流传的中世纪精神为宗教的强大准备了条件。

中世纪的时代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物资不足，时间有余"。根据中世纪的经济水平低而推测"贫困无闲暇"，这不过是受工业社会物质文明毒害的现代人的臆测。事实上，古代末期，随着中世纪色彩不断增加，欧洲和中国都增加了休息日，缩短了劳动时间。

蒙特内尔写道，在罗马帝国末期，四世纪以后，作为休息日的节日一年竟有一百八十四日之多。每周不是休息两天，而是平均休息三天半，而且劳动日的劳动时间也都很短，所以每年实际劳动时间大约在一千五百小时以下。其劳动时间比今天最先进的工业国还少三百小时。

进入真正的中世纪以后，劳动时间更加减少。据杜库尔记载，即使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农民冬天都有三个月几乎没有事做，夏天也要找出各种理由规定休息日。宗教节日也很多，此外还有因各地各行业个人的宗教保护人之名而规定的休息日。当然，星期日是绝对的礼拜日，不仅不工作，连清扫和学习也都被禁止。此外，村落共同体和各种行业公会都规定严格的劳动时间，禁止提前工作。在中世纪，不该劳动时劳动，比该劳动时

不劳动罪过大得多。

在地理位置比较靠南的法国尚且如此，在冬季更长的德国和英国等情况可想而知。一家人住在一间用羊皮纸或麻布挡住小窗的屋子里，暖炉里的火是唯一的光源，就这样度过四个月以上不从事生产活动的冬季。而且夏天里的礼拜日和节日也不从事任何劳动。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基本上不从事经济生产。王侯贵族之家很少务农，数量急剧增多的僧侣和修道士也不怎么劳动。修道院虽然也从事农耕、畜牧和纺织等劳动，但这种生产几乎都不足以维持自身的生命。据诺尔斯记载，五四〇年蒙特卡西诺的圣贝来狄修道院的日课是，劳动时间从上午八时十五分到下午二时三十分，计六小时十五分钟，而且中间还要有三次祈祷。在最典型的中世纪前半期成立的贝来狄会，人们想的是“象领主那样过不劳动的欢乐生活”(博莱斯特)。许多修道院造黄油和葡萄酒出售则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在土地和资源有限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辛勤劳动，就可能耗掉他人的土地和资源。特别是在中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入会地和森林，如果到那里去热心地采伐树木是很成问题的。在大家休息的时候你拼命工作不仅是卑劣的，甚至是犯罪的。

在中世纪，受尊敬的人是“穷人皮埃尔”、一文不名的高铁尔、“懂得鸟语的”弗朗西斯科的圣方济各会。他们都是些无益于经济生产的清贫禁欲之士。

当然并不是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尽是圣人，绝大多数人都想过更丰富的物质生活，想得到金银财宝，但他们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辛勤劳动和合理精神，没有科学的观察与思考。更不要说为此大大缩短自由时间，改变社会主观等等。可以想象一下

今天的中年日本人的逆反心理，他们希望增加余暇时间，却又不愿意增加到降低工资(即物质财富消费可能性)的程度。

在中世纪，不追求大量的物质财富被当作一种美德，所以对世间评论颇为敏感的“高贵人”不但决不想犯“勤劳之罪”去从事生产活动，反而夸示无欲乃至清贫。

约翰·惠金格讲了很多关于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们近乎野蛮的非物质主义的故事。一些法国的贵族青年发誓，一年中只穿一件粗衣。结果好几个人被冻死。美貌的贵妇人赛比娅发誓，丈夫随十字军远征不归来决不脱内衣，结果内衣因汗垢而变成褐色。当时的人们对此极为赞赏，尊称为“赛比娅色”，并流行起几年不换内衣的作法。对喜爱罗马澡堂的古代人来说，这本来是不能忍受的不洁。

但是，在轻视物质财富的同时，中世纪人把多余的时间用于思辨的摸索及其表现。结果树立了远离现实的空想和社会主观意识。前述的奇怪的《植物图鉴》和《恶魔大全》就是这种思索的产物。一身九头的圣人图，失去平衡的圣母像都是追求理想的形象而反复思辨的结果。中世纪人正是在这些甚至是幼稚拙劣的画像中看见了内心的美。而且为把它表现出来花费了漫长的时间。建立一个教会要一百多年，这种例子是毫不稀奇的。

中国的情况也基本相同。中国人自古以来是勤劳的民族，但是到南北朝时代发生了变化。从晋朝以后到唐代，中国贵族阶层的高级官僚耽于诗与酒，不要说生产活动，连行政工作也不太去做。不仅如此，甚至舍弃这种官僚生活，隐居竹林，甘愿过布衣粗食、醉心清谈的生活。结果耕地荒芜，生产力低下。

公元四世纪末的诗人陶渊明，因为“田园将芜”，辞去县令

职务回到故乡，但他既没有成为热心的农耕者也没有去指导农业。而是住在令人怀念的故屋，在长满杂草的小径上散步，眺望自生的野菊和长高的树木，把酒独醉。诗人把这称作"感吾生之行休"(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慢慢临近死亡),"觉今是而昨非"(知道这样的生活才是正确的，而以前作官的生活是错误的)。

诗人陶渊明所慨叹的不是农村经济的贫困化，而是由于人的强烈欲望所造成的过分耕种。他回故乡决不是去搞什么"一村一品运动",所以他为故乡草木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而高兴，对生活中能有大量余暇时间感到满意。

这种思想和生活态度同隐身竹林、醉心清谈的王衍等一脉相通。就是说，这位诗人也是象征中国中世纪前半期时代精神的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他的诗受到很高评价并久传不衰。

从三国时代到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中国，有很多隐居田园，过无为生活的"贤人明哲之士"。而且他们还受到世间的尊敬。《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特意把这些人的事迹写成"独行传"、"逸民传",载入青史，并加注释说，这些是"虽与历史无关但忘之可惜的人物"。相反，司马迁曾热心撰写的财主们的列传"货殖传"在书中则见不到了。在经济生产方面获得成就的人物不再受到高度评价。这是因为《后汉书》虽然是记载后汉时代历史的正史，但它成书是在五世纪前半叶，比下一个时代的正史《魏志》等还要晚。就是说，它是以中世纪前半期的精神写成的一部史书。

在中世纪，中国也为建造石窟和石质、木质寺院花费了漫长的时间。造龙门、敦煌石窟甚至费去了数百年时间。但是另

一方面，经济生产停滞，许多农田成为弃耕的荒地。经营庄园的贵族和在那里干活的庶民都对劳动不感兴趣，而是喜欢自由的思辨。

物质生活和科学技术水平都很低的后进国的宗教，就是以这些人的审美观和伦理观为基础，才得以普及并威力大振的。

排斥理性主义的中世纪

奥托·博莱斯特说："中世纪是另一个世界。"人们不关心物质财富，而是沉迷于思辨。因此时间很充裕。中世纪的"时间"不象今天这样加以划分，而是直到神的最后审判日为止的一种永恒的连续。因此，中世纪骑士故事的主人公们决不会上了年纪。甚至一年中也没有明确的划分，总之是终于冬、始于春。放弃了古代物质文明的"高贵人"用于思索的"时间"就是这样的时间。

那么这样一种中世纪社会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规范呢？首先是，整个社会都缺乏对物质财富的关心，因此物质财富的价值并不是决定社会构造和人的行为的主要因素。

在"物资不足、时间有余"的中世纪社会，节约被看作是正义和善行。因此物质财富的生产、加工以及扩大流通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当然，就个人而言，几乎所有的中世纪人都希望占有和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即具有"卑劣的物欲"，但它惮于外露，而且不是全社会的共同想法。就整个社会而言，增加物质财富并不是足以决定社会规范的重要因素。

对物质财富漠不关心的中世纪人用大量的时间去思索，就会产生许多空想和抽象的概念。为此提供明确对象的，是这个世界的不可思议和生命的神秘性。在科学知识和信息远远落后

于今天的中世纪，充满了不可思议和神秘感，很容易相信有神和恶魔在操纵这一切。死后的世界和来世的印象等无疑是兴味无穷的课题。

这些条件使人心倾向宗教，倾向充满神秘性与厌世气氛的巴勒斯坦被征服民和阿拉伯穷商旅、西域小都市群的宗教。

宗教本来是主观的，然而一旦信徒增加，一旦社会化和组织化，就具有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即宗教主观容易变为社会主观。因此也就越来越强大，迫使人们接受这种主观，并排斥和镇压与此相反的主观。所以任何宗教都带有严厉镇压和对抗异教异端的阴影。其中对宗教来说最可怕的“敌人”是以客观事实进行反驳的对手。由于他是靠“事实”这一“武器”强大起来的，因此一旦让步，恐怕就要无限度地损害社会主观。

所以，在宗教精神强大的中世纪，想靠理性去观察和认识事物的理性主义被当作最邪恶的思想而受到攻击。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古代理性主义使天主教教会发生动摇，结果便被当作异端，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也是如此，从老庄思想和佛教盛行的南北朝到隋唐时代，古代科学知识被遗忘，以物质财富价值为社会规范的法家思想遭到排斥。只有以儒教的政治道德为依据的古代思想，由于和宗教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调和而被继承下来。从缓和宗教束缚的角度来讲，它对中国十世纪时开始的“亚近代”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儒教在中世纪时被固定化，作为社会主观而固定下来，结果成为从“亚近代”向真正的“近代”发展时的障碍，这一点也是应该提及的。中国的不幸在于，本来具有古代合理性的儒教精神与官僚保守性相结合，结果被模式化了。

社会主观优先于物质财富价值

轻视物质财富、重视社会主观的倾向也决定了中世纪的社会规范。为物质财富的丰富感到幸福的古代人，把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和占有量作为评价人的尺度。然而中世纪却不是这样。人的做工(劳动)的成果(生产量)与报酬或评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

对事物不按其本来面貌去理解，对人的劳动成果也就不会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某人有多大的生产能力、谁劳动了几小时、做了多少东西等等，在中世纪几乎不去进行计量和评价。至于按计量结果支付报酬等等更不在考虑之列，因为获得劳动成果不是由于人的能力和努力，而是神的恩赐。有了成果应该奉献给神而不应该支付给人。给予人的不是成果而是“尊敬”。中世纪人对劳动与报酬的关系就是这样认识的。

那么“尊敬”的程度是靠什么来决定的呢？在中世纪的欧洲是靠“位”，或者叫“身分”。这个各守其位的社会才是“有秩序的社会”。各人在什么位子上，按阿尔克温书简，是“神圣所赐”。更具体地说是评价，也就是社会主观。决定这种社会主观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血缘。这是一种极易理解和监督的基准。

这样就产生了世袭制身分社会。现代的历史学家把中世纪规定为“封建社会”。但是把“封建”的意义限定为对土地支配权的世袭，则是物质欲望强烈的现代人容易产生的误解。

在欧洲，特别是十三世纪以前，财产继承制度和维持封建领地的秩序并不一定是明确的，血缘本身比对封建领地的统治更能成为“尊敬”的对象。没有承袭封建领地的名门贵公子和失去封建领地的贵族等也经常被当作“高贵者”看待。在中东、印

度和中国，封建领地更不作为主要标准。

中世纪的中国也是贵族统治很强大的身分社会，但实际上还找不到任何根据说它是靠封建领地的世袭来维持的。受西方历史学影响的近代历史学者只是推测“肯定如此”。

例如，山东省琅琊的王氏，是中世纪前期有名的最大的贵族，但这一家族到底有多少封建领地完全不得而知。至少在西晋因永嘉之乱灭亡后，山东省处在北朝统治下，王氏的领地应该丧失。然而，该族在东晋时越发繁盛，东晋约一百年间达到三公地位的有三百五十五人，其中王氏一族占了六十九人。王氏作为大贵族的名声和经济力，就是靠这种同族关系和公俸来维持的，而不是靠广阔封建领地的世袭。而且王氏一族的名门声望从唐末一直延续到五代初期。就是说，中国贵族的身分世袭不是靠封建领地的承袭，而是靠“尊敬的继承”来维持的。

当然，“尊敬”的基准不光是血缘，出色的人格与信誉、勇气以及清贫的生活态度等等也都是重要因素。在西方，这些品质兼而有之者还被列为圣人，在中国则以高官相请。但是这种“尊敬”的基准大体上与经济生产和取得政策性效果无关。因为法国的贵族青年们只穿一件单衣而冻死、赛比娅过着不清洁的生活、王衍耽于清谈、唐朝的高官们终日醉酒，都是因为勇气、贞淑、清贫、禁欲、超然等等成了尊敬的基准。

一物多价与不等价交换

对人的评价如此，对物质财富和服务的评价也不得不如此。在中世纪，多数情况下，物质财富的价格和服务费的确定与其使用价值和成本无关。重要的是当时当地的气氛与买者的支付能力。即使同样的东西，往往王侯贵族买就要千两，而商人买

则要百两。但有时也有相反的情况，因为是王侯贵族则价钱便宜。当时大量存在的物物交换，情况更是如此。至于服务则根本没有标准。有的人只因身分高或者有名望，即使什么都不做也能领取高报酬。有的人则相反。同一种服务因为对象不同，费用也相差几十倍。对象相同也还要因时而异。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说风凉话，世道是太平的。

总而言之，在中世纪，劳动也好，物质财富服务也好，不存在一物一价的规律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这里，原则毋宁说是一物多价和不等价交换。我们生活在工业社会，浸透了经济主义的“恶习”，所以相信只有等价交换才是千古不变的大原则，实际上并非如此。等价交换的普遍建立是在古代和近代，即对物质财富怀有强烈欲望的、物资丰富的时代。

不仅如此，在这个时代无偿的赠送和掠夺行为也是司空见惯的。向神佛的供奉和向教会寺社的捐献占去了当时生产成果的相当一大部分。对贫者的施舍也习以为常。在农村共同体和职业行会中习惯于收留非亲非故的病人和孤儿。此外，还经常在节日和宴会上毫无理由地慷慨施舍酒食和衣服等。这个时代最受重视的德行之一是“宽容”，其具体内容就是“不惜财物，经常慷慨施舍”。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世纪人都是些笃信神佛、大慈大悲的善人。事实恰恰相反，没有任何时代能比中世纪更充满可怕的暴力与凶狠的掠夺。

法国北部拉昂附近的修道院长吉伯特在《回想》一书中叹道：“有些事即使在蛮族或不懂规矩的斯基泰人当中也要被看作是不守信义，然而在这里却已司空见惯”。在拉昂的街市上，买卖双方经常争执斗殴；把百姓诱至家中，关在箱内，索要赎身

钱的商人也并非罕见。骑士身分的人及其随从大白天公然抢劫，或手执武器当起强盗，这种事也毫不稀罕。

行凶杀人的事经常发生。沃尔姆斯的主教布尔里赫特也曾慨叹道："圣佩特尔寺的属民们象野兽一样互相残杀。有的是因为喝醉了酒，有的是恃才骄横，有的干脆无缘无故地突然扑过去。……杀人者不但不后悔，反而到处吹嘘自己的犯罪行为"。然而一般人包括牧师在内，对这类事情却连叹息都不曾有过。

当然，骑士结伙掠夺市镇，或流民袭击村庄等事也时有发生，城镇中各地区之间也常发生争斗。所以教会和贵族邸宅、城镇、村庄等都需要严加防守。今天见到的中世纪教会和城馆都设有坚固的军事设施，城镇四周建有围墙。据说在中世纪只要岗哨一发出警报，人们总是连家畜都统统赶到城墙里面。而且，不仅对城外，甚至对城里也不能掉以轻心。在教会和贵族的城堡，在面向自己所属的城镇的方向，也和对外一样作有"堞口"，这个词的意思说穿了就是"杀人窗"。

在中国也是如此。从南北朝到唐代，不仅城镇和村庄都围有城墙和栅栏，而且城市中还设有严格的坊制，这是一种坚固的防御体制，建筑物围绕中庭彼此相连，只在临街处开一个很小的入口。因此，即使是大唐都城长安，除了规定的市场外，实在是满目萧条。太阳一落山，城门和各坊门都要紧闭，连一个孩子也不得通行。

在这种情况下，旅行是最危险的，物资的流通当然也是极其困难的。中世纪的原则是孤立的村落和小地区自给自足，商业是极为例外的。这个时代的商业是一物多价、不等价交换，虽然有时也获得莫大的利益，但经常伴有危险，所以商人们必

须组织起来，武装行动。

自给经济和商业活动的衰退也说明货币经济还不存在。中世纪在欧洲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货币经济，中国也基本如此。在中国，铜钱铸造量猛增是在五代末，特别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五代最后的皇帝、后周世宗柴荣自己抡锤砸毁大佛像铸造铜钱的故事，说明随着“亚近代化”的迅速发展，这个时期对货币的需求已有很大增加。

总媒介社会

中世纪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信息的传达上，不注重根据词语和数据所作的正确而具体的表达，而注重作为气氛的、抽象和凭感觉的传达。

前面提到，对物质财富漠不关心的中世纪人，对物质财富的形态和运动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数量上也多半是明显的夸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喜欢根据词句和数据提供信息。即使罗列了长长的词句和大量的数据，其内容由于社会主观终归要被夸张，发生变形，不可能是正确的，接受信息的一方也缺乏耐心和理解力，所以常常是完全弄错了。

中世纪人喜欢的信息形态是抽象气氛的交换与共有。宗教感情常常作为“天启”，在特殊的气氛中得到传达。人格、人道等等对人的评价也可以说是气氛的产物，传达它的是包括所有五种感觉在内的综合信息。

中世纪的信息主要是制造、传达这种价值观的综合气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总媒介。

中世纪的宗教都具有这种综合气氛。欧洲的基督教用拉丁语作祈祷，不要说一般人，就连牧师也不甚了了。中国的佛教

用一种难懂的音调诵经，在所有的场合都注重音律效果，加上乐器，靠灯光和奇异的服装进行演示。

宗教仪式用的建筑物也与之相适应。古代希腊罗马的神殿和剧场、广场，着力于易于宣传、易于理解的音响设计，而中世纪的教会设计则为了产生共鸣而故意使之能够留下长长的余音。室内是不适于众人讨论的布局和高得出奇的天花板。这是为了产生光线从天而降的效果和通过在朦胧中演出制造神秘的气氛。不仅如此，教堂的墙壁和窗户上都雕刻有天堂和地狱景象的图案，使人一看见就产生憧憬和恐怖的感觉。堀田善卫氏在《旅人》一书中，对这些奇怪的雕刻群给予中世纪人的信息效果作了很精彩的描述。

中国的佛教和印度的印度教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古代秦汉以前的建筑物都是适合于众多人集聚的样式，三国时代以后佛塔剧增，描写极乐世界的曼陀罗和地狱画随处可见。在怪兽林立的印度教寺院，渲染气氛的带雕刻的画板遮盖了全部建筑物，成了类似今天连环画和科学幻想电影的空想的画像世界。

就连完全否定偶像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在总媒介的效果这一点上也决不逊色。用复杂的几何学图形装饰起来的寺院内外，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高诵古兰经和寺院的尖塔烘托出一派天堂的气氛。这个不设牧师的宗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一次次同时并肩做礼拜，增强一种共同感和参与意识。

文学方面也是如此。古代希腊罗马和春秋战国、秦汉时代，长篇散文很多，到了中世纪则流行诗歌，大多是击节咏唱，与其说是为了正确地表达，不如说更注重制造气氛。

中世纪重视这种作为气氛的信息，语言并不重要，也不需要成文法。无论是欧洲、中国还是印度，在中世纪，语言差别都

要比今天多得多，但人们并没有感到太大不便。这是中世纪独特的地 分立和大思想圈并立有可能产生的因素之一。

气氛性综合信息即总媒介的流行也是人们的关心从具体向印象、从物质财富向社会主观变化的一个重要证明。气氛型的信息常常为接受者的主观意识留有余地，为了接受它，需要一致同意即使牺牲正确性也要尊重社会主观的共同性。

中世纪的组织与国家

中世纪文化的上述特点也影响到组织与政治方面。中世纪人对物质财富漠不关心，对其供应量的增加也不感兴趣，所以并不要求有效率的组织。另外，对人的评价不是根据能力和劳动成果，而是根据血缘和人格决定的总体"尊敬"，这也反映到组织内部的等级方面。所以中世纪的组织没有职能部门制度，只有"首长"和支持他的合议集团。不仅如此，有些甚至是连"首长"的位置和权限也模糊不清的"圆桌骑士"和"集体签名"等等。

在追求物质生产效率、靠正确的语言和数据交换信息的古代，自从埃及的"王家之谷"建造以来，就存在不同职能的组织。日本古代奈良朝也有大佛营造司等出色的职能组织。然而中世纪人不讲求物质财富供给的效率；永远有使不完的时间；重视总媒介造出气氛的社会主观的共同性，所以他们喜欢的不是不同职能的组织，而是人格组织。

还有一点，不存在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组织也是中世纪的一个共同特点。近代社会存在着作为物质财富权利主体的组织，即所谓法人。在这里，物质财富(财团)是组织的基础，有了它，即使人员变换，组织也照样存在下去。国家、企业和财团法人

也是如此。

事实上，在古代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还不那么明确。例如希腊的城邦和罗马帝国作为组织的“实际存在”，其延续都与统治者的血统无关。中国的郡县制国家的构成和波斯、罗马的州制，其知事等可以更换，但组织形式不变。

到了中世纪，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组织几乎不被考虑。统治组织的基础仅仅是人为的统治权。统治者不在了，统治组织也随之发生变化。某公爵家绝后了，其公国也就不存在了，被别的王或公侯凭借血缘和手段所取代、所瓜分。

但是这种统治权并不是只靠血缘关系和暴力才能得到的。在中国和阿拉伯，有时是采取皇帝或哈里发授予权力的形式。唐代前半期从太宗到玄宗时，这种形式执行得比较严格，节度使的职位几乎是固定存在的，前任者死亡或解任后，由皇帝任命新任。但即使在这种场合，由于家臣团已大部分换人，所以不仅与近代官僚机构的概念不同，与古代郡县制也有差别。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是在唐朝权力最强盛的一百多年里而已。安禄山之乱以后，节度使重又成为自封的人为组织。这与宋朝以后的“亚近代”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即使在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减弱后，组织形态也仍然非人为地存在下去。

关于中世纪的组织，还应该补充一点，就是存在着以思想观念为核心的组织。比较典型的是教会等宗教团体。中世纪采取信仰这种形式的思想团体有很多，如基督教会和修道会、伊斯兰教团、佛教寺院、骑士团等等。这些组织人员更换后，组织仍存在。这一点乍看好象与古代的帝国和近代的法人相类似，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以对物质财富的权利为基础的法人，而是靠其成员的共同思想观念，即社会主观形成的人的集团。所

以寺院的建筑物烧毁后还可以重建，教会失去领地后也能够存在。约翰骑士团失去在巴勒斯坦的领地后，又在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岛复兴。就是说，教会和寺院不存在破产现象，有的只是成员继承的有无。

中世纪人把社会主观的共同性看得优于一切，对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组织持否定态度。因而这个时代不存在具有国土和成文法的近代概念上的“国家”。有的只是基督教圈、伊斯兰教圈、佛教圈这种具有共同社会主观的思想圈和依靠人为统治权管理的领地。所以，即使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骑士们在一起组织十字军，或结成骑士团，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障碍。

伊斯兰的阿巴斯王朝和中国的唐朝都是堂堂的大帝国，但它们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家，应该看作是具有共同宗教与文化的思想圈。因此这里完全没有出生地和民族的问题，象安禄山那样的胡人也能够立即成为实权人物。

国家拘泥于领土与民族是近代的一个特点，这时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关心增强，能够敏感地察知人的形貌和使用语言的不同。对物质财富缺乏关心的中世纪人则不太重视人的肉体形态和使用语言方面的机能差别。

中世纪终结的原因

古代社会和近代工业社会的审美观是为物质财富的丰富而感到幸福，伦理观是相信使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是正义的。所以人们都为使物质财富更加丰富而努力，产生了对此有利并且方便的制度和组织，确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规范。

然而中世纪完全不同，物质财富匮乏，人们对物质财富大都漠不关心，缺乏为物质财富的丰富感到幸福的审美观，更不

相信增加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是正义的。无论是西洋还是东洋，中世纪人都是形而上学的，都注重于一点，即忠实于可以说是在空想的思考中产生的社会主观。而且其最重要的社会主观是采取宗教这种形式建立起来、并被组织化的。

然而，认为宗教所代表的中世纪社会主观完全是固定的，则大错而特错了，有时在极短的时期内也出现戏剧性的变化，比较明显的例子是统治了欧洲社会的基督教，也在圣奥古斯丁著《神国》的五世纪前半叶，或十一世纪后半叶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时进行了大的改革。在东洋即中国文化圈则更加大胆，主要宗教也由二、三世纪的神仙道变为四世纪以后的佛教，佛教本身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印度的印度教也经历了几次大变革，主要是伊斯兰教这种强大的新宗教传入后与之进行了斗争和融合。

但是，尽管这种宗教或宗教内部的思想和体制等发生变化，注重社会主观、不重视客观的物质财富多寡这种基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却没有变。因此，不合理反理智主义的宗教组织越巩固，物质财富的生产越难以扩大。追求物质财富丰富性的古代和近代社会，建立了有利于它的制度和组织，因而具有使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的内部构造；同样，中世纪社会建立了妨碍物质财富更丰富(即扩大生产消费)的种种制度和限制，它的内部构造使人们的关心越来越远离物质财富，集中于思辨的社会主观。任何社会要想广泛地建立并永远存在，都要扩大和加深其存在的条件，进行自我增殖性循环。

那么，不断地进行这种自我增殖循环的中世纪社会为什么崩溃了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社会并不追求增加物质财富的供给。

在中世纪，生产力起伏很大。兰德·卡梅伦认为欧洲的生

产力有三次较大的起伏：①九到十世纪上升，十二世纪到达顶点，十五世纪中叶降到最低点；②十五世纪中叶开始上升，十六世纪后半叶到达顶点，十八世纪中叶结束；③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到二十世纪中叶，一九四五年前后结束。他把这种巨大的波动称为“逻辑曲线”。

关于这种波动的时期划分，特别是对把一九四五年作为第三次起伏的终点(因而把此后作为第四次起伏的上升局面)，仍然有很大疑问。卡梅伦也没有说明这次起伏的顶点是什么时候。据市川泰治郎说，某个欧洲历史学家提出“一周期三百年”说，因而大约是公元二〇八〇年。但是从中世纪后期到近代，分别以十二世纪和十六世纪后半叶为顶点出现了起伏，对于这一点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这两个高潮时期也正是中世纪社会的“危机”时期。

十二世纪是中世纪文化的鼎盛时期，十字军一次又一次组建，大教堂一座接一座落成。在这个世纪末即英诺森三世时代，教皇的权力达到了顶点。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历史往往把十二世纪看作是“最典型的中世纪”。反之，这种现象也说明注重物欲和世俗权力的理性主义倾向开始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不关心物质财富、排斥理智主义的中世纪精神的危机。

在十二世纪就有人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当时出现的卡撒里教派(阿尔比教派)和沃尔多教派严厉地批评了随着教会膨胀而增长的权力欲和神职人员的物质欲望。结果教会把他们当作异端，发动组织了征讨异端十字军消灭卡撒里教派。但是另一方面却默认和接受了吸收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阿夫罗伊兹思想。

实际上十二世纪的风潮即使再延续一百年左右，中世纪衰退、近代开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近年来在欧美史学界似乎已

成为固定说法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一词中，也可以看到古代理智主义复活这种见解。

然而中世纪的人们对这种“逻辑曲线”的上升局面却发出了慨叹。十一世纪的赞歌中唱道：“往昔世道好，充满忠诚、正义、爱。”十二世纪的历史学家奥尔特里乌斯·巴达里斯、诗人普罗巴斯、瓦尔特等人，也都发出了几乎同样的感慨。在他们中间充溢着浓厚的“生在世界末日”的意识。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在这个时期，随着物质财富生产力的低下，很快兴起了圣方济格和圣多明我的清贫主义，社会潮流出现了逆转。一二〇九年得到公认的方济格修道会的主张实质上同初期的卡撒里教派完全相同。

相反，巴黎大学因为继承了上个世纪广泛传播的阿夫罗伊兹思想而受到教皇当局的攻击，首谋的教授们被枢机卿即后来的教皇卜尼法八世所驱逐。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圣人和异端可以说正好颠倒了位置。欧洲中世纪的寿命因此而延长了三百年时间。

然而在下一个“逻辑曲线”的上升时期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事情。这就是向古代文明的回归，即所谓“文艺复兴”，反对宗教革命带来的反理性的社会主观。

这个时期也同上次一样，进入生产力下降的十七世纪时，出现了耶稣会等的反宗教革命，同时开始大肆搜捕魔女。十七世纪也可以说是“中世纪开始复活的时代”。

总之，对以不关心物质财富为前提的中世纪社会来说，“危机”就是物质财富的供给增加，人的“良知”受到刺激，人们追求更丰富的物质财富。

那么从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生产力是如何发展扩大的呢？

对此，历来有各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气候的变化。从九五〇年到一三〇〇年前后欧洲进入干旱期，特别是一一〇〇年到一一七五年前后气候十分寒冷，这些都抑制了树木的生长，使森林很容易开拓，耕地面积大大增加。

本来气候干燥的古代文明旧址地中海沿岸和中东、黄河流域面临森林资源枯竭的严重问题时，寒冷而持续阴天的欧洲却在以森林为主进行大面积开发。这个事实也为气象变化说增加了一条理由。

然而，气象变化说并没有成为定论。更为一般的说法是铁制斧锯的普及使森林容易采伐。另外中国中世纪的终结比欧洲要早得多，这件事也不能没有影响。

十世纪中国的"亚近代"

表示中国生产力变化的"逻辑曲线"还没有人去研究，但是可以断定，从七世纪初隋朝的统一到八世纪前半叶唐玄宗治世初期，是类似欧洲十一、十二世纪的上升局面。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联接江南与黄河；唐初僧人玄奘三藏到印度去寻求佛教经典，这些物质文明的理性主义精神都出现在这个时期。玄奘这种摒弃来自西域的佛典、直接汉译印度原典的精神，同基督教改革者们寻求希伯来语的圣经原典并把它译成当地语言的想法是一致的。而且这里也出现了与十二世纪欧洲同样的思想斗争。则天武后试图推行神秘的宗教化政策，恐怕就是一种反革命的表现。

在中国，中间顶点的出现比欧洲要早近五个世纪，这可能是因为漫长的印度"古代"的影响和对资源丰富的江南地区的积极开发。其确切的原因目前还无法断定，但高峰期没有持续多

久则是肯定的。从八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生产力趋于下降，中世纪复苏。

在中国，中世纪精神决定性地衰退始于唐末武宗的灭佛毁释(八四五年)。从这次"会昌灭佛"事件到五代末期后周世宗的灭佛(九五五年)，这一百一十年时间里反复四次实行的反宗教政策被称为"三武一宗之难"，它是同十六世纪欧洲宗教革命相类似的大事件。欧洲宗教革命的结果，产生了容易接受近代合理精神的新教徒，中国与之相应的是儒教。儒教注重统治艺术与人际关系，是一种现代思想，它取代了厌世色彩日益浓厚的佛教，说明近代合理精神已十分兴盛。"会昌灭佛"以后的镇压佛教是为了让增长过快的尼僧还俗从事农耕生产，这也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出现这种合理精神和物质欲求也是因为物质财富供给的扩大。资源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使之成为可能。

唐代的中国出现了以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为代表的广泛的技术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煤炭利用的普及。

中国山西省等地发现了丰富的煤炭资源，唐代中期以后开始加以利用。特别是唐末发明了炼焦方法以后，煤的利用迅速普及。到十世纪后半叶的宋朝初期，甚至远离煤炭产地晋(山西省)的首都汴京(今开封)，家家都已使用焦炭烧饭。

煤炭比木炭热量高，便于铁和铜的生产，因此铁、铜产量迅速提高。据北宋最盛时的记录，年产铁达一千万斤(六千吨)、铜一千五百万斤(九千吨)。没有统计在内的铁产量恐怕还要多。

铁产量的提高直接关系到农机具和刀具的发展，以往无法开垦的坚硬山地也可以耕作了。人类自古以来终于可以扩大疆

界了。从唐末到五代灭佛毁释、强令尼僧还俗，是因为存在着大量可供开垦的土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十分突出。

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主要用来种植茶、棉花、油料作物等新品种作物，即开始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

这样一来当然促进了物质性流通即商业的发展。铜产量的提高带来的货币铸造量的增加，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保证。中国自古以来不太信金，只使用铜钱。宋钱数量庞大，不仅东洋，甚至远至非洲的坦桑尼亚都有宋钱。日本等国干脆停止了本国的货币铸造，专门使用宋钱。直到今天，收藏家们把唐代以前的古钱看得十分珍贵，价格很高，而对宋钱则视为平常。

商业的发达与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分工的发展。在著名的宋瓷产地磁州和景德镇，分工竟有十七道之多，完全是依靠分工制进行大批生产。另外，农业也专门化了。据记载，有的百姓到城镇的市场上买菜。这些都扩大了生产力，促进了商业与货币经济的发展。

分工的发展也促进了职能组织的建立。唐朝虽然采用律令制，但实际的行政工作却靠"令外官"去做。实际上还不是原则性的组织。到了宋朝，出现了经过很好整顿的政府组织。高级官员的录用不是根据门第家世，而是经过严格的考试(科举)，进行有组织的任命和调动。军队完全靠国家费用供养，司令官不仅由皇帝任命，而且有义务服从皇帝的参谋部门参谋本部(枢密院)的军令。这完全是一种近代式的国家组织与军队。不过这一"近代式军队"由于过分地国家官僚组织化，变成了不负责任的人事轮换的工具，接连出现不胜任的司令官，因此战斗力很差。军队的司令官由三司(财政部门)的副职和宦官担任，任期二年，这已成为惯例，所以不甚称职是很自然的。

科学技术也有了显著进步，植物学、医药学、天文学等都发展起来。元代继承宋代技术制成的天文观测仪，到了明代更趋精巧复杂，以致难解其用法。美术方面写实有了发展，细心地观察自然被看作美术家的义务。这与唐代有很大不同，唐代流行文人画，不注重绘画本身的优劣，而只重所画人物的人格。

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后半叶北宋鼎盛时期是近代型高速经济增长与合理精神充溢的"东洋文艺复兴"，甚至是超越它的"亚近代"。

东洋"亚近代"的衰亡与文艺复兴

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在中国出现的"亚近代"，对稍晚时开始的西洋中世纪的生产扩大有多大影响，目前还缺乏可信的史料。但众所周知的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等技术经中东传入了西洋。十一世纪时欧洲也开始利用煤炭，这与中国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但是"近代"的基干即对物资的强烈关心及合理精神，则经过了很长时间才传播开来，在这方面首先受影响的是中东。

十一世纪后半叶是塞尔拉克·土耳其王朝的鼎盛时期，宋朝文物不仅从陆路的丝绸之路，而且从经由印度的南海航路传入。但得到文物的中东只是表面上繁荣，真正取得成果的是通过十字军等继承了它的欧洲。

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十字军这种最典型的中世纪宗教与军事活动是最终破坏中世纪宗教社会的远因，但很难说十字军带回的技术与组织概念直接与文艺复兴相联。这中间通过技术、组织以及异国珍贵物质财富的传入，欧洲自身增强对物质财富

的关心需要三百年时间。

十二世纪时的十字军战士热中于收集巴勒斯坦的圣遗物，对物质财富价值是一无所知的。为此在耶路撒冷兴起了制造赝品的产业。但即使是假的“圣遗物”，一旦大量流入便刺激了人的观察力。最后养成了观察更广泛的物质财富的习惯，培育了发展写实美术并进而探究其形象与运动原理的“科学意识”。

相反，早就萌发了近代精神的中国从十三世纪以后再次陷入长久的停滞。关于其原因有各种看法，首先是认为孤独的先进国通常技术开发的速度很慢，而人口的增长很快。因此到北宋后半期王安石执政时(一〇六九年)物质财富已不能算丰富。加上北方蛮族的强大影响，宋朝必须向辽(后来的金)和西夏支付巨额的岁币。这使宋帝国的国家财政陷入困难，不但推迟了土地资源的开发，而且直接资源的流出也很严重。最终导致了蒙古对中国全土的征服，决定了“亚近代”的终结。

与此相比，欧洲向近代化的迈进晚了五百年是极为幸运的。前面提到，欧洲也以十六世纪后半叶为顶点出现了生产力的低潮时期，在十七世纪，精神上和实际上都面临近代化的危机，给中世纪的复活造成机会。然而由于新大陆的发现，资源不断增加，同时过剩人口有可能流出，这与宋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正好相反，中国是必须向北方异民族提供大量物质财富，同时接受其人口的流入。

由于这一原因，欧洲得以长期保持物质财富的持续丰富，直至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

结束中世纪并开辟近代的，仍然是对丰富起来的物质财富表示关心的人的“良知”的作用。

二、目前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超现代意味着什么

关于中世纪文化的形成与特点已经作了很长的论述。当然，说明中世纪这个时代并不是目的，而主要是为了理解以下事实：即建立在与近代文明不同的审美观与伦理观念之上的文化不是特殊的而是世界性的，不是暂时的、偶然的，而是经过数百年的漫长岁月才统治了全人类的。

而且，它不是产生于人类未体验物质财富的丰富与科学技术的宝贵以前的愚昧无知状态，而是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古代奴隶制之后产生的，那时的社会虽然建立在那种人类特定范畴的生产形态之上，但物质财富却有某种程度的丰富，并且不断地变得更加丰富。它不是靠少数狂热的信徒和统治者的强权与镇压所能产生和维持的，而是作为更优越的东西，作为因追求更大的幸福与满足而进步的结果产生的，并且靠力求维持更佳状态的"努力"而延续的。

它使我们联想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把具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与高度科学技术的近代文明发展到顶点的现代人，通过更加"进步"变得具有别样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到达与近代工业社会具有不同规范的另一种社会。这决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而是在最近的将来就可能出现的。因为现在就感觉到了八十年代开始的变化兆头。前面讲到，"文明的犯人"们——人口、资源、技术等等，它们与古代末期或中世纪初期有着极为类似的所作所为。

对于以上论点可能有许多读者持有许多疑问和不同观点。

但这里为避免叙述上的重复，让我们来看一看文明的"先行领域"里正在发生的变化。

导致社会变化的人们审美观与伦理观的变化，首先表现在美术领域。这一点前面也已提过。古代文明的衰落与中世纪文化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写实美术的消亡与印象的、抽象的审美观的出现。而中世纪文化的退潮与合理精神的复活首先表现为十五、十六世纪写实美术的兴隆。

对物质财富极为关心的人首先观察事物并正确地——不掺杂社会主观地——表现其形状。例如《植物图鉴》,十四世纪末发行的都是极为出色的写实作品，甚至现在也可以沿用，里面绝不再登载茎是人体、叶子上带狗的曼德拉哥草和成了带足鱼的油鲟草。短短一个世纪之间，人们观察自然的态度起了明显的变化。

迅速反映这种变化的，是可以发挥个人技能的美术领域。

这不是西方独特的现象，中国出现这种变化比欧洲要早得多。中国从九世纪末起开发了利用煤炭的技术，消除了能源不足，再次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唐末至宋代的"亚近代",也是美术领域率先出现写实的复活。这表现在唐末五代时期的作品三彩罗汉像和木雕观音像的严格写实描写上。宋代画家郭熙在其著作《山水训》中，反复说明画家必须从各种角度观察和研究自然。这种态度同甚至通过解剖来探究人体形状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也十分相似。

但是从十九世纪末起，在美术领域，写实被抛弃，印象派和抽象派占了主流。今天虽然也有提倡象摄影那样去绘画的所谓超写实派，但绝大多数美术作品的造型与结构都加进了作家的某些主观印象。而且因为它得到社会的肯定，所以可以说在

这个领域正在形成一定的社会主观。

在美术这一先进领域，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客观地观察事物并如实地加以表现的所谓客观合理主义就已经遭到抛弃。

但是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限于美术世界，在其他艺术领域，特别是在与产业经济关系很深的建筑和生活文化领域，追求感觉的舒适性与运动便利性的合理主义仍然在向前发展。建筑上追求冷暖气设备完善的舒适性与非装饰性质的方便性，服饰倾向于便于活动的式样和结实的质料。在工业设计领域，注重机能性的人类工程学不断发展，照明与陈列不断追求易见易懂性。甚至男女发型也正在变为运动性和清洁感很强的士兵式和短发。在这些领域里，重视机能和效率的工业社会合理主义仍在健全地发挥作用。

但是六十年代末，硬壳虫乐队和玛丽·坎特发起的"文化革命"却使这种倾向为之一变。在极短的时间内，服饰由活动方便和舒适性变得要受名为"时尚"的社会主观所左右，发型由于"好看"这种社会主观的作用，普遍成了看起来不方便不清洁的长发。

"时尚"的变化很快，硬壳虫乐队的音乐和玛丽·坎特的超短裙很快就成为古典，但它们所引起的倾向，即无视机能与效率而重视社会主观的倾向却越来越加强。现在最时兴的过分肥大的衣服和奇怪的发型，其行动不便与费事的程度堪与中世纪僧侣的衣服和江户时代头中央部剃发的一种发型相匹敌。这种怪诞的时髦也许持续不了多久，但无视机能与效率的倾向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并且正在某种程度上固定下来，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建筑领域与产业的关系更为密切，因而更加顽固。建筑需

要巨额投资，并且以人们都能长期使用为前提。另外，其决策要受高龄投资家的很大影响，法律制约也很严格，所以不得不保守。无论在中世纪初期还是在近代的开端，建筑都是一面敏感地反映着技术的变化，一面在造型上维持保守的风格。

然而就是在建筑方面，一九八〇年以后也出现了重要变化，追求舒适与方便性的现代主义急剧衰退，重视印象表现的造型开始出现。二十年代的住宅建筑研究所运动以来把无装饰机能主义绝对化了的"全玻璃固定装修"式已经过时，窗户变小、突出墙壁的瓷砖与石材装修式迅速增加。最近甚至出现了附加装饰和采用温度差的样式。目前世界瞩目的麦克·库勒布斯、汉斯·霍莱因、安藤忠雄、矶崎新等人的作品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

这种文化倾向一般称为"超现代"。仅仅用这种表示"近代工业社会文化之后"的消极概念来称呼，说明了这种倾向的不成熟和不确定性。就是说，超现代尚在摸索中。但是它正在远离近代工业社会追求的机能与效率，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不是工业社会审美观的延续。

十九世纪末在美术领域开始的脱离合理精神的倾向，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扩大到生活文化和建筑方面，其意义十分重大，对产业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在日本，美术市场每年至多不过有五、六千亿日元的交易额，但是与生活文化和建筑相关联的产业的产值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几十。

当然，并不是说这个领域的一切都因此而一下子改变了。虽然没有对穿最时兴的蝙蝠衫和蓄长发的人数作过调查统计，但恐怕他们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任何时代时髦的"先导者"都是这样一个比率。

因此，认为时尚会有某种反复，人们将重新回到工业社会

的机能主义和效率化的见解也并非没有道理。尤其在保守的中高年层和投身于工业社会的行政官员中间，这种期望更加强烈。在日本，推行工业社会无个性均一化教育的文部省官僚和众多教师们，现在仍在努力把学生们同超现代文化隔离开来。

但是，在现实中，在许多领域里，脱离机能与效率的文化倾向正在发展，不少十年前的“尖端”现在已变得极其“普通”。而且，事实上产业界也沿着同一方向发生了不少变化。

还要举出一点与其相关的事实，就是最近宗教的复活。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在苏联、中国，近年来，在年轻人中间都出现了热中于宗教的现象。其中美国电视传教士的活跃也使人想到在高度信息化情况下宗教活动的一个侧面。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发源于印度、南朝鲜等地的宗教的传播。这同古代末期周围落后地区的宗教传入罗马和中国的现象不无相似之处。另外，始于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对近代工业社会规范发起的一个文化挑战。这种宗教的兴起同超现代审美观与伦理观是否直接相连还不能马上作出判断，但它确实是表现了对近代合理精神的一种内在的疑问。

资源有限感与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始于美术并波及建筑与生活文化的非合理潮流——“超现代”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呢？让我们从前述的“文明的犯人”的所作所为中探寻一下它的根源。

首先影响人类的是资源，广义地说是环境。比资源、环境的实际状况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怎样接受它们，即它们如何影响人的“良知”。十九世纪末，当世界地图上的空白点消失时，欧

洲最容易陷入悲观想法的人们开始想象地球上资源的极限。当时重视空间领土支配的思想还很强，面对不可能再占领新的未开垦地这一事实，不少人感到帝国主义发展的极限即未拓地的消失。这使欧美列强对殖民地的争夺不断激化，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几乎在同一时期，走在最前面的美术界抛弃了严谨的写实，印象派、表现派、抽象派发展起来。

然而，实际上未开垦地还是大量存在的，资源的供给也在不断增加。更主要的是世界人口构成还保持着工业社会的健康性，即"在能生活下去的先进地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又遭到第二个更加猛烈的打击，这就是三十年代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关于这次严重危机的原因目前仍无定论。但它同美国中西部的土地荒废、欧洲资源供给成本的提高等供给方面的不平衡可以说不无关系。至少在这个时期许多人感到了"自由新天地"的消失。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一书中，通过被风沙追赶的农民之口说："美国已变得这般狭小了。"这时在许多艺术领域——文学、戏剧、电影、建筑设计等——都出现了很强的、非合理的、反工业社会的倾向。希特勒和日本的昭和革新官僚这些内心充满矛盾的工业社会主义者斥其为"颓废艺术"。

但是对资源、环境的有限性有了广泛、深入的认识，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七十年代以后。其最初的原因与其说是资源，不如说是环境问题，特别是公害的发生。硬壳虫乐队和玛丽·坎特发起的"文化革命"也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这决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

七十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第一次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刚刚开始受到重视的公害问题不是个别的、小地区的问题，而是

世界范围的、具有不可避免的严重性的问题。此后不久发生的“石油危机”似乎证实了这一主张的正确性。

但是一般来讲，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刻的。许多人认为政治和石油资本的有意操纵以及因无能造成的失败对这场过于突然地——人们觉得——到来的石油危机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一九七九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发生从心理上打破了这种对资源本身的乐观论。

如果说一而再地发生的石油危机使资源有限感在人们的头脑中确定下来，那么同时在亚洲和非洲发生的大规模难民问题则通过人口方面的变化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以往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只是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而一般群众则把它当作“遥远的异国故事”。但是一九七九年越南军队进攻柬埔寨以后产生的大批难民却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关注。它不仅是人道问题，同时也是围绕是否收容难民而产生的政治和财政问题。不，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告诉人们：所谓国境决不是绝对的界限。从那以后人们懂得，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守卫的国境线对于蜂涌而来的可怜难民也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这一被越南证明的事实此后被许多独裁者和穷人加以利用。古巴在共产革命以后曾阻止难民流出，但是到八十年代，则把为数众多的难民公然送往美国，墨西哥在最近几年内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数达一千二百万，其中有八百万人秘密定居下来。至于埃塞俄比亚和撒哈拉地区各国，对居民因不堪沙漠化与饥馑而流往他国，则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

这件事似乎暗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鲜明起来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正在崩溃。就是说，以相同民族为基准形成的国家，把

属于本民族的本国人民因信念之差而送往外国，自己却不感到丝毫的耻辱和犹豫。如果说，民族国家是建筑在工业社会的理念之上，即根据形体特征和使用语言不同来划分人类，那么这一概念的崩溃也就决定了工业社会的终结。

物质财富饱和感与非物质需求

随着环境问题和难民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心，在发达国家的国民中间也出现了新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对物质财富的饱和感以及相反地对"心灵的充实"和"生活的质"的追求。

"物资已经足够多了，更要紧的是心灵的充实"，"生活的质的提高比量的增加更重要"，从七十年代后半期到八十年代初，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这种呼声都急剧增高。

当然，这种对物质主义的批判自中世纪以来一直在继续着，反对公害的主张也反复被提出来，但是高呼反对公害的人们所要求的，正如"要牛排还是要蓝天"这一发问所代表的那样，是"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河流"、"安静的居住环境"，就是说，都不过是物质财富，是可以用百分比或量具单位加以计算的"东西"。只要不超出这一界限，无论反对公害者怎样强调反经济主义，归根结底都不过是资源分配问题。大气和水质的污染并不是随着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量的扩大而必然产生的恶果，它是可以通过适当的公害防止设施加以防止的。七十年代日本等国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量显著扩大，但是现在总的来看大气和水质的污染程度都大幅度地减轻和改善了。

然而，七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普遍流行的想法是对物质财富本身的饱和感，而不是旨在防止公害的节约运动。现在人们追求的是无法用百分比和量具来测定的东西，

是愉快、美观或心灵充实这些不可能用数值具体度量的东西。

许多人说，这是“物质财富已充分满足的结果”。然而，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人们都知道的一条经济原则是所谓“效用递减规律”，即单纯增加数量会引起每一单位物质效用的下降。因此，当物质财富增加到某种“水平”后，继续增加的物质财富的效用将会降低，使人感到“已经足够了”。但是，经济水平和物质财富拥有量各不相同的许多国家的许多人，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到八十年代的短时间内同时达到那个“水平”，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当时并不是物质财富的消费量急剧增大的时期，而是物质财富消费量出现停滞的萧条时期。

人们这种需求上的变化不是物质财富的供给与消费量增加的结果，而只能认为是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发生了变化。另外“资源有限感”在背后起了很大作用。这种“资源有限感”是人们在得知环境问题和难民问题所反映的地球狭小的情况后最终在头脑中形成的。

目前，八十年代中期，就整个世界来看毋宁说是资源和农产品过剩。如果只看短期内的供求平衡，也可以说是“空前的过剩”。尽管如此，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资源有限感并没有消失。从世界史的角度去思考文明的变化时，重要的不是每个具体时期的现实，而是作为整体的资源和环境对人的“良知”造成的概念性影响。

技术革新的效果——时间过剩

另一个重要领域——技术方面的情况如何呢？

如前所述，产业革命以来工业社会追求的资源与能源——高消费型技术进步——大量化、大型化、高速化过程已经停

止，而省力化、多样化、省资源化和信息化倾向正在发展。那么，这种多样化、省资源化和信息化产生的社会效果如何呢？

一般认为，技术领域最有发展前途的是电子学、材料学和生物工程学。

但是对技术进步作预测是相当困难的，过去多次向专家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咨询，二、三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很少有说准了的。在今天没有预见到的领域里产生惊人的新技术，使世界为之一变，或是上述的三个领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尤其是材料学和生物工程学领域，在技术可能性方面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更谈不上经济性和需要量了。目前较有把握谈论的是以计算机通信为中心的电子学。那么与电子学有关的技术开发对于一般社会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事实上，对这一点作出了确切回答的书籍和学者少得可怜。有关书籍虽然是汗牛充栋，但内容几乎都是技术解说或论述技术可能性的。而且其可能性几乎都是服务于企业的，即告诉供给方面如何实现效率化和省力化。当然也有些是预测在家办公或在家购物等服务于一般生活的内容，但也只是论述"可能性"，很难说令人心服地揭示了技术的"普及"(社会现实性)，这样的话，即使普及了也不会使一般社会为之一变。

例如，银行业务使用电子计算机后，窗口业务需要的人员减少到四分之一乃至七分之一(计算机技师和穿孔员增加了)。这使银行经营有了很大变化，但是在一般储蓄者看来，这种变化不过是到哪个分行都可以存取和等待的时间缩短了而已。电话由铜线变为光纤，但是对使用者来说，传达的声音仍是相同的。难怪有些通俗科学杂志讽刺说："迄今为止，电子计算机的影响远不及方便食品的开发。"

总之，迄今为止以电子计算机通信为中心的电子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只是引起了企业内供给过程的变化。其产生的影响有三：第一，省力化；第二，省资源化；第三，多样化与降低成本。

第一点省力化的效果已是尽人皆知。正如上述银行窗口业务一样，在流通服务业领域也收到了巨大效果。自动售货机和联机注册等效果也很显著。因此有人认为第三产业的软部门被电子仪器这种硬机器所替代，缓和了就业结构向第三产业的急剧倾斜。所谓对产业结构的软化不应作片面的、过大的评价，其理由之一即在于此。

但是以产业用机器人为代表的工业现场用机器的发展产生了更为可观的省力化效果。不少研究者认为，假如没有劳务问题、人事管理以及随之而来的企业经营上的各种问题，那么许多企业裁减人员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后仍可以保持现状。也有人因此而预测八十年代后半期将开始相当大规模的人员裁减。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萧条时期(七十年代中期)，各企业都在努力进行库存管理和利用游资，即不使“东西”浪费掉。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八十年代初的萧条时期，各企业都在努力聚财，即不使“钱”浪费掉。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即从一九八六年开始的萧条时期，中心课题恐怕将变为不使“人”浪费掉。

但是现在还谈不到这些。目前由于电子计算机相关技术的发达而产生的省力化效果从统计数字上也已充分体现出来。日本经济从一九八三年后半年起出现相当大的回升，但失业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目前已达到实行失业统计以来的最高数字。

欧美没有日本那样终身雇用的惯例，就业人员转变职业也

很困难，因此计算机应用造成的省力效果从社会角度来看更为明显。八十年代初的萧条时期，失业者急剧增加。即使在景气恢复的今天，尽管各国都在大大缩短劳动时间，欧洲各国的失业率仍在上升，达到两位数字。

美国一九八四年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八点六，失业率虽然迅速下降，但仍维持在百分之七点四，大大高于七十年代后半期的数字。

以电子计算机通信为中心的电子技术的进步虽然增加了与工业完全不同形式的就职岗位，但是总的来看它使省力化问题更加突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甚至使人想到八十年代后半期世界性高失业率是否已成定局。这样一来根据劳动时间的缩短来进行劳动分配即所谓劳动分摊制的要求将会变得更加强烈。

总之电子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达带来的第一个(最初的)社会影响是造成时间的剩余。这不仅对人们的生活条件，而且对消费需要也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计算机为省资源化与多样化做出贡献

第二点省资源化也在多方进行着。使用计算机不仅使原料裁剪不再浪费、成分计算更为严格，而且由于对零件和产品的彻底管理，大大减少了生产流通过程中“看不见的库存”现象。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仓库与运输量。此外因传票和资料类的节省而带来的省资源效果也不应忽视。

第一章讲到，这次经济回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源与材料的需求没有增加，国际价格持续低平。其原因之一在于消费者审美观的变化，再就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造成的资源节省。

今后，计算机的小型化、廉价化与利用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对它的适应，这些将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节省资源。

第三点是多样化与降低成本。这一点更为明显，也更为重要。因为它与产业革命以来近代工业社会追求的以大型化、大量化、规格化为基础的“规模经济效益”正好相反。十五年前，日本的啤酒容器包括瓶、罐在内一共只有八种规格，而现在竟达一百三十六种。小汽车和电机制品的型号、种类也有明显的增加。电话机种类也已超过一百种。至于时装衣料和化妆品、食品、杂志等，每年新增加的种类不计其数。

计算机技术的发达使一条生产线上也能够比较容易地生产出多种商品，这无疑支持了多样化现象。

但是多样化的成本并不等于零。就是说“规模效益”并没有消失。有的研究者指出，由于上述啤酒容器种类的增加，我国啤酒业用于制造与流通的费用上升了百分之二十五。种类更多的食品和衣料由于受保存期和过时等因素的限制，多样化成本就更高。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企业仍致力于多样化，因为顾客的消费心理是，即使贵些也要选购自己喜欢的商品。选择价钱高的商品也就意味着放弃购买其他的商品。就是说，消费者的多样化倾向是，首先考虑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重视选择)，而不是购入更多的东西(重视物量)。计算机用于降低多样化的成本，正是消费者这种需求的结果。同时，计算机带来的多样化成本的降低又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也就是说，构成了一个消费者需求和技术进步不断扩大的循环。

多样化的意义与影响

这正是被称为经济常识"大倒转"的重大现象。因为十年前的经济常识认为只有"规模效益"才是不变的真理。

从工业社会开始到最近石油危机以前，无论是工厂、船舶、客机、商店，人们都相信规模越大越有利可图，在技术与市场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巨大化。企业也以大量生产和大量流通为目标制定经营战略，政府的行政政策也遵循这一方针。因为从标准化政策到标准商标的确定、中小企业协作化、商店街建拱廊搞"并排百货商店"，一切都在追求"规模经济效益"。

但是，突然间，与此完全相反的多样化成了更大利益的源泉，这当然使技术人员、企业家和政府官僚都感到大惑不解。所以，直到今天，在这些人中间还总是把多样化当作暂时现象和不健全倾向加以否定。

但是，作为大趋势，重视选择优于重视物量的倾向是极为本质的，目前也正在得到社会的肯定。通过变换时装衣料和小汽车款式来刺激消费，曾经被一群激进经济学者指责为"制造浪费"，但是在更大规模地这样做的今天，这种指责在日本和欧美都听不到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它得不到一般消费者的支持。

就是说，通过标准化、批量化降低成本，"向人们可以使用更多的物质财富迈进"，这种工业社会的伦理观已经得不到赞同了。

那么，对所有人都坚信的"规模效益"加以否定的多样化，其实质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与物质财富的"数量"这种客观价值相比，更重视"合乎自己爱好"这种主观价值。而这种"主观"无论消费者个人是否意识到，都只能是社会主观的一

部分。社会主观是通过"时尚"、"大家都在这样做"等信息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多样化的进展反映在商品市场上，表现为消费方面与数量的客观性相比更重视社会主观的审美观已变得相当普及。从这一点来看，它同艺术文化领域"超现代"的发展属于同一类现象。

以消费者审美观和伦理观变化为基础的多样化现象，反过来说，"规模效益"重要性的缩小和消失，对产业界与企业经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影响。因为它破坏了产业革命以来人们笃信的大企业优势。以往以大型化、批量化为目标的经济运营使资本力量和组织规模优越的大企业经常获得更多的"规模效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竞争表现为"成百万制造的企业与仅能造一万的企业"之间的竞争。

但是，由于今后的社会追求多样化，即使是大企业也不能大量生产一种商品。就是说，一种商品的生产规模不是由资本力量和组织规模决定的，而明显地是由进行多种选择的消费者市场的规模决定的。因此，今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差别成了"制造上千种商品的企业与仅能造十种商品的企业"的不同。即使是中小企业，如果在十种商品中有一种是拳头商品，也能够取得凌驾大企业的成就。今天所说的风险企业热，其根源就是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

但是只能造十种商品的中小企业不一定能经常拿出拳头商品，因此靠开发拳头商品而高速增长的企业，下一次也可能因失利而破产。在这个意义上，高增长型中小企业正是风险企业。

另一方面，制造上千种商品的大企业即使出了一两种拳头商品，对整个经营规模的大发展并没有什么作用。在多样化市

场上，即使是拳头商品整体规模也并不大，技术和时尚的变化都很快。因此，今后巨型企业的高速增长是很困难的。

但因为是制造上千种商品，某一种当选的可能性很高，所以能经常有几种拳头商品，保持一定的经营成绩也就比较容易。在稳定性这一点上，大企业显然优于中小企业。

工业社会追求大型化、批量化，所以大企业兼有有利性与稳定性两个方面，即增长性与稳定性是共存的。但是今后大企业虽有稳定性却缺乏增长性。相反，积极性很高的中小企业虽然有时获得高速增长，但缺乏稳定性。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难以兼有稳定性与增长性两个方面。这对今后年青人挑选职业来说无疑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信息化的问题与将来

以电子计算机通信为中心的电子技术的发展决不仅仅体现在商品与服务当中。还有一个影响，即信息化，不久也定将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没有比“信息化”这个词更被滥用和误解的了。上述的商品多样化与流行化也往往被当作“信息化”的一部分。有时银行的联机作业与传票的计算机化也成了“信息化”的一个内容。但是这里谈的只限于最严格意义上的信息化，即信息媒介的技术发展与普及。

现在人们对利用计算机通信的所谓新媒介不太关心。有人把现在的“新媒介骚动”讽刺为“餐馆与饭店的无事忙”。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断定“新媒介前途暗淡”。现在一般人不够关心与其说是因为新媒介等计算机通信技术的缺点，不如说是其利用技术尚待开发。

几乎一切技术的发展都经历了以下过程，即首先是发明基本的硬件技术，经过相当长时期以后软件技术开始发展，最后对可以用于软件的硬件进行改良，在这一过程中，兼容硬软双方技术的拟人技术也渐趋完备。因此一项新技术要普及到一般消费者，需要少则十五年，多则三十年左右的软件技术开发期。而且最终得到普及的利用领域往往与发明该项硬件技术时所预想的情形全然不同。

例如，录音机发明时，出于最初的实用目的录下了俾斯麦的演说。当时，录音机仅仅是用来“记录声音”的。电影发明时也正如它的名字“活动照片”一样，仅仅被当作伴有动作的记录照片。所以初期的电影是新闻记录，戏剧片出现后也基于剧场记录的想法，放映时观众就坐在特等席上看。录音机发展到音乐录音成为文化娱乐用品经过了十五年，电影成为带推镜头和分镜头的脚本电影则经过了二十多年。

就连汽车这种单一机能的东西，当初由于被当作马车的代用品，所以主要是用于农村娱乐。在一八八五年卡尔·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发明汽车以来的约二十年时间里，这种“铁马牵引的马车”除特殊情况外没有进入过大城市。因此，最初对汽车进行改良的目的不是为了造出谁都能驾驶的私人汽车，而是为了使它在专家的驾驶下能够走崎岖不平的路。

不论哪个时代的人都爱把新机器看作是现有机器功能的扩大。录音机曾被当作“耳闻的记录”，电影是“活动的照片”，汽车是“没有马的马车”，电视成了“茶室里的电影馆”，但是后来则发现了新的利用领域，使这些机器的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开发了相应的软件技术。

今天，电子计算机通信被当作邮政、电话和电视等的延

长。通过双向电视进行的家庭购物是商品定购的延长，剧票与火车票的预约是电话预约的延长，能收看四十频道节目的闭路电视是一般电视的延长。这样一来当然引不起人们的关心和兴趣。但是当这些系统实现十年二十年以后，将会开发出全新的利用领域，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改良。

其具体情况究竟如何现在还无人知晓。但是这些机器与系统所具有的基本功能是大体了解的。它们是储藏、加工和传递“知识”的工具。在不远的将来，具有推理功能的第五代电子计算机问世后，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把“知识”变为“智慧”。想到这一点，我们深信，在未来社会，以计算机通信为中心的电子学将充分发展起来，为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提供越来越多的知识与智慧。同时也为消费者的选择提供更加广泛的可能性。

另外，自由时间变得越来越充裕，它将扩大人们对信息的吸收，促进和加速社会主观的形成。计算机通信的发展必将通过信息量的扩大与多样化，对社会主观具有更加流动的、并且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走向“物资不足，知识有余”的社会

这种倾向一定会对认为“东西多多益善”的人的“良知”产生敏感的反应。历史表明，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人的“良知”都是在这样发挥作用的。

想到这一点，“下一个社会”的概貌也就清楚了。就是说，“下一个”社会将是喜欢大量消费丰富的时间与丰富的知识，而对物质财富量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关心。“下一代”人一定是使用充分的时间，接受丰富的知识，在社会主观的变化与多样化中反复进行变换迅速的选择。

“下一代”人将为符合自己集团社会主观的东西，而不是为其使用价值本身而毫不吝惜地支付代价。于是新的价值含义，即所谓“知识价值”便大量出现。对于供给一方的产业界来说，比物质财富的生产更为重要的也将是开发技术、设计、格调和印象等等，以使物质财富的生产更符合当时的社会主观。或者说，更重视广义的宣传活动即对人技术，以形成对自家的商品、服务以及企业印象和地区印象表示欢迎的社会主观。

“下一代”人所重视的选择标准不是物质财富的量和效率等单纯的尺度，而是他们各自归属的集团的社会主观。这同前面讲的近年来始于美术并扩大到建筑与生活文化领域的所谓“超现代”文化倾向是一致的。

就是说，这里所讲的产业变化在社会变化的先行领域里已经发生了，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变化。先行领域的倾向加进技术手段后，将引起产业界的迅速变化。八十年代产业界正在发生的现象应该说是比较尖端的。

在今后的时代，人们将不追求对资源、能源和农产品的更大消费，而是追求对时间与智慧的价值即“知识价值”的大量消费。因此，今后人们将认为“知识消费得越多越体面”，含有大量“知识价值”的商品将成为畅销货。

当然，从事“知识价值”生产的人与产业也将增多。在今后的社会，肯定只有“知识价值”的创造才是经济增长与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

“知识价值”无所不在

我在这里引出了“知识价值”这一新的概念。顾名思义，就是“知识的价值”、“知识所创造的价值”。更严密的定义是：

“由于符合社会结构与社会主观而得到社会承认的创造性的知识价值。”

这样说一定会有不少人认为“不就是软件化、服务化吗？”但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容易引起概念和预测上的混乱。按照这种想法，很容易把“知识价值”的创造同信息产业、教育产业等定义模糊的词语连系起来。

的确，律师和会计等各种咨询性职业是出卖专门知识信息的“知识产业”。学校、私塾和文化教室类的教育产业是出卖更加一般的知识的“知识产业”。这些产业当然也属于生产和出售“知识价值”的产业，它们在“下一代”一定会有所发展。但是这种单纯向消费者出售知识的产业从经济整体来看只占极小的一部分。

真正大量的“知识价值”生产是体现在有形的物质财富和固有的服务之中，并与它们一起流通的。就是说，包含在物质财富中的样式、商标印象、高度的技术或特定的功能，在物质财富和服务价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在“下一代”，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消费方式不再是拥有更多的量并不断更新的“用过就扔”型消费，而是高价购买新式、名牌、具有高级技术和特殊功能的商品并长久使用的消费方式。因此我们说“知识价值”的比重增加、对物质财富的关心减弱，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脱离物资”。只要“知识价值”的大部分以物质财富的形式生产和流通，与“物资”相连的产业活动就不会迅速地衰退。

比物资和服务、硬件和软件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构成这种“物资”或“服务”价值的内容起了变化。即使是固有商品，其价格构成也都发生了变化，材料与单纯加工费在价格构成中所

占的比率大幅度降低，而设计、技术和印象形成的“知识价值”所占的比率大大增加。

今天，有不少名牌时髦商品和技术性强的机器，其价格高出同类商品的四、五倍，使用同样的材料和单纯加工费，却卖出几倍的价钱，就是因为相应的那部分(占价格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知识价值”得到了承认。今后这种商品将会越来越多。

劳动的实际变化大于表面

这种现象很早以前就在美国等国缓慢地发展着，但引人注目的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急剧发展。

众所周知，美国的产业结构正在迅速第三产业化，就业结构更加偏重于第三产业。根据一九八三年的统计，美国就业人数一亿零八十三万人中，农业等第一产业所占的比率仅为百分之三十五，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也最终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六点八，特别是制造业，为百分之十九点八，“建国以来首次”在百分之二十以内。与此相反，百分之六十九点七的人集中在第三产业。其中运输业和零售、批发业发展不大，十年来新雇用的约两千万人中，大部分集中在信息、广告、设计、娱乐和观光等部门，其中创造“知识价值”的行业特别多。

欧洲和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倾向。目前日本的工业制品出口竞争力极强，是一个每年贸易黑字达五百亿美元的“物资制造国”，即便如此，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也以七十年代前半期为顶点出现了轻微下降趋势，一九七八年以后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与此相反，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其中有许多创造“知识价值”的行业发展尤为迅速。

但实际上这个统计数字并不能正确地反映出实际情况。因

为现在一般采用的标准产业分类完全不适合于观察这种变化。

今天的标准产业分类有些是从商品分类学发展而来的，分类的基点放在材料与生产工程上面。因此用在单纯对物质财富进行生产加工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分类上是有效的，但超出这一范围就不起作用了。对包括公务、公益事业乃至观光业和酒吧夜总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分类，决不仅仅意味着第一、第二以外的“其他”。而对“财富”的价值的内容构成就更是无能为力了。

不仅如此，对生产额与就业人数也无法从数量上进行正确的把握。现在的统计业务是按各个企业进行产业分类，因此从整体上属于制造业的人，尽管他实际从事的工作是设计或销售，但分类时却被划入“从事制造业人员”，其成果被计入“制造业付加价值”。

为弥补这一缺陷，又对各人所从事的工种进行了调查，作了产业工种IO分析等等，但还是很不够的。不过一九八五年六月发表的劳动省“关于制造业服务经济化的发展及其对劳动影响的调查”，在这点上对我们多少有些启发。

根据这项调查，在职工一百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当中(抽出其中四千家企业)，在工厂等生产部门工作的共占百分之六十点二，在职工一千人以上的企业中仅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九。而且，在这百分之六十点二的生产部门工作人员中，还包括了百分之十一点三的制造辅助人员，因此，实际从事制造工作的仅占全体职工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九，即一半以下。另一方面，在约占百分之四十的非生产部门中，事务性管理人员占百分之十四点四；销售人员占百分之十三点六；研究开发人员占百分之八点六；流通等有关人员占百分之三点二。

也就是说，在日本以现有形式进行的就业统计当中，从事制造业者虽然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弱，但其中仅有百分之六十是生产部门工作人员，即仅占总就业人数的百分之十五，而直接从事制造工作的则仅占就业人数的百分之十二。这个比率与十年前即一九七五年前后的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大体相等。

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来统计一下美国的情况，那么，在美国直接从事制造工作的人仅占就业人数的百分之十弱而已。这样，认为“工厂才是价值生产的中心”的传统的经济学当然就不能适用了。

按贡献范围的产业分类

现在，缺乏积极性定义的“第三产业”在美国和英国实际上已占近百分之七十，在日本和西德等国也已占过半数。因此，以分析第一和第二产业为主要目的而使用的“标准产业分类”显然已经过时，作为分析工具也已失去了实用价值。为了分析现在的产业经济的实际状况，有必要采用一种新的分类方法。这种方法应当不拘泥于有形的原材料和产品，而是着眼于所有产业中共同存在的因素，即着眼于各产业是在人类生活的何种“领域”用何种“财富”作出贡献的。

我在约十年前提倡的“按贡献范围的产业分类”，就是为达此目的而作的一个尝试。在这种分类方法中，将产业按其所生产的“财富”(价值)的形态分为物资产业、位置产业、时间产业和知识产业等四种，然后再根据这些“财富”在人类生活的何种“领域”发挥作用分成生活领域、生产领域和社会领域等三种领域。

按贡献范围的产业分类

领域 财富	生活领域	生产领域	社会领域
物资产业	农业、制造业	生产资料、 资本资料	公共设施建设
位置产业	运输、流通、金融	面向本企业	公益事业、军事运输
时间产业	娱乐、观光、医疗	安全、警卫、 代理业	公务、警察、 公共卫生
知识产业	教育、新闻	广告设计	公共信息、军事技术

（注）本表中所列产业名称仅是例举而已。根据这种分类方法，自然要对各产业中的各个领域分别进行考察。例如，物资产业中的制造业只指生产现场（实际从事制造）及其必要的管理业务，而制造业企业中的销售部门则应列入位置产业，技术开发、设计、广告宣传部门应列入知识产业。

顾名思义，物资产业就是从事物资的生产加工的，农林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生产部门均属此类。

位置产业是指通过改变“财富”的物理性的（空间和时间）、法律或社会性的位置来增加价值的产业，运输业、仓库保管业、金融业、流通业等属于此类。习惯于原有的产业分类者对这种分类法也许会感到奇怪，但这却正是古代以来被称作“商人”的人们所从事的“商业”的实际状况。

时间产业是对消费者的时间进行“加工”的产业。在这个产业中，既有将人们从痛苦和不安中拯救出来的代理业、保险业

① 在日本近代经济学中，生产资料指生产消费材料所使用的物质财富，广义的生产资料中还包括劳动力和土地；除土地和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资料也叫资本资料。——译者注

和治安及医疗业，也有给人们带来快乐的时间的娱乐和观光业。这个产业的特点完全在于它对人们的时间进行加工，至于其结果如何则不予考虑。在这一点上，必须将它与下面的知识产业严格区别开来。

知识产业是给人们带来知识和信息的产业，教育、新闻、设计、广告宣传和技术开发等均属此类。因此，即使是主要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其研究室和调查部的业务在这里也列入知识产业之中。从事创造知识工作的主要是这种知识产业。

我想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上述产业生产的知识价值，虽然有时也象教育产业、经营顾问和律师等那样作为单个知识价值在市场上流通，但是，更多的是作为有形的物质财富的设计、机能或位置产业、时间产业所提供的服务的内容进入一般的消费市场并为人们所利用的。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价值的增大并不一定会直接导致所谓“脱离物资”、“软件化”等现象。

这一点在研究当前的产业政策特别是国际均衡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由于受到统计资料方面的制约，上述分类中的产量和就业者人数的计量化工作尚未完成。如果这项工作完成了，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事创造知识价值工作的人数最近已在急剧增加，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发展着的“财富”的价值构成的变化也会更明确地表现出来。

第四章 “知识价值革命”与“知识价值社会”的本质

创造“新社会”的“知识价值革命”

从现象上看，以电子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达和普及为代表的“技术革新”，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巨大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也可以将其视为与内燃机和电气技术的发展普及及化学工业的扩大相同的现象，即位于产业革命以来反复出现的工业社会技术革新的延长线上的现象。正如本书开头所述，将今后的社会称为“高技术社会”或“高级产业社会”的“高级社会论者”即持这种观点。如果不这样加以理解，将今后的社会称为“比工业社会更高级的阶段”的观点就不能成立。

然而，这种观点却令人有只拘泥于“技术革新”一个方面，但对引起革新的背景却重视不够之感。也就是说，在六十年代发生于生活文化领域的变革、七十年代已为人们接受的资源环境有限论、以及由此产生的追求物资数量的欲望降低而对知识价值的要求增高的现象，并且技术进步的方向发生了变化等多种潮流之中，缺乏对技术革新进行全面的、宏观的观察。

正如默林·弗格森所指出的那样，当初在社会各领域中分散地、单个地发生的变化，到某一阶段就会结合起来，改变整

个社会的规范，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怎样评价目前开展的技术革新在社会各领域的变化潮流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以电子技术为中心的电子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达，并不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突然发生的。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这些技术已有了急速发展，并且人们也已充分预料到它们将会进一步发展下去。不过，当时却没有想象到它们会象今天那样向小型化、分散化、多样化和省资源化发展并广泛用于娱乐服务方面。七十年代曾大肆宣传的“未来的电子计算机社会”形象都是将超大型电子计算机与全国各地的终端机结合起来并按分时系统使用的“一元集中型”模式。最早开发超小型电子计算机即所谓个人用计算机的，不是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IBM那样的大企业，而是些研究开发型的新兴小企业，就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八十年代突然出现的电子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是一个曾持续发展的技术进步因人们欲望的变化而改变方向并向出人预料的领域进行爆炸性的扩展的现象。这一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七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资源有限论使人们的欲望发生了变化，即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发生了变化。

在这一点上，目前正在发展着的以电子计算机通信技术为中心的技术进步，具有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前期出现的内燃机、电气技术和化学工业的发达等完全不同的社会影响。也就是说，产业革命以来的技术革新，是根据追求物质财富数量的增加这种欲望而开展的，主要对增加物资供应量和提高加工程度发挥了作用。然而，目前进行的技术革新，却是以通过多

样化、信息化来增加“知识价值”和通过省资源化来削减物质财富的消费为目的的。换言之，它只会有助于增加供应创造性的“知识价值”。

这种区别是极为重要的，也是本质性的。产业革命以来，技术革新已使内燃机、电气技术和化学工业等企图增大物质财富的生产均能用数值来表示。大米和钢铁等原材料自不待言，即使是汽车、电视机、建筑物等高级加工品，也可以分别将其加工程度换算成统一的单位(专门换算成价格)进行统计。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作到这一点的。因此，国民生产总值(GNP)等一类概念得以成立，并且可以按时间序列或从国际角度对其进行比较。

但是，目前进行的技术革新则想增加“知识价值”的创造，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是不可能用数值表述的。产品式样的好坏，印象价值的大小，技术水平的高低，生活的舒适程度和城市空间的整洁等等，从其本质来看都是主观的，至少是相对的。在经济统计中登载的这类物品的价值或价格，只不过是人们根据其主观判断而支付的代价的合计而已。因此，即使从长远观点来看，也不能保证价格是与为生产该物品所投入的费用相平衡的。

有的设计师仅自己一个人就创造出了“拳头产品”，而有的上千人的大企业却一样名牌产品也拿不出来。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可以靠编制计算机软件赚大钱，而有的工作了三十年的老手却是一事无成。有的商店只靠人们口头传播就赢得了极高的信誉，而有的商店大作广告却未取得任何成果。依存于主观意识的知识价值无论怎样社会化也是不可能用数值来表述的，它是一种与成本没有关系的价值。

这种依存于社会主观意识的不能用数值表述的“知识价值”

的发展，是特别重视数值之客观性的工业社会的合理主义难以容忍的。因此，当然会出现抵制和反对，并且也一定会有人出来主张："虽然可能有各种个别现象，但如果宏观地、平均地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价格仍然是与成本一致的。"

但是，即使从日本整体或日本的某几年间得出的平均结果是"价格与成本一致"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这类事实)，那也不是因为在物质财富和单纯性服务中"反复出现了价格接近成本的运动"，也只不过是价格分别向上下两个方向大幅度脱离成本而其总合又偶然一致的结果而已。

总之，"知识价值"的价值形成原理不是工业社会性的，使人们产生希望得到这种知识价值的欲望并且毫不吝惜地付出钞票的精神，也与工业社会里的合理主义精神性质不同。

正因为这样，"知识价值"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知识价值社会"，并不是位于工业社会之延长线上的"高级社会"，而是与工业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

目前，在这八十年代发生在日本和世界上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变革，既不是单纯的技术革新，也不是临时性的潮流。它是人类在产业革命二百年后迎来的将产生"新社会"的巨大变革，即所谓"知识价值革命"。

一、"知识价值"的本质与行为

"知识价值"的本质——社会主观意识决定的短暂性价值

那么，通过这种"知识价值革命"产生的社会即"知识价值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对此作出预测

或提出概念。然而，在此之前，恐怕有必要探讨一下在今后的社会中将日益增加其重要性的“知识价值”的本质。

上面已经多次谈到，“知识价值”是基于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广度的人们的主观意识即社会主观而产生的。而这种社会主观又非常容易发生变化，在可以自由发表言论并具有多种巨大信息系统的社会当中尤其是这样。因此，依存于这种社会主观的“知识价值”也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并不只是数量增减的反复，而是往往具有甚至可以在短期内化为乌有的性质。

当然，即使是一般的物质财富和服务，其价格也可能会根据供求关系而剧烈地上下浮动。每吨铁的价格，在一年时间里可能会从五万日元暴涨到十五万日元，也可能会从十五万日元剧降到五万日元，这种情形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即使价格因供求关系而上下浮动，也可以设想钢铁的本来价值会在各个时代的社会条件范围内稳定下来。因此，钢铁价格暴跌时，人们就会觉得早晚还要上涨；而价格暴涨时又觉得早晚还会下降。也就是说，以价值为中心、“价格根据供求关系而变化”这种传统的经济学常识还是适用的。

然而，“知识价值”却不是这样。例如，某种样式的领带去年曾很流行，定价两万日元也很畅销。而到了今年，这种样式就已经过时了，只好降价到四千日元拿到处理货柜台去销售。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人认为：“仅一年时间价格就降到了原来的五分之一，不久还会上涨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价格再度回升的事例也是极为罕见的。

这种现象并不单纯是价格的下降，而只能说它是失去了价

值本身。因为所售四千日元只是领带这种物质财富所具有的价值，而式样设计这种“知识价值”所具有的价值已经完全失掉了。这一点只要把式样设计分离出来考虑就会立即明白了。

在技术和信息方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即使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出色的新技术，只要有比其更高级的技术出现，它就会立即失去价值。集成电路的普及使真空管技术失去了大部分价值，喷气式发动机的发达则使螺旋桨发动机技术几乎完全失去了价值。文字处理机的发展很快就使日文打字机的制造技术的价值几近乌有。在计算机软件等方面，一、二年内就变得毫无价值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而且，只要没有相当意外的变动，这些技术是不可能复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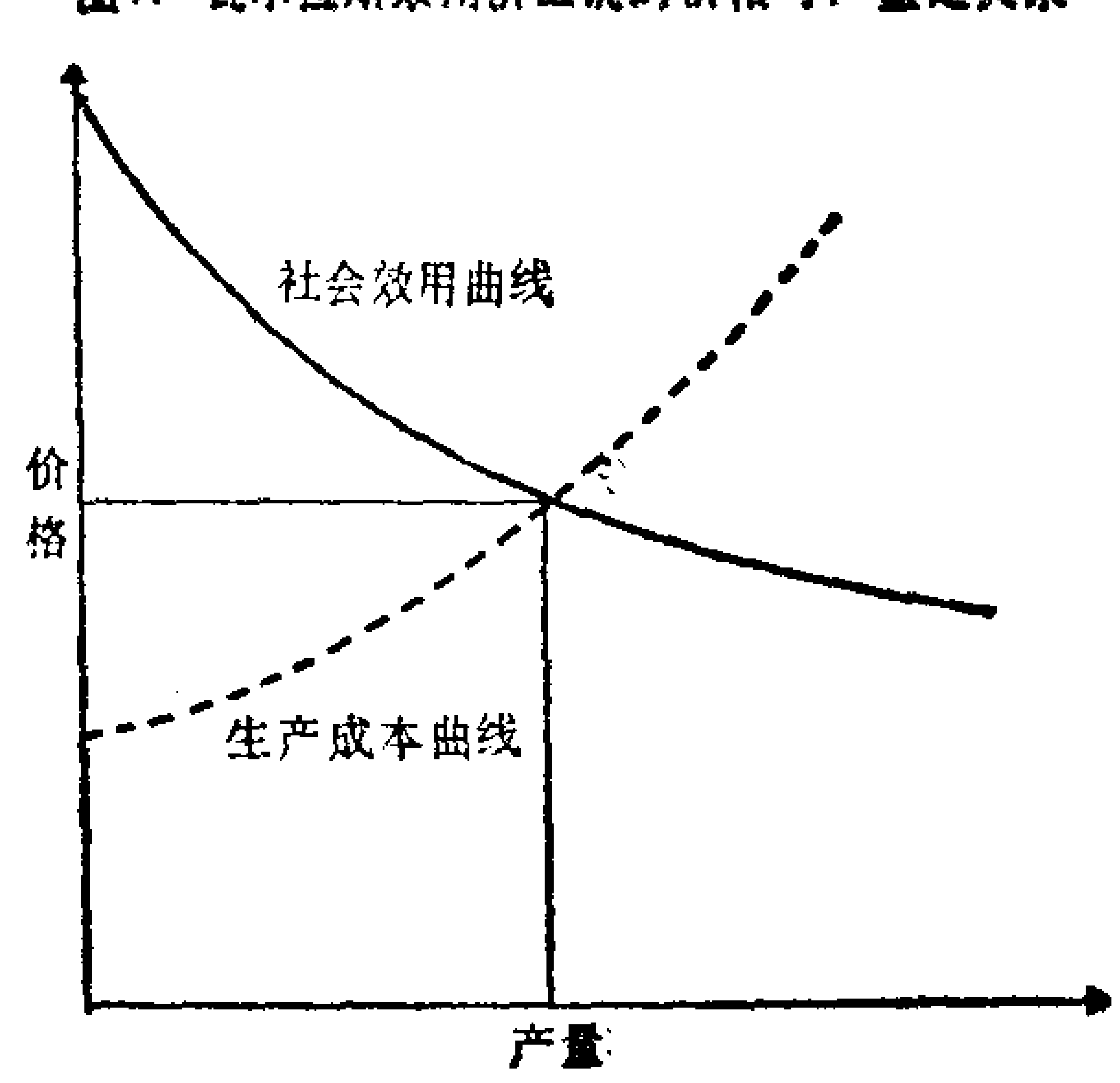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知识价值”具有只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充满社会主观意识的“场”中曳着亮光通过的流星型粒子般的性质。这也是“知识价值”未必同成本有关系的重要原因。

对于“知识价值”来说，不仅劳动价值说中所说的“价值不变的法则”不能成立，而且连瓦尔拉斯等人提出的工业社会效用价值说也很难成立。

在认为价值依存人的主观意识这一点上，列昂·瓦尔拉斯首先提出的效用价值说与“知识价值说”是一致的。但是，瓦尔拉斯学说的特点在于：他认为，在社会上将每个人产生的千差万别的效用积累起来，将形成一条稳定的效用曲线。当然，这条效用曲线是一条因生产量的增加而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与此相反，由于将有缺乏竞争力的供应者随着生产量的增加而加入进来，供应成本则将向右上方倾斜。因此，这两者必然会产生一个交点，而在这里就会产生一个稳定的价值。这一结论说明，效用价值说与劳动价值说同样是认为价值将稳定于与成本

相一致的水平线上的(见图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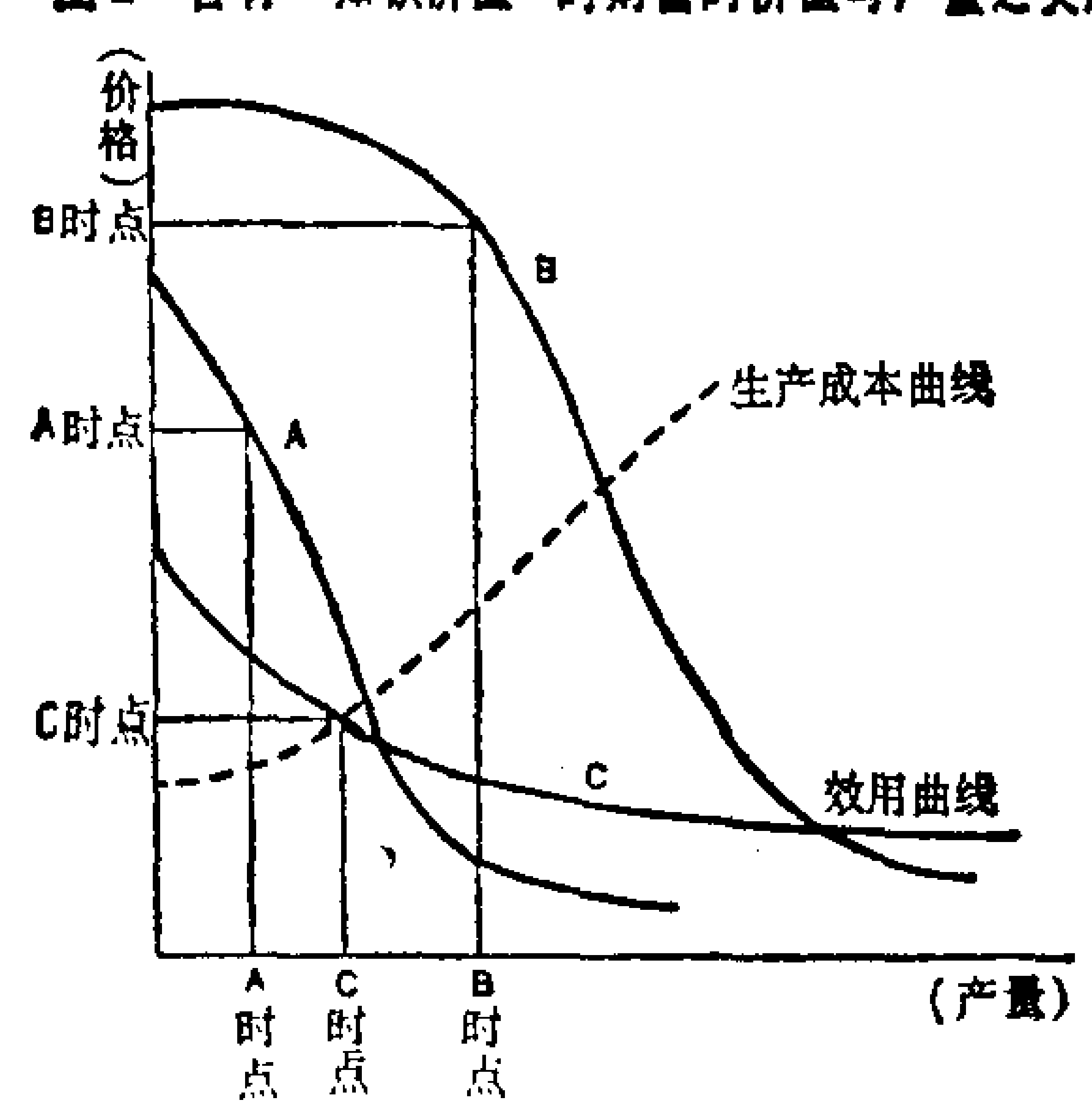
图A 瓦尔拉斯效用价值说的价格与产量之关系



由于社会效用曲线被认为是长期稳定的，因此，根据它与生产成本曲线的交点来决定价格和产量。

然而，“知识价值”却是不稳定的。借用瓦尔拉斯派的话来说，社会效用曲线仅是暂时地表现为急剧向右下方倾斜，但很快就会发生变化，甚至有时会完全消失。因此，如果某一特定的“知识价值”是刚刚加入市场的，即使它表现为远远超过成本的价格，也未必能够获得利益。因为在新加入者正式进行生产和供应商品以前，该商品的知识价值很可能已经降低或消失了(见图 B)。

图8 含有"知识价值"的财富的价值与产量之关系



说明：在含有"知识价值"的情况下：

1．在初期(A点)，由于只有少数人对此财富有强烈的要求，大多数人无此欲望，因此，效用曲线急剧向右下方倾斜。在这种情况下，产量较少，可实现超过成本的价格，产生"知识价值"。

1．不久，"知识价值"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效用曲线移到B点，价格进一步提高，产量也继续增加，从而获得了最大"知识价值"。此时即成为"流行的顶峰"。

3．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效用曲线接近了瓦尔拉斯的社会效用曲线C，价格与生产成本一致，"知识价值"事实上已经消失。

因此，"知识价值"的价格不仅在其形成过程中与成本没有本质上的联系，而且也不会必然地朝着接近成本的方向运动。这一点正是它与瓦尔拉斯派的效用价值说能够适用的物质财富及一般性服务之间的根本区别。

如第一章所述，"知识价值"的短暂性还会使创造"知识价值"的机能，即所谓"知识价值"的生产手段的价值也处于不稳定状态。这是因为，即使是在创造适应某种社会主观意识和技术条件的"知识价值"方面具有良好机能的生产手段，如果社会

主观意识和技术条件发生了变化，该生产手段的机能也会丧失。因此，“知识价值社会”可能会比迄今的工业社会具有更多的动态性。这一点在选择决定今后的企业组织形态和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决策成本”的重要性

既然“知识价值”的价格与商品本身的成本无关，那么，它又是根据什么因素决定的呢？简言之，就是根据需求者方面的“价格适当感觉”。

促使“价格适当感觉”形成的因素有许多种。替代手段的价格是其中一个，社会上人们的共同认识又是一个。广告、舆论界的评论和权威人士的评价等也与此有关。有时还会有一些偶然性因素介入进来。因为“知识价值”本来就是短暂性的，所以上述因素介入的余地较大。但更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决策成本”。

“决策成本”理论主要是通过对例行活动的参加者等进行预测时发现的。以前，在对例行活动的参加者和商店的顾客分布情况进行预测时，一直使用$E=f(1/g^2)$的引力模型。具体说来，就是“顾客的人数与‘g’即‘距离’成反比例”（这里所说的距离，是指不同条件下的时间距离、经济距离和绝对距离等的复合体）。然而，现实生活却与此不符。日本万国博览会和筑波科学博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来出现了远距离的顾客远远超过用这种方式所作的预测的明显倾向。因此，最近一般都采用了加进了常数K的新模型：$E=f(1/g^2)-K$，并将K这个常数称为“决策成本”。

人们在进行某种消费的时候，一般都要付出金钱（经济成本）。然而，在物资丰富的社会里，绝大部分消费都不是只为

满足生理要求而必然进行的被动的行为。因为消费者在选择一种消费的时候，同时也等于作出了放弃其它一些消费的决断）也就是说作出了决策。作出决断经常要付出一些心理性的成本，这就是决策成本。在因生活贫困而没有选择消费的余地的时代，“决策成本”与经济成本（所付金钱）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以往的经济学之所以对此没有注意，至少是没有重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然而，在物资丰富的社会里，“决策成本”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手里的钱已经很多了，失去了过去那样的重要性，而要作出从多种消费可能性中选择一个的决断则更加困难，“决策成本”反而增大了。这里所说的“因选择一种消费而放弃了其它一些消费”，并不是单纯指“买了这种商品就没有买其它商品的钱了”，而是包含了消费所需的特定时间及因消费而在社会上得到的评价等因素。不，比起金钱来，时间和社会评价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素。

以购买西服为例。既然人们穿着服装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不管是多么有钱的大富翁，他买每件西服都意味着放弃了穿其它衣服的机会。在饮食和娱乐方面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住宅和汽车也是同样。同时，人们穿着某种服装，也是在通过其时髦样式来表现自己，当然会影响到社会上对自己的评价。饮食、娱乐、住宅和汽车也都有同样效果。也就是说，不管怎样有钱，一种消费都意味着对其它消费的放弃，因而都需要作出决断，都需要花费“决策成本”。

在今后的物资丰富而又多样化的“知识价值社会”里，希望扩大销售者应当比注意降低经济成本（降价）更注重减少“决策成本”。

那么，“决策成本”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它当然要受到人们各自的性格和各个时期的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如从宏观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主要取决于它在人们具有归属意识的集体内会受到多大程度的抵制。也就是说，如果要做“大家都在做的事”，“决策成本”就低；如果是做“谁也不做的事”，“决策成本”则会很高。特别是在感到这个“大家”占有压倒多数的时候，受抵制的感觉就会消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就会产生，甚至会出现要作出“不做”的决断反而更需要多花费成本(负“决策成本”)的状态。

例如，最近，日本的青少年已有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到高中就学。因此，如果某家的孩子说不想到高中去念书，作父母的就会感到很难堪，甚至会用“你若是不喜欢公立高中就让你上私立的”或“你如能上高中就给你买摩托车”等话来哄劝。当然，送孩子上高中是要花费经济成本的。但是，作为父母要作出“不让念高中”的决断却更加困难。支出进高中学习费用的“决策成本”是一个很大的负数(作出不支出的决断所需成本比支出费用更大)。

在这里我想指出：在“知识价值社会”的微观经济分析中，“决策成本”理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今后应当继续深入研究，因为它在决定“知识价值”的价格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用过就扔的“知识价值”

那么，具有上述本质和行为的“知识价值”的增大，将给现实生活中的产业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可以指出的是，由于“知识价值”是因其与其它商品不同而产生的，它当然一定要使商品向无限多样化方向发展。

在“知识价值社会”，商品的价格和销售量将因其是否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而发生很大变化。市场上常见的“这种产品是用某种新技术制成的”、“我们的商品在这一部分使用了新材料”、“这种商品具有适合您这种职业或您这种兴趣的独特机能”和“这是当今最流行的样式”等宣传广告，都是在强调各自商品与其它商品的差别。有时甚至会出现相当于为制造这种“差别”所付费用几倍、几十倍的价格差。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谁因创造了“知识价值”而发了大财，其他人就一定会创造出别的“差别”并宣传“这个更好”。这样，商品的种类就会越来越多，各种商品的产量则会越来越小。

在前一章里，我曾谈到上述情况将减少或消灭曾在工业社会特别是可称为其顶峰的战后石油文明社会中表现极为突出的“规模效益”，并将改变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不仅如此，它对于我们研究“知识价值社会”的组织形态及其领导者的条件也是个重要的问题。

此外，这种商品多样化现象还可从时间角度作出说明。这也就是我想指出的第二点，即“知识价值”的寿命将越来越短。

在商品多样化、信息流通不断扩大的社会中，“知识价值”的变化也将是很快的。因此，技术的变化将越来越快，新商品的流行时间将越来越短。由于通过小规模的改良或组装产生的“差别”就能得到较高评价，因而，与其把将来说成是不断出现伟大发明和崭新的设计的进步时代，不如将其设想为反复出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的时代更为合适。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价值社会”又是“知识用过就扔”的时代，如同“石油文明”时代曾是资源能源用过就扔的时代一样。

当然，企图通过“过多投入知识”来提高信誉的现象恐怕也

将普遍出现。在“石油文明”时代，资源能源的过多投入现象就曾很普遍。例如，生产了装有超过实际需要的巨大发动机的大型汽车，对商品实行了远远超过保护商品所需包装的“过剩包装”，在房间里安装了甚至已经影响身体健康的冷暖气设备，等等，这些都是厂家为了迎合消费者认为多消费资源能源“体面”的审美观而制造“产品高级”的印象所采取的措施。

今后，为了使人们形成含有许多“知识价值”的印象，不必要地投入过多“知识价值”的商品将会日益增多。例如，具有消费者极少使用的机能的钟表、照像机和个人用计算机必将不断增加。在小店主购买可解微分方程式的计算器的时候，虽然买主并不懂得商品的机能和用法，但该商品却因“好象很高级”而实现了很高的价值。此外，还可能会出现式样设计过多和装璜过于考究的现象，即可称之为“知识过剩包装”的现象。

结果，创造“知识价值”领域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它在全社会的价值生产中所占比重也急剧增大。当然，在这一领域里工作的就业人数也必然会逐渐增加。正因为这样，创造“知识价值”的活动并不仅局限于特殊的高级技术领域，而是将成为极普通的职业之一。正如从前只是极少数熟练工人能够制作的工业产品现已成为极普通的工人都能制造的产品一样，“知识价值”也一定会完全变成极为普通的“产品”。而且，还会建成使这种演变成为可能的“知识价值”创造工程。

现在，在电子计算机软件和一些设计方面，已经开始了使不太熟练者也能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制作的研究。今后，这一动向必将进一步向前发展。

那些认为人类创造知识的活动具有某种崇高意义的人们，对于创造知识的“作品”——“知识价值”成为普通人的“产品”并

被不断使用后就扔掉的设想，可能会有强烈的反感。如果他们本人就在创造知识的领域里工作，甚至可能会感到“空虚”。然而，随着产业的产量的扩大，发生这种现象是很平常的。在“为物质文明所毒害”的古代社会，认真传播宗教的工作只由极少数人格高洁的圣人担负着。到了宗教普及的中世纪，极普通的人也可以当祭司、牧师或僧尼。在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唐代，修道院和寺院有时甚至成了数十万无法谋生者的避难场所。在某种意义上，这无疑是宗教的堕落。但正因为这样，宗教才得以在整个社会普及开来。

当然，情况也不完全都是这样。在中世纪，也还有真正的圣人，在现代也仍有名工巨匠。到了“知识价值社会”，出色的知识创造者恐怕比今天还要多。然而，作为产业而大量生产的几乎所有“知识价值”，都必将成为由那些并非是特别优秀的知识拥有者的人们生产的“产品”。

从寄生性的客观价值到自立性的主观价值

对于上述预测，无疑会有许多人提出疑问和反驳。其中，有关工业社会的知识和感性认识都很丰富的人们大概会说：“所谓知识价值，说穿了，不过是用来扩大物质财富等的流通销售的东西而已，因而，它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将有局限性。”实际上，这一点正是工业社会中的“有限的知识价值”与“知识价值社会”中的“一般知识价值”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下面，以广告这一“信息”的价值形成中的变化为例对此作一说明。

今天，“信息”这一词汇在尚无准确定义的情况下被到处滥用，其含义极为广泛。其中，也包括能单独具有价值并可流通的一类，如能使人们的理性或感性的欲望得到满足和能给社会

生活带来便利的信息等等。然而，这种“信息”只是“知识价值”中的很小一部分而已。如前所述，大部分“知识价值”都以体现和融化在有形的物质财富和传统型的服务中的形式被流通和使用着。技术、设计和广告等就是这样。

那么，广告这个“信息”是怎样实现价值的呢？在工业社会里，一般都认为“通过广告可使物质财富等更多地销售出去，因而有进行广告宣传的价值”。因为如果能够更多地销售，就能够进行大量生产和大量流通，结果就会降低每一单价的生产流通成本，所以“作广告是能够捞回本钱的”。

也就是说，广告这种“信息”的价值是从因生产流通大量化而产生的“规模效益”中流出来的，这个范围即是广告信息的局限性(图C)。因此，广告信息的价值被认为是寄生于物资流通等领域的客观存在。

迄今的广告肯定论和广告罪恶论都是以上述想法为基础的。这种想法也是产生赞扬不作广告也能实现大量生产和大量流通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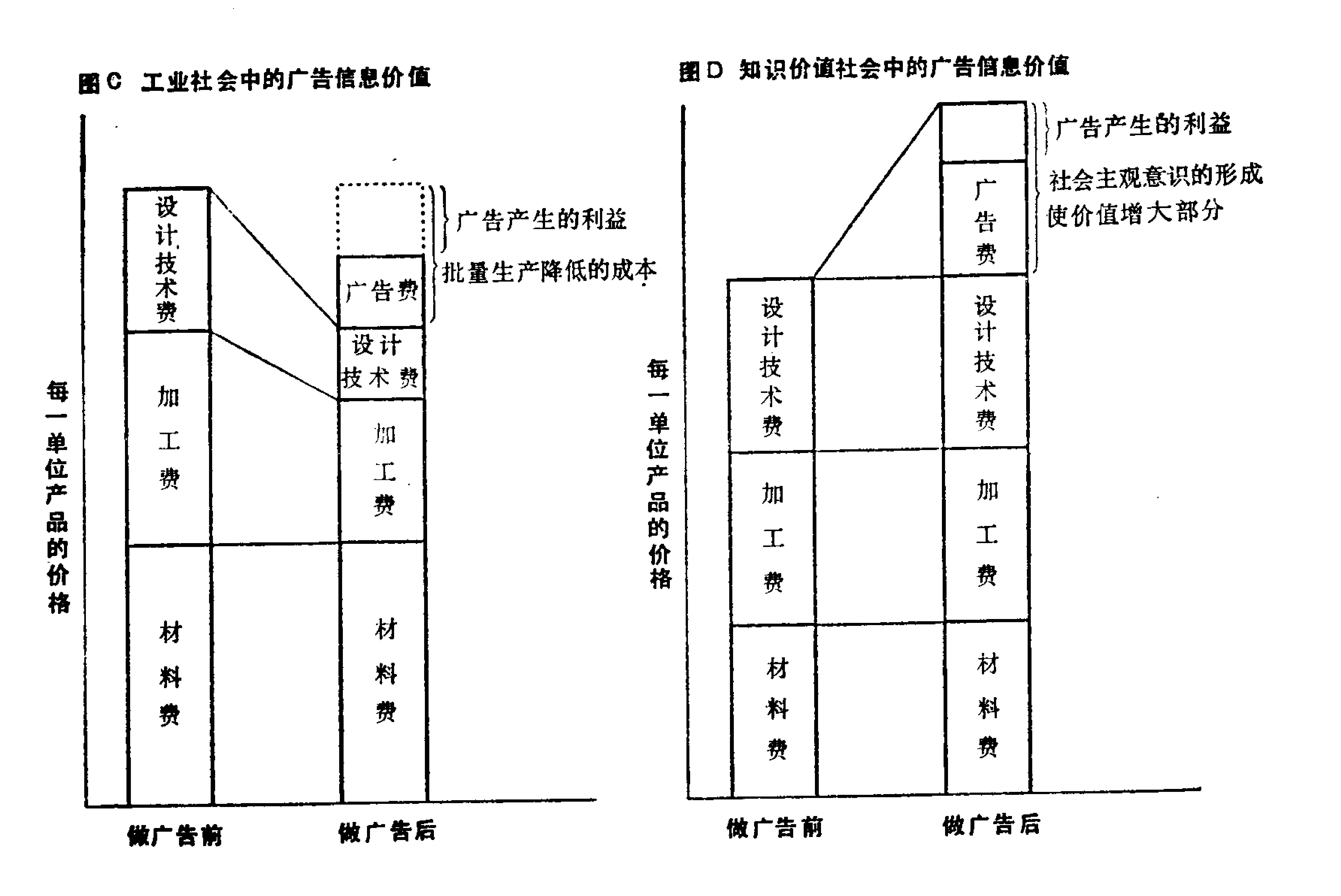
然而，“知识价值社会”中广告信息的主要机能，已经不是扩大物质财富等的销售量，而是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主观意识来提高物质财富或服务的主观性价值。如用本章前部的插图来说明，即将效用曲线移至上方，减少“决策成本”。也就是说要更多地实现融化于物质财富和服务中的“知识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价值社会”的广告信息的价值是一个自立的主观性的存在。从理论上来说，它具有无限的实现可能性，在没有规模效益的地方也能得以实现。

技术和设计的情况与广告信息大体相同。它们也是融化于物质财富等中的“知识价值”，但其目标已不是通过降低生产成

图C 工业社会中的广告信息价值

图D 知识价值社会中的广告信息价值



本和扩大销售量来谋求利益，而是追求创造自身的"知识价值"。也就是说，这些价值也已从依存于传统型生产过程中的利益的寄生性客观价值转变为自立性的主观价值。并且，通过这种转变打开了"知识价值"的规模无限扩大的道路。

在"知识价值社会"中，不仅技术开发费和设计费等"知识价值"部分在物质财富和服务中所占比重将会扩大，而且，由于自立性主观价值的扩大，"知识价值"在价值构成中所占比重也会增大(图D)。

总而言之，"知识价值"是装在物质财富和服务这些容器中的价值。从工业社会向"知识价值社会"的转变，并不表现在容器的变化上，而将主要是作为包括容器在内的整个"财富"的价值构成的变化来实现。我之所以反复强调不要简单地把"知识价值社会"与"软件化"和"脱离物质"等现象混同起来，就是这个意思。

二、"知识价值社会"鸟瞰

生产手段与劳动力一体化

当然，具有上述性质和行为的"知识价值"在"知识价值社会"中将占有重要地位。那么，这个"知识价值社会"将是怎样的社会呢？

在目前阶段对此作出预测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用指出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点特征的办法，可将知识价值社会的鸟瞰图大体描述出来。第一个特征就是生产手段与劳动力的一体化将会不断发展。

在"工业社会"中具有支配性影响力的工业产品等物质财富

与在"知识价值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价值"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其形态和价值变化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其产出过程上的差别。

近代工业社会中的主要"财富"——物质财富，是在工业化的工厂、农场和矿山中生产的，即利用大规模机械群产出的。而且，由于大量生产和大量流通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其生产设施便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倾向，而生产设备的设施也就随之大规模化了。以往的经济学中所说的"生产迂回化"和"资本装备率提高"等现象便因此而无限持续下来。

近代化的工厂——备有用动力源驱动的大型机械群的工厂的价格很高，还必须将许多人组织起来进行劳动。因此，无论是从投入资本方面还是从所需劳动力的数量方面来看，都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个人和家庭所能经营的范围。这就必然会引起工厂这一生产手段的主人与在工厂劳动的没有生产手段的"自由劳动者"的分离。

马克思认为，近代工业社会与以前的中世纪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在中世纪，农民一般来说，对他所耕种的土地拥有一定的权利(耕种权)，还拥有种子和农具。商人拥有店铺和商品，其经商的权利也得到了承认。手工业者也拥有工具和工作的场所。当然，在他们头上还压着征收年贡和税金的领主权力。但是，一般说来，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拥有的耕地、经商权和工具被人毫无理由地夺走的情况原则上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产手段与劳动力在中世纪社会曾实现了一体化。

正因为这样，中世纪的大部分人都为对自己拥有生产手段的权利及维持这种权利的义务所束缚，在选择职业和归属共同体方面都不可能是"自由"的。在中世纪，能够自由迁移、改换职

业的，只有那些落魄的流浪者。而当时所谓流浪者，与罪犯几乎是同义词。

在从中世纪向近代演变的过程中，上述制度逐渐松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有所增加，但基本上仍维持着原有的这种社会体制。

后来，在产业革命中出现的近代工业，一方面创造了需要巨额资本的生产手段——工厂，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了“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可以出售的东西的自由劳动者”。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离”。

结果，社会体制为之一变。“自由劳动者”为寻找职业而向城市集中，产生了大量缺乏共同体意识的市民。通过对生产手段行使权力而结成的大家族制度瓦解了，分散为适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最小单位的家庭(小家庭)。

在此后的技术开发的发展进程中，上述倾向总是不断向前发展，从来没有后退过。这是因为，在近代工业当中，大量化、大型化处于有利地位，个人拥有生产手段或依靠家庭成员维持开工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在经济学当中，之所以只将十八世纪末发源于英国、十九世纪扩展到西欧、美国和日本等地的技术革新——蒸汽机的使用和具有用蒸汽机驱动的大型机械群的工厂制工业的出现——称为“产业革命”，而不将此后出现的内燃机、电气技术的进步和化学工业的发达称为“产业革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今天，大部分生产手段均为国家等公共机构或企业等法人所有，个人或家族拥有大规模生产手段者几乎已经没有了。当然，还有些个人或家庭拥有特定企业的百分之几的股票。但是，拥有这种程度的股票虽然可以行使股东权和掌握作为收入来源

的财产，却与拥有生产手段本身有着根本区别。现在，在发达工业国家里，大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实际上也只是个经营劳动者而已。马克思所下定义的那种意义上的资本家——依靠所拥有的生产手段获取巨大利润者，作为一个阶级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把社会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等两极分化的两个阶级的预测是错误的。但是，资本与劳动的分离确实有了很大发展。

然而，在今后的“知识价值社会”中将占有重要地位的“知识价值”的产出过程中，究竟什么是生产手段呢？设计师需要桌子和制图用具。摄影师需要照像机。电子计算机软件系列企业则需要个人用计算机或小型电子计算机。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个人买不起的。因为它们远比个人住宅便宜得多。医师、律师、各种经营顾问和调查员等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在研究开发部门，可能会需要价格稍高一些的研究实验设施，但其大部分也不是很贵的。八十年代急速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大多属于不需要巨大研究设施的领域。

在“知识价值”的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这些物质性的设施和备品，而是从事“知识价值”创造工作的人们的知识、经验和感觉。这才是产生“知识价值”的真正的生产手段。而它又与人即劳动力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在“知识价值社会”中，在工业社会中不断发展的资本与劳动相分离的倾向就会发生逆转，将向资本与劳动两者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如果工业社会的首要特点是资本与劳动相分离，那么，就不能认为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知识价值社会”是工业社会的继续。我之所以不将今后的社会称作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即所谓“高级社会”，而是将其称为“新社会”，其最大的理由就在这里。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又把创造这种意义上的“新社会”的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技术、文化方面的变革与近代社会中反复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区别开来，将其定名为“知识价值革命”。

以城市中间阶层为核心的社会

知识、经验和感觉这些“知识价值”的“生产手段”，只有通过其拥有者本人的劳动才能使用。从事“创造知识价值”工作的人们，既是生产手段的拥有者，同时又是劳动者。在以往的经济学中，曾将同时拥有和使用生产手段和劳动力二者的人们称作“中产阶级”。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推理，从事“创造知识价值”工作的人们也都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了。

实际上，在以往被称为“中产阶级”的中小自营业者、自耕农与从事“创造知识价值”工作的人们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共同点。首先，在收入方面，他们大多处于社会的中间地位。他们都缺乏阶级意识，也不象工人那样具有团结和组织起来的强烈愿望。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变化虽然都很关心，但很少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他们拥有并依存于专门知识、经验和感觉等“生产手段”，所以在选择职业方面就不可能“自由”了。他们的工作单位和操作现场虽然有时也会改变，但要改变工种却很困难。

一直从事设计和专门技术等“创造知识价值”工作的人，不管收入多少，几乎都不可能去当建筑工人或去做一般事务性工作。医师和软件程序设计者也是同样。因为他们如果从事其它职业，就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知识、经验和感觉即生产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和所谓“中产阶级”同样，不可能是个“自由劳动者”。

但是，在另一方面，从事“创造知识价值工作”的人们却同以往的“中产阶级”有着决定性的区别。那就是，他们拥有的生产手段——知识、经验和感觉，本身是不能出售的，子孙继承也极为困难(虽有以商标和社会联系网络的形式继承的，但却很难巩固下去，其实际价值也显著降低)。也就是说，这些“生产手段”都是不能转让的财产。

从事“创造知识价值”工作的人们没有可以出卖的生产手段(因此，他们必须经常劳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更近似工人而不是“中产阶级”。与此相适应，他们不受居住地的束缚，对地区社会的关心淡薄，也不必与家属一起劳动。从事“创造知识价值”工作的人们多比一般工人更忽视家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创造变化剧烈的“知识价值”的人们，经常会对子女的未来和自己的将来感到不安。

总之，从事“创造知识价值”工作的人们是个与以往的“中产阶级”不同的阶层，可以说是个名符其实的“中间阶层”。

“创造知识价值”产业恐怕将是一个在城市间流动性很高的产业。这是因为：这种产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极低；在收集信息等方面集约化利益较大；其城市集中性虽然很高，但从事这一产业的人们对地区社会的关心却很淡薄，也没有与家属共同劳动的必要，等等。

今后的“知识价值社会”，预计将是这些在城市里居住的、流动性较大的“中间阶层”急剧增加的社会。在这一点上，它与以往的任何社会都有明显的区别。

从法人组织到属人性组织

“创造知识价值”的生产手段主要是知识、经验和感觉这些

属人性的东西。这一点将使生产组织产生重大的变化。

在生产手段是大规模机械设施等超过个人拥有能力的物质财富的工业社会里，以这些生产手段为核心的生产组织便应运而生并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作为生产手段所有者的具有模拟人格的法人发展起来了。因为，要想建立需要巨额资本的大规模生产手段，就必须从许多人那里收集资金。不仅如此，为了持续地、有效地利用这些生产手段，也需要有超越个人的寿命和能力的权利主体和管理经营组织。

这种思想早在古代就已经出现。在罗马帝国和继之成立的拜占廷帝国，人们就已习惯于将国家和皇帝个人视为完全不同的两个事物。到了近代，又产生了早期的合资公司和无限公司等组织形态，通过养子制度来继承资产和维持组织机能的现象也已普遍出现。但是，生产组织以法人形式成为产业社会的一般形态，还是产业革命以后生产手段大规模化导致投资巨大化和组织扩大的结果。

在以这些物质财富即生产手段为核心的法人组织中，即使属于该组织的人员发生变化，组织本身也不会改变。无论是总经理和其他重要领导人发生变动，还是一般从业人员进行流动，A制铁股份公司仍是A制铁股份公司，其连续性不受任何损害。

然而，在以知识、经验和感觉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创造知识价值”的生产组织中，其生产手段却是依靠个人而存在的。因此，如果该个人离开了，组织的生产手段也就完全丧失了。极端地说，甚至连组织本身的存在理由也完全消失了。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组织所拥有的知识、经验和感觉，是其所属的复数个人拥有的知识、经验和感觉的集合体，因此，并不是整个组织都要依赖某一个人。在许多情况下，在一定组

织中劳动的人们都会互相传授和影响，因而知识、经验和感觉也已在某种程度上为大家所共有了。而且，这些“生产手段”以外的资产特别是“信誉价值”和人际关系等因素也不可忽视。因此，一个人的退出并不会使该组织立即解体。然而，核心人物的退出经常会给组织以相当程度的打击，至少会使组织被迫改变性质。这一点只要设想一下设计师、建筑设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和调查组织等比较典型的“创造知识价值”的组织的情况就会完全明白了。

“知识价值社会”中的组织属人性很强，其流动性远远超过了工业社会中的同类组织。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组织是“音乐爱好者① 型”的，那么，“知识价值社会”的组织则可以说是“爵士乐队型”的。

“音乐爱好者”乐团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即使指挥和第一小提琴手换了，乐团的传统、资产和名称仍可继承和沿用。而被称作“××及其五重奏”之类的爵士乐队，如果××不在了，该乐队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工业社会的组织(法人)还特别注意采用按职能划分的组织形态。因为对于有效地管理经营物质财富的固定组织来说，按照不同的机能对专家们进行分工是最合适的。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属人性能力和性质的“知识价值社会”的组织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个人将发挥很大的作用。当然，在社会环境将比工业社会更复杂的“知识价值社会”中，需要许多专门知识和技能，通过分工获得的利益也很大。但是，没有必要将它们都包含在一个组织里。设计事务所就是设计事务所，法律问题要交给另一组织——法律事务所去处理，财会业务

① 音乐团体的名称。——译者注

要交给会计事务所、工作技术要交给技术研究所去分别处理，只要这些组织互相协作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设计事务所的经营者就有因居核心地位的设计师退出而不能发挥机能的危险。

最近，在企业组织方面，信息多渠道流通型组织已经比纵向排列、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型组织更受人们重视了。因为信息通过电子计算机画面多渠道传播要比按照地位从上到下按部就班地传播效率高得多。这意味着不将特定信息向非专业部门传播的职能组织的衰落。这样，能够有效运营的多渠道流通型组织的规模也受到了限制，其核心人物的作用也将多渠道化和多面化，即不仅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和机能将固定下来，而且还将带有属人化的倾向。

在“知识价值社会”的组织当中，上述倾向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在这一点上，预计它将向与组织巨大化和职能化曾有很大发展的工业社会相反的方向发展。

从官僚式的管理能力到商人式的机智

组织概念的这种变化，使人们对在组织中工作的人们特别是领导人应具备的能力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

在工业社会中，企业总是在追求降低生产成本，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作为首要目标，因而必须扩大投资和销售量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投资计划和新产品的开发，甚至可能成为左右企业命运的重大事件。当然，实现这种计划需要整个组织的统一意志和全部有关人员的通力协作。

为达此目的，秩序井然的行动、连续不断的联络调整和坚持不懈的事先疏通是非常重要的。工业社会中组织的领导人应当具备的就是能够圆满履行这些职能的官僚式的管理能力。在

从战后高速经济增长后期到最近为止的大企业的经营者中间，之所以有许多人是坚持整体协作的慎重型的“伺机经营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然而，在短暂性的“知识价值”将成为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企业利益）的主要源泉的“知识价值社会”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对于以“获取最大知识价值”而不是通过“规模经济效益”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组织来说，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知识价值”作用的“场”即时间和场所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今后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首先应当具有先见之明，即具有能够预测今后何种技术将会发展、人们现在希望得到什么和今后什么商品会流行等情况的能力。

其次，要有能够把根据预测制订的计划付诸实施的决断能力。如果在争取得到社会上的一致赞同和事先疏通方面花费很多时间，就会失去“获取最大知识价值”的良机。第三，需要具有能够采取使已作出决断的事情迅速得以实现的行动，即能够推动整个组织迅速行动的行动能力。

第四，“知识价值”的创造需要有一个容易出现和集中信息及设想的有利气氛，组织的领导者则应具备创造这种气氛的能力和性格。这一点与以往那种以僵化的职能组织为对象的有秩序的管理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自古以来，日语中一直把上述这些先见之明、决断能力、迅速的行动能力和善于收集信息和设想的性格称之为“商人式的机智”。如果说，高速发展的工业社会是个官僚式的管理能力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那么，今后的“知识价值社会”则将是一个重视“商人式的机智”的社会。

等价交换原则的瓦解与职业选择方面的变化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判断："知识价值"发挥重要作用的"知识价值社会"将是一个与工业社会有很大不同的社会。这显然不是局部的变化或修正，而是社会形态即所谓"发展阶段"的变化。正因为这样，社会与人们行动的最基本的规范也将完全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等价交换原则的变化。

我们在工业社会中长大成人，对于等价交换是万古不变的公理这一点一直深信不疑。我们学过的现有的经济学，无论是自由经济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都以等价交换作为自己的前提。它已成为一般性的常识。这个原则是将人类作为"经济人"来把握的。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既有馈赠，又有继承；既有高价的特别销售，又有廉价的大拍卖；还有象资助相扑和政治捐款等并不指望得到明确的报答而使用大笔钱财的事例。但是，就社会整体来说，财富的移动仍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人们也都认为社会经济根据这条原则运行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人们都认为等价交换原则作为社会规范是唯一的社会公理，其它情况则不过是一种例外。

在进行等价交换的地方，每种商品当然都会有各自的价格（即一物一价），其价格经常会受到压力，迫使它接近"价值"。因为，在不特定多数的人们反复进行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如果卖方出现了超额利润，立即就会有人加入进来，从而使供应增加，价格下降；如果卖方出现了亏损，供应则会减少，从而又使价格上升。如前所述，马克思等人主张的劳动价值说自不待言，即使是瓦尔拉斯派的效用价值论，实际上对此也是予以肯定的。

然而，从上一章中论述的中世纪社会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

等价交换并不是万古不变的公理。而且，这一点在今后的"知识价值社会"中似乎也是适用的。

就"知识价值"来说，不仅社会效用曲线将如前述那样出现向右下方急剧倾斜的曲线，而且其位置本身也会剧烈变动。因此，它不仅不会因新加入者的出现而使价格向价值接近，甚至很难形成一物一价的状态。

例如，某时某地以一万日元出售的商品，同一时间在另一场所以五千日元售出的情形并不罕见。某一企业想用一亿日元引进的技术，其它企业却可能突然出价十亿日元。同一设计事务所用同样时间完成的设计，在甲地卖一百万日元，而在乙地仅卖二十万日元，这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了。正因为"知识价值"的价格与其生产费用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它可因买方或卖方所处的环境，即所谓"主观性的气氛和判断"而产生很大的差异。

在劳动力价格即工资和收入方面，等价交换原则也已经开始崩溃。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雇用平等法》和日本的终身雇用。年功序列工资制使劳动者的劳动效果与工资的关系发生了乖离。一般说来，下述变化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即：选择职业的标准已经为职业的"体面程度"而不是工资的多少所左右。而且，利用已确立起来的权威和权力可获得与劳动、资本毫无关系的收入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在中世纪，一无所长者可以仅因是名门出身而徒享厚禄，从不参加生产劳动者可以仅因其是人格高洁的圣人而位居高官。在"知识价值社会"里，则将普遍出现下述现象："体面"的企业工资虽低也仍人材济济，"不体面"的企业即使工资高出许多也没人愿意来工作。

在工业社会里，人们的消费欲望主要集中于增加资源、能

源的消费上面，因而能使这种欲望得以实现的高工资就经常会成为对职业选择的有效刺激。也就是说，有才能的人材都集中到工资高的企业之中。

然而，在"知识价值社会"里，消费欲望将更多地集中于"知识价值"。在那里，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在消费生活方面的差别，仅仅是"能买高价名牌产品还是只买普通商品"之类的差别，即只是"体面"或"自我满足"(主观感觉上的满足)的问题而已。这样一来，职业本身的"体面"或"自我满足"程度便成了竞争的对象。

在人们普遍重视物质财富多寡的工业社会，消费欲望与职业的"体面"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因而收入上的刺激可以超出工种的范围而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在"知识价值社会"就不是这样了。即使较多的收入能使人们在消费方面得到"体面"或"自我满足"，也会因职业上的"不体面"而完全被抵销。最近，年轻人宁肯选择工资低的创造性的职业也不愿从事工资高的"肮脏"工作，就是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

"财富的抽象化"

当然，社会现象并不是可以象绘画那样一下子通通涂改成一种颜色的。在资源、能源、原材料等缺少差别的商品和比较简单的服务方面，一物一价的原则仍将继续实行下去。但是，即使在这些领域，价格与生产成本未必接近的情况将会增多，劳动工资与生产效果的关系也将发生乖离。近年来，石油价格和一部分不动产价格的急剧变化就是这种演变的一个侧面。

同时，馈赠和权力性 政治性的再分配也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现象。在西欧许多国家里，社会负担(租税十社会保险

费)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纠正收入差别和世代间的收入再分配已成为极大的经济现象。考虑到今后的"知识价值社会"将是一个前述那样的"时间过剩社会"，这种背离等价交换原则的再分配现象恐怕只会有增无减。

当然，这种再分配也不完全都是通过征税、福利政策等国家权力进行的。今后，通过等价交换原则和一物一价观念的崩溃这种形式进行的再分配，反而很可能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同时，在国际性、地区性的财富再分配方面，背离等价交换原则的机制也可能继续扩大。现在，这种再分配正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合作的形式进行着，并且正进一步以巨额贷款延期偿还的形式向更大规模发展。后者在表面上虽然采用了有利息有期限的商业贷款的形式，但是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即使从超长期观点来看也不能偿还的，并且还可能因国际性通货膨胀造成贬值或因政治性解决办法而"实际上丧失"。极而言之，这可以说是"没有意料到(或违背原来意图)的国际性财富再分配"。它与"有意进行的国际性财富再分配"即经济合作和无偿援助的实质性区别，仅仅是在某家银行的帐簿上记载着一些"贷款"的数字而已。

出现这一事态的背景，是由于"通货"概念已出现了重大变化。自古以来，人类使用的"通货"都是金、银、铜等金属即"物质财富"。后来，由于通货磨损后造成的减量不能纠正，又发行了作为代用品的纸币，从而使作为物质财富的金属和通货的价值事实上脱节了。但是，归根结底，通货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金属特别是黄金这种物质财富而存在的。

这种情况基本上持续到一九七二年黄金与美元停止兑换时为止。在此之前，包括美元在内，各国通货一般均已停止兑换

黄金，但是，各国的货币经济政策仍然受到作为国际通货的美元的拥有量和支付能力的制约，美国自己的货币经济政策则受到为满足外国用美元兑换黄金的要求所必需的黄金拥有量的制约。因此，只要不采取降低汇率这种“屈辱性措施”，各国的通货就都间接地受到了黄金的制约。

然而，一九七二年发生的黄金与美元停止兑换的“尼克松冲击”，却使事态为之一变。通货的价值开始仅为人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心理状况，也就是所谓社会主观所左右。目前，美国每年都有多达一千五百亿美元的经常收支赤字。如果是在实施美元与黄金兑换的一九七二年以前，这样大规模的赤字无疑是根本无法忍受的。

我们装在钱包里的零用钱，在它可以随时与物质财富或服务相交换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但是，象国际金融和国库债务那样的巨额资金，则可以说已经抽象化了。在“知识价值社会”中，人们身边的财富的主流将是依存于社会主观的“知识价值”，同时，巨额资金则将以不具备具体实现性的形式抽象化。

民族国家的消失与思想圈的确立

除了国际上流动的财富的抽象化以外，民族国家概念的消失也是一个将使国际社会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因素。

如前所述，人们认为民族国家是国家的“应有姿态”，是他们开始重视事物的物理性、机能性的特色的近代以后的事情，在中世纪以前是完全没有这种想法的。认为同一民族建立的国家组织更美好的结论，正是来源于将人象物质财富那样按形状和机能加以区分的设想之中。

然而，这一点从七十年代开始也出现了决定性的变化。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和苏联等多民族国家取得了发展和壮大。不可忽视的是，在曾以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欧洲也迁入了许多异民族，西德和英国事实上已经正在成为多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里，由于进入八十年代后失业率有所上升，政府采取了限制外国工人流入和促使外国人归国等政策。但是，由于原有的白人居民与少数移民之间在出生率方面存在差距，其多民族的性质不可能会消失。最近，在美国、苏联和欧洲，甚至反而出现了少数民族强调自己的祖先和独特文化的倾向，正在向增强社会文化方面的多民族性的方向发展。

然而，比上述情况更具有戏剧性的变化，是七十年代末开始出现的难民的剧增，特别是“政府公认”难民的出现。越南和柬埔寨政府在未决定难民去向的情况下，以正式承认或默认的形式将几十万名本国国民赶出国土。这是一个具有使国家概念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因素的令人吃惊的事件。它使那种认为“人处于同一民族组成的政府的统治之下是理所当然的、幸福的”的民族国家观念受到了决定性的破坏，同时，也使“同一民族的本国国民大量流亡到外国是政府的耻辱”的政治伦理观念遭到了否定。在这方面，越南和柬埔寨政府所表明的态度是：“即使他们是具有本国国籍的同一民族的人，不赞成政府的政治主张的人也应该到外国去。”也就是说，他们所主张的，正是重视思想即社会主观意识的共同性甚于民族和国籍的中世纪式的思想倾向。

由越南和柬埔寨政府“开发”出来的上述思想和政策，很快就在其它共产党国家里传播开来。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古巴和埃塞俄比亚也作出了同样的事情。而且，其它国家特别是美国

等发达国家在这种惊人事件面前却表现得软弱无力，除了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救助难民以外，没有采取任何对抗性的手段。总之，越南和柬埔寨政府的这一暴行的有效性已在事后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对于现实中的这种移民的洪流来说，国境、法规、甚至连军事力量也都明显是软弱无力的。现在，民族国家思想不仅在概念上已经破产，在实际上也已显然是不能维持了。即使是世界上最纯粹的民族国家，并且似乎具有今后继续维持这种体制的坚强决心的日本，如果某日从某国漂来几十万名“船民”，又能采取什么对策呢？警察和自卫队可能会在登陆地点将他们拘留起来，暂时收容在特定设施里。但是，如果他们的祖国也象越南和柬埔寨曾经作过那样不准他们回国，结果也就只好养活他们，并给他们找到某种职业吧。

如果这类事件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多次，那么，不管法规和警备力量怎样增强，许多国家仍会不得不成为多民族国家。在大陆互相连接的美洲和亚洲的各个国家要阻止这种现象发生就更加困难了。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与古代末期罗马帝国和中国各王朝未能阻止蛮族夷狄流入完全相同的可悲结局。

在“知识价值社会”化的世界上，民族恐怕将不再是主要的国家组织原理了。到那时，主要的区分手段将不是牢固的民族国家组织，而可能是通过共同的社会主观意识联结起来的宽松的思想圈。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价值社会”的国际社会似乎很可能与中世纪非常相似。当然，划分未来世界的思想圈，恐怕不会再是中世纪那样的宗教了。

第五章 日本的“知识价值革命”

“知识价值革命”开始了

在以上各章里，我们阐述了这样的看法，即：与在工业社会范畴内一直周而复始地出现的技术革新和社会进步不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着的变化否定了工业社会本身，并将创造出与工业社会结构全然不同的新社会。这一变化的结果预示着，这个生气勃勃的新社会将成为一个把人的智慧所创造出的“知识价值”作为社会主要财富的社会。

这个社会在所有方面都与主要以自然界的恩赐和人类体力劳动所生产出的“物质财富”为中心的工业社会大不相同。在这个社会中，技术进步的方向、社会阶层的结构、家庭和社会组织的风貌、国家的形态等无疑都与工业社会越来越不一样。在工业社会中被奉为万古不易的首要信条的等价交换原则也将不再是普遍适用的了。

这种观点与以往发表的种种新社会观——如丹尼尔·贝尔的“超工业化社会”理论和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说——相比，也许正是在预测更具综合性的变化这一点上，使许多人觉得是“走得更远的极端观点”。毫无疑问，一定也有不少人会认为这是“对遥远的未来的空想式的预见”。

就对于即将来临的新社会的预见而言，这种批判通常是如影随形的。当亚当·斯密论述分工的利益、提出制造业是未来

的重要产业的观点，也就是预言工业社会的来临时，以魁奈为首的保守的重农主义者曾进行过同样的批判。

然而，我认为知识价值社会的来临并不“遥远”。不仅如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正是产生“知识价值社会”的巨变、也就是可以称之为“知识价值革命”的现象。

经济社会的变化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拿产业革命来说，英国用了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几十个春秋；西欧的发达地区花费了拿破仑战争后大约三十个寒暑；日本则从中日甲午战争持续到日俄战争后，前后也历时二十年左右。同样，“知识价值革命”也会几经反复，大约需要二十年到三十年。

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步的“知识价值革命”决不会在世界范围内停止或逆转。毋庸置疑，最晚到二十一世纪，“知识价值社会”将在世界最发达地区出现。

当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前一章里所描述的种种特征，也就是建立“完全意义上的知识价值社会”，会需要漫长的岁月。如我们在第二章及第三章中所述，从“原始时代”到“古代”，从“古代”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近代”，仅就各个时代的中心地带而言，这种变化就经历了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即使是近代工业社会，它在各发达国家的建立也用了产业革命以来的一百年。而发展中国家则迄今尚未进入成熟的工业社会。

这就是说，当人们说“近代工业社会由产业革命开始”时，并不意味着近代工业社会的建立与产业革命的发生同步。重要的是，产业革命使近代工业社会的各种特征更加明显，使整个社会以越来越强的势头向着近代工业社会的方向运动。换句话说，这并不意味着，产业革命刚刚兴起时，工业产量及其就业人数就超过了农业。而是指以此为转折点，工业开始成为社会

经济成长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

我是在与此完全相同的意义上说，“知识价值革命”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这就是说，我并不认为，由于八十年代开始的这一变革，“创造知识价值”的价值生产在数量上就立即跃居物质财富和传统的劳务生产之上，创造知识价值职业的就业者就马上超过了物质财富生产产业和劳务产业的就业人数。而是说，通过这一变化，开创了创造知识价值成为经济成长和资本积累(即形成企业利益和个人资产)的主要源泉的时代。

因此，“没有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既不会因为这种堪称为“知识价值革命”的变化而迅即消失，等价交换原则也不会由于这场变化而在整个社会上马上绝迹。即使在产业革命之后，带有中世纪气氛的农村社会和家庭手工业也还曾绵延不绝。在德国等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三十年代纳粹兴起后，它才丧失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在日本，这一过程则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高速增长的昭和三十年代①。

同样，在“知识价值社会”里，雇佣“没有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生产按等价交换原则销售的原料和大量产品的产业也将以相当的规模继续存在下去。在此意义上，这些传统产业在人的生存及社会管理上的必要性并不会消失。

但是，可以明确地说，如同在产业革命后缕缕不绝的小规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一样，在“知识价值革命”的过程中，作为经济成长和资本积累的源泉，这种传统产业不会再起那样大的作用了。

这里，请再次注意：我们说这种传统产业不再是经济成长

① 相当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间。——译者注

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并不是说可以在政治上、社会上轻视它。想想战前的日本，再看看今天的日本和美国就可以明白，这些缺少发展潜力的领域，常常正是政治上发挥巨大力量的地方，是易于得到社会尊重的地方。因为，与任何时代迅速成长起来的新文化和新产业都带有的怪诞的粗野不文相比，停滞的旧事物却由于往昔的光荣和传统而保持着庄重的形象。

这里所强调的这一点，在绸缪政治上的政策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本章所要论述的日本今后的政治及政策、或者日本企业的生存方式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这些现实问题上，社会变化的速度和规模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人来说，“时间”问题并不那么重要。人们称赞五年、十年的先见之明，他们也不反对就下一代做出预测。虽然从现实社会的运动看，斯密和马克思都是“过早的预言家”，但是学术上的丰功伟绩使他们倍受称颂。然而，在实际的政治领域和经营领域，五年之差导致致命的失败的事却并非罕见。

考虑到这一点，我想在下面谈谈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几年里，日本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

一、工业社会的“优等生”——日本

最切近理想的国家

八十年代的今天的日本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国家。至少是我们日本人安居乐业的国度。

人心安定、治安良好、太平有年。今天的日本恐怕是处在有史以来最幸福的时代，是当今世界上最宜人的国家之一。

许多事实都表明了这一点。例如，从经济上看，虽然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发达国家里居中游，但是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很高的。

日本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程度、丰衣足食的水平均属一流。此外，种种公共服务都安全、准确、便利。交通、通讯、信息方面的各类机构也相当充实。

甚至在一直被说成是“贫匮不足”的住宅方面，日本的每户平均面积也大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在美国、西德、瑞典之后名列第四。如果把房屋的修饰等质量方面考虑在内，对日本居住水平的评价恐怕就更高了。此外，日本住宅的私人所有率(所谓私宅比率)高于任何国家。因此，可以说日本的住宅情况也“好得很”。

从生产力方面看，日本的经济优势也显而易见。钢铁、汽车、各种电气设备、光学和精密机器等在国民人均产量上远远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产业有几十个。无论在质量上还是价格上，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都强大到了极点。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机床、高级办公室设备、电子等尖端产业上，日本的技术急剧提高，远远走在了其他国家前面。

不仅如此，由于日本的卓越技术、质量管理能力以及普通劳动者的优质劳动，学习日本经营管理诀窍的国家也在迅速增加。如今，日本产业的实力不是被作为单纯的经济力量来看待的，在构成这种经济力量基础的文化方面，它也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因此，尽管日本还在进口几乎所有原料、燃料和大部分饲料、粮食，但是贸易还是有巨额顺差。一九八四年，日本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四百五十多亿美元，超过了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

成为世界头号贸易顺差国。即使有暂时的增增减减，目前的这一趋势也仍会继续。

由于将这些巨额的贸易顺差用于国外的投资、贷款，一九八四年的日本贸易外收支也出现了顺差。夸张地说，“世界上的金钱都流进了日本人的口袋”。

在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对外顺差的情况下，日本的经济、物价仍然十分稳定。日本人一边享受着富足的消费生活，一边保持了储蓄的高水平。三十多年来，日本的储蓄率一直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她的奇迹就在于，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社会保险制度得到了明显的充实，储蓄率也并未下降。

日本另一个堪称奇迹的幸运之处是：在急剧的经济成长和出口扩大的情况下，劳动的供求通常是平衡的。除战争刚刚结束后的混乱时期外，日本的失业率在发达国家中往往是最低的，而且也没有出现由于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必须从外国接受大量移民劳动力的情况。用萨伊的话说，象这个国家的劳动市场那样由“上帝的看不见的手”大行其道的情况是罕见的。

总之，战后的日本不仅使经济高速增长，技术显著进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富裕的生活，同时还实现了没有失业和贫困的国内平衡和平等化的物质社会，并具备了继续产生庞大外贸顺差和高储蓄的素质。

从工业社会的经济观念看，这是“理想”的状况，即使在此背后存在着国家财政的巨额赤字和官僚的过多干涉也罢。

日本的“幸运”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基础教育的全面普及、世界首屈一指的高校升学率，加上“私塾”①、各类学校以及企

---

① 私立高考补习学校。——译者注

业内教育等，使日本国民的人均教育供给量无可争议地居世界第一位。

日本人的健康状况之好也为世界之冠。现在，男子的平均寿命为七十六点二岁，女子七十九点八岁，与四十年前相比，延长了近三十年寿命。这在当今世界上是最高的。日本的卫生管理机构和医疗机构十分完善，已无法设想会出现导致大量死亡的恶性传染病恣意流行的情况。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国民体格改善了。有人甚至说："未来的考古学家发掘人骨做调查，将会得出人种变了的结论。"短短时间里，国民的体格变得高大起来。

现在的日本也是一个最安全的国家。日本的治安极好，妇女夜行也不觉得危险，银行和家庭遭强盗洗劫的事更是罕见。"城市化的发展造成犯罪事件增加"这一社会学的定论在日本并不适用。同时，由于交通机构、建筑物、工厂和施工现场都力图实现最大限度的安全，日本不仅交通事故死亡率低，工伤事故也急剧减少。

最"幸运"的是日本保持了四十年的全面和平。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国土上再也没有燃起战争烽烟，日本人再也没有被送上战场。由于能饱享不会被迫应征入伍的运气，今天的日本人确实是称心如意。

还有一点可与这些相提并论的，这就是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和气氛极其和谐。由于在战后的高速增长阶段中确立了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工资体系，每个日本职工只要退休前一直在同一单位工作，虽然有快慢之分，但是其报酬和地位原则上都可望得到提高。如今，几乎所有日本职工都没有感觉到失业的危险。

因此，工作单位里气氛和谐，使人宛如置身于俱乐部中。出现了大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们在一起打高尔夫球、玩麻将的场面。这在外国是无法想象的。由于工作单位中洋溢着这种愉快的气氛，很多人甚至为了退休后不能去工作单位而感到沮丧。

实际上，对今天在日本就业者中占大多数的工薪阶层来说，单位既是工作场所，同时也是文化沙龙。人们的话题、时尚和娱乐几乎盖出于此。如果把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化称为"宫廷文化"、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化称为"俱乐部沙龙文化"，那么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日本也可称作是"工作单位文化"时代。

如果说，所谓近代工业国家是以物质富足、分配公平、生命安全和生活安定为目标的话，那么今天的日本就是最切近这个理想的国家，即现代工业社会的"优等生国家"。

日本尽管已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社会，却成功地避免了某些被认为是"工业社会的双生子"的弊病。

收入差距缩小了，但经济成长和技术革新的活力没有衰减；城市化发展了，但犯罪却在减少；靠工资为生的人增多了，但严重的失业问题却没有发生；竞争社会中特有的活跃性虽在，但工作单位里的人际关系却亲切和谐；自卫队虽然称不上强大有力，但治安却井然有序，而且保持了长期和平。

今天的日本既是工业社会的"优等生"，又是一个没有染上工业社会恶习的国家。

让今天的优等生成为未来的成功者

俗话说："幼为神童，少作秀才，过了二十，成了庸才。"这句俗谚不但是对父母溺爱子女的告诫，也是为了使人们知道，

评价人的才能和能力的标准因时代不同而异，劝诫人们不要过早地对未来存有奢望。

这同样也适用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某种条件下繁荣了的国家要在下一个时代长盛不衰决非轻而易举。

在世界历史上，虽然记载着象古罗马、汉、唐大帝国那样在几百年里一直以广袤领土和先进文明而著称于世的史实，但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先例并不多见。以此比诸个人，则只有明太祖、丰臣秀吉等寥寥数人而已。如同世界上昙花一现的人比比皆是一样，创造了可观的繁荣而一到下个时代就立刻陨落乃至被人们淡忘的民族和国家也同样举不胜举。

所以，日本虽然在战后、特别是近十年里成了世界上出类拔萃的“优等生”，但是却无法保证她在下一个时代里也仍然作为一个一流国家存在下去。“二十一世纪是日本的时代”等等大话无异于小学的优等生盼着将来得诺贝尔奖。

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工业社会正日趋穷途末路。不久的将来，一旦与工业社会的社会规范迥然不同的新时代——“知识价值社会”产生，在目前的工业社会里如鱼得水的“优等生国家”能否在以后的“知识价值社会”里仍然超群出众，就很令人担心了。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的日本人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在工业社会中成为“优等生”的日本在以后的“知识价值社会”中也仍旧是繁荣的一流国家？

我虽然没有虚张声势地鼓吹说日本会更繁荣、会成为世界上更出色的学生，但是出于极其自然的感情，作为一个希望自己国家前途光明、国民继续幸福、能够为世界的文明、繁荣与稳定做出贡献的人，我当然不会不对这个问题寄予关心。

“知识价值社会”决不是关于遥远的未来的故事。应称为工

业社会巅峰的战后的石油文明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顶点正在走下坡路，表明新的“知识价值社会”到来的各种现象显然正在出现。虽然工业社会的一切并不会倾刻土崩瓦解，创造“知识价值”产业的生产和就业者也不会马上成为社会的主流，但是经济成长和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确实正在转向创造“知识价值”的领域。

这就是说，工业社会的“优等生”日本应该为适应下一个社会而着手做准备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幸乎，不幸乎？尽管日本现在是工业社会的“优等生”，不，不如说正因为日本现在是工业社会的“优等生”，所以才存在着许多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在被迫进行重大的改革。

在日本国内，既存在着重建财政、行政及税制改革的问题，也有教育改革的问题。对未来高龄化社会的对策也已成为当务之急。产业和技术同样有必要进一步进行革新。在外交方面，对外经济摩擦愈益深刻，迫使人们不能不从全新的设想出发采取对策。工业社会的“优等生”在这个社会里成绩优异，但是在取得这个成绩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对内和对外方面的许多畸型现象及摩擦。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要有把未来的日本引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根本观念。如果进一步沿着工业化社会的方向来进行改革，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日本将无法适应今后的“知识价值社会”。然而，如果一味地采用漫无目标的权宜之计，只会加深矛盾、扩大混乱。

在充满活力的经济力量和幸福的社会状态与国内外诸多问题并存的今天，正是应该考虑国家的未来、注意寻找适应下一个社会的道路的时候。

到前一章为止，我们从对世界历史的考察中做出了“知识价值社会”即将到来的预测。本章将以此为前提，考虑日本在新的社会中的应有状态及作用，探索使现在的“优等生”国家成为未来的成功者的办法。

这个问题也是与探索同今后的时代相适应的世界道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日本有义务酝酿、勾画出与新社会概念相符的世界蓝图，并致力于它的实现。

产生集团主义的日本风土

在思考日本的未来时，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日本能够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国家、成为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处于最幸福状态的“优等生”国家，是自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大体上是六十年代末开始的。这也就是说，日本是在战后可称为工业社会顶峰的所谓“战后石油文明”这一特殊时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迅即成为世界的“优等生”的。这既可以说是因为在这一特殊时期，具备了对日本这个特殊国家有利的条件，也可以说是日本这个特殊国家能够形成最适应这一特殊时期的社会的结果。

在第二章里，作为赋予各个时代的文明以特色的因素，即作为“文明的犯人”，我曾举出了技术、人口、资源(广义地讲包括环境)三者。

这不仅是与文明的时代变化，而且也是与地区的不同相符的。日本文化和日本文明的特色也是根据这三个“犯人”的日本式特征形成的。在谈论今天日本的成功时，应先看到由这三个“犯人”所形成的日本文化、文明是如何适应“战后石油文明”的。

在研究日本社会时，最重要的是这块国土的地理条件。

形成日本国土的列岛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虽然有辽阔的海洋将日本与其他国家隔开，但她的四个主要岛屿却几乎座落在一起。这些岛屿多山、平地很少；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台风和地震等短暂的自然灾害频仍，但没有旱灾和寒冷气候带来的长期性灾害。这块国土的自然状况不仅规定了日本人生存的环境(资源)条件，而且由于制约了与外国的交流，也决定了技术及人口的条件。

日本人之所以易于接受这种看法，即认为文明和社会、有时甚至是人们的气质可以由居住地区的风土(环境)来说明，就是因为日本尤其如此。但是，如果把这块国土的条件仅局限于气候和地形，那就大错特错了。即使国土的气候和地形条件完全相同，如果与大陆之间的海域仅与多佛尔海峡①相似，濑户内海也象台湾海峡那样宽阔，那么日本经历的无疑将会是另外一部历史。

日本国土给予这个列岛上居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第一点就是自和辻哲郎以来有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风土、即气候和地形的影响。

暖湿气候和多山的地形促进了植物的繁茂。漫长曲折的海岸线适于渔业，但陡峭山地居多的陆地却不宜于狩猎游牧。因此，这个岛国上的居民缺乏狩猎和游牧的经验。日本虽然多少有一点近海渔业，但居民几乎纯粹是作为“草食人种”生长起来的。古时候，人们很少有供使役或食用的畜类。这与日本文化之一的和平性及平等愿望不无关系。因为，与狩猎和游牧容易由首领的能力和判断左右集团的命运适成对照，采集和捕捞的劳作大多要靠集体的协调和忍耐才能有好的收获。

① 英国多佛尔与法国加来间的海峡，宽三十二公里。——译者注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某个时期从大陆渡海而来的游牧民族在这个岛国上建立了“马上国家”。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即使这个列岛上确有某个时期经由朝鲜半岛而来的蒙古人种，也未见得拥有可谓之“鞍背上的民族”的文化形态和统治形态。美国的印第安人也是蒙古人种，但却不知马为何物。在日本的传说中，无论是《古事记》等神话还是民间故事和童话，几乎都没有提到过马。在日本的故事里出现的是狗、兔、狐狸、猴子、雉、鹰、鸢以及龟等没有多大用处的动物。

如果我们的祖先富有狩猎和畜牧的经验，日本人也许就会成为更好战、权力和贫富差别更悬殊的社会。

农业刚刚出现，这个岛国的气候及地形的影响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在海岸线边及低矮山脉内散布着的小块平原适合栽种稻谷，促进了人们居住的集中。由于稻谷单位面积产量高，又由于水中含有大量养分而有可能连作，因此同时也就需要有大量劳动力。

就这一点说，日本的农业与在绿州及河岸沃土上发祥的世界历史上最早期的农业很相似。然而，在这个岛国上，由于有内海和山道，可耕地之间的交通较为便利，所以政治权力统治范围的扩大要比技术进步更快。日本因而也就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国家，而建立起了区域国家。虽然有畿内、九州和出云地方的政权之争及大和朝廷向东国扩张势力等史实，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巩固的城市国家。

日本不仅缺少狩猎和游牧的经验，相当于原始时代的时期也是极其短促的。

和中国相比固然很晚、但在日本自身的历史上却很早就开始了小邦寡民的古代区域性国家的时代。培养了先进文化的先

进地区中国与隔海相望的稻米可耕区日本开始了发展阶段不同的独特交流。

使“消化”与“拒绝”均有可能的地区

把日本与中国分隔开来的海域，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都不算狭窄。即使在飞机飞行只需一、二个小时的今天，南朝鲜与中国也仍很遥远。无论是人和物资的交流，还是信息的交流，与日本国内的这种交流都有显著不同。不过，这种交流也没有到根本没可能进行的地步。如果对一定程度的危险和费用有准备，即使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交流也是能够进行的。

这就是说，日本既没有远到大陆的技术和思想无法传入，也没有近到在政治体制和思想上要受到强大邻国的强制。这一点与由于陆地相连而受到中国强大得多的压力的朝鲜半岛截然不同。

日本与大陆的交流似乎从公元前就开始了。但真正的交流则是在四世纪后半叶、任那日本府建立之后。这也是日本小邦寡民的古代区域国家正在形成的时期。但是这时，在汉代臻于至境的中国古代文明已经完全衰败，进入了南北朝、也就是神仙术和佛教广为流行的中世纪。

日本与中国在发展阶段上的交错给日本文化以重大影响。中国的技术虽然衰落，但对飞鸟时代的日本人来说仍然具有魔术般的高度。对于当时好不容易才能开垦田地、使物质财富逐渐富足起来的人们来说，争相采用这些优越的技术是很自然的。

然而，从中世纪化了的中国流入的思想却使日本人疑窦丛生。在形成了古代区域国家、为物质财富的丰富而额手称庆的当时的日本人眼里，蔑视生产活动、主张钻进竹林终日清谈的

思想实在是令人厌恶。虽然人们也觉得在这样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度里成为时尚的思想也许有某些道理，但是它与日本人的审美观和伦理观还是格格不入。

对于当时学习通过朝鲜半岛传来的中国文化的日本人，产生这种迷惘是很自然的。

在这个时期，日本人虽然很快掌握了中国传来的技术，但是却拒绝了中国传入的思想。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中国文化最热心的学习者之一。但是同时他们又坚决摒弃了某些东西。对道教、宦官以及同姓不婚的习俗等就是如此。

具有中国中世纪前期特色的神仙术也是为日本人所拒绝的东西之一。日本一度也曾出现过模仿这种神仙术的“假洋人”，如方士和“久米仙人”等。但是结果，方士被作为行为古怪的人赶走，久米仙人则由于迷恋色情而被传为笑柄。

所谓学到一些东西，拒绝另一些东西，并不单纯是选择，也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消化、改造。日本人由于在发展阶段上与发达的中国有巨大差距，被迫不得不这样做。结果，日本却成为一个非常善于学习并喜欢改造的民族。而且，由于不受对方思想的沾染而一心学习对方的技术，心理上很少造成抵触。所以学习外来先进技术的人才得以增加。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有取外来技术之实用部分进行学习、加以改造的才能。这既不限于战后的电视机、汽车和电子学，也不仅仅是明治以来的工业技术。在任何一个时代，日本在学习外来技术之后，四十年里准能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水平。

例如，用铜铸造大型塑像的技术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传入

日本是在公元八世纪初的和铜年间。但是，此后仅四十年的太平十九年(公元七四七年)，日本人就开始铸造奈良大佛，约两年完工。这样巨大的铸造能在二年内完成，恐怕在施工中几乎毫无失败之处。

在一千二百年间，奈良大佛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铜像。铜的焊接技术是在二十世纪中才发现的，当时自然还没有。为了铸造大佛，需要高超的技术。即首先制成大型的泥土实物模型，然后向分成八段的砂型中同时注入熔化了的青铜，并使之连为一体。能够以如此规模制造成大佛，说明日本的技术在四十年里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步枪首次传入日本是在天文十二年(公元一五四三年)。到了四十年后的天正年后期，即开始建大阪城时(公元一五八三年)，日本步枪的质和量都已名列世界第一。当时，仅在堺一个地方一天就生产十五支步枪，年产量约五千支。一六〇〇年关原会战时，东、西两军共有步枪六万支。这远远超过了当时全欧洲的步枪总数。

在几乎所有时代，日本人只要引进了基本技术，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掌握了实用技术，并且其水平还在其老师之上。这可以说是不受思想局限、专门学习实用性内容的日本实用主义的成果。

没有绝对正义感的实利主义

然而，在朝鲜半岛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并有大量移民涌入日本之后，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也就是承认不承认大多数移民所信仰的佛教的问题在日本成了热门的话题。

是否承认佛教之所以成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因为它包

含着一个有关天皇家族的地位及其存在合理性的问题。被认为是天照大神后裔的天皇家族的权威是以神道的神话为基础的。因此如果正式承认了否定神道神话的佛教，天皇家庭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理由。而且，主张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天子不德可取而代之的中国的易姓革命思想在当时也与佛教一起传入了日本。在存在着苏战氏这样的豪门望族的政治形势下，正式承认佛教对天皇无疑是极其危险的。

钦明、敏达和用明等各位天皇为了得到优秀技术和移民的拥戴虽然表示理解佛教，但又由于惮于其对天皇家庭的存在构成的威胁，而未能公开承认之。在排斥佛教的物部氏死后被苏战氏等拥立的崇峻天皇一即皇位，就表示了对佛教的反感，因而又被苏战马子所杀。

这时，从天皇家族中出了一位天才人物——厩户丰聪耳皇子，即圣德太子。他说："神须敬之。然有暴神，敬之而犹作祟，佛可镇之。"他利用这种诡辩，想出了在公开承认佛教的同时使神道也得以保全的办法。圣德太子不仅想出了这个办法，而且在成为摄政之后，还把它作为政策推行，在修建四天王寺和法隆寺的同时，于六〇九年颁布了敬神诏书。

圣德太子著有《三经义疏》，但作为政治家却未见他有过压制神道的形迹。相反，他自己也提倡"兼学八宗"，强调"和为贵"的融和精神。

真正的佛教徒对于这种作法大概会惊诧不已。企图普及佛教和易姓革命思想、迟早取天皇而代之的苏战马子对这种作法当然也极为愤怒。圣德太子觉察到了这一点。他避开传统的皇宫所在地飞鸟周围地区，在大和盆地北部的斑鸠修筑了摄政宫，并撇开与苏战氏关系很深的朝鲜，与隋朝建立了邦交。他制定

了冠位十二阶，使官僚制制度化。不能不说这完全是与苏我氏分庭抗礼的措施。不久，圣德太子的子孙被苏我氏满门抄斩。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但是，由于圣德太子诡辩的二元论，日本以后再未出现过严重的宗教问题，也未出现过由于信仰对立而触发的战争。这不仅使日本越来越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日本人的精神中失去了基于特定信仰的绝对正义感。

日本人之所以同时尊奉几个神、佛，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唯一的、绝对的永恒正义。日本人认为"对"，是指在彼时彼地大家都觉得"对"。极而言之，在这个国家里，如果大家都表示赞同的，就全部是"对"的。德川幕府时代人们相信拥护幕藩体制① 是对的，仅仅几年时间里尊王攘夷成了对的，再过几年文明开化又是正义的了。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叫嚷八纮一宇，但与停战同时，和平、民主又成为至高无上的正义了。

如果时代和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正义的内涵也会急剧改变。能够不太反感地做到这一点，正是日本人的特殊性格。

日本人不为唯一的、绝对的宗教精神所支配。在此意义上，日本历史上不仅缺少城市国家这一原始时代，而且也缺少严格意义上的"中世纪"。如山本七平和中山八洋所指出的，在日本史上被称为"中世纪"的镰仓时代的贞永武家条律，也是建立在非中世纪的现实主义之上的。

这与讲究实利的实用主义是相通的。没有绝对正义感的人倾向于维护自己的利益。由这种人所组成的集团如果认为大家称是的东西即为社会正义，那么就决定了有利于多数(或主要

① 指日本明治维新前存在的、以天皇为君主，由德川将军的幕府把持中央朝政、依靠众多诸侯藩国统治地方的日本封建制政权体系。——译者注

社会势力)的事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多数人的利益披着正义的外衣。

所谓多数利益，是一种社会主观。但正是在缺少绝对正义感这一点上，这种社会主观成为实利性的。这也就是说，社会主观本身带有不违背文明条件的合理性。在明治以来的近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战后优先发展经济的方针下，这种社会主观出现了。战后的日本由于使利益和正义并举，才能够以增加物质财富为目标前进。

和平所养育的官民一体思想

日本国土的地理条件在古代就已经把以上特点赋予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在此之后，这些特点继续得到了强化和补充。

这些地理条件之一，就是由于日本与大陆之间有辽阔的海洋阻隔，因而没有遭受过大规模的异族侵略和政治统治。除太平洋战争外，异族对日本发动的有组织的军事进攻只有一次"元寇之役"。但入侵者只在对马列岛外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在九州北部登过陆。后来日本由于"神风"而得救。

因为惯于在"秋高马肥"时进行军事活动的蒙古族照例是在台风季节进攻日本的。

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讲，这还够不上战争。所以在明治之前的日本，不需要有和异族打仗的准备，也不需要有准备和异族打仗的思想。此外，日本的内战时间很短，而且形同儿戏。即使在多次爆发最激烈战斗的十六世纪的战国时代，只要战败的诸侯及他的几名大家臣自杀，战争通常就结束了。屠杀普通居民的，只有织田信长发动的讨伐长岛的一向宗信徒的战争。

所以，日本人自古以来就缺少军事思想，不习惯把钱用在建设军事防卫设施上。在德川幕府二百六十年的太平盛世中，日本几乎成了一个完全没有武装的国家，甚至连作为战争集团的“军队”也没有了。

德川时代的武士阶级虽然是战国时代战争集团的阶级继承人，但是却丧失了军人的职能和组织，根本没有作为集团的军队的能力。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无论幕府还是各诸侯的武士，不仅实际上没有进行过集团性的战争行动，而且连把这些武士组织起来也不大可能了。伴随着这种情况的是军备的缩减。当时，最有威力的武器——步枪的质量变得十分低劣，几乎经不住实际使用。

因此，军费逐渐趋近于零。幕府和诸侯的钱都挥霍在江户富丽堂皇的宅邸上，以及用在了治安、征税和广义的公共事业上。

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作为社会，这的确都是一种特殊的形态。在外国，国家一直以防范外敌为主要任务。它是由此产生并发达起来的，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这种形态。为了养兵就必须征税，而为了收税就要维持治安，统治居民。所以居民感到税赋沉重，而且上缴的税款也不会被用来造福当地。

如果是异族统治，那就要更甚一层。居民不得不背负重税以养强兵。即使在战争中打了胜仗，对于居民也无任何利益和喜悦可言。而且，风俗习惯和伦理观念不同的异族当政，即使诉诸司法部门，也不见得能做出为居民所信任的公正判决。这就是说，国家仅仅是横征暴敛，而未给人民带来任何直接的利益。

这样一来，居民就养成了尽可能对政府隐瞒收入和生活实

际状况的习惯。国家则不得不进行强制性的调查。因而产生了必须把官和民对立起来考虑的思想。

但是，在日本，军费少、税赋轻，而且其中部分被用于纳税地区。特别是在德川时代，各诸侯为了增加收入，竞相在领地内振兴产业、开发土地。所以税赋很可能被用于纳税地。当时的世袭诸侯们积极开发本地区的热情是现在八年左右一换班的知事们所不能比拟的。

此外，由于统治者是日本人，风俗习惯、伦理观念和语言相同，审判大体上具有人们所期望的公正。在各地，无视明文规定的地方官与居民间保持了亲密和睦的关系。

这就表明，在居民看来，政府是值得信赖的。日本人习惯于向官府申诉，希望官府体察民情，就是出于这个传统。

今天日本经济增长和治安良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人是很容易接受统治的。而培养了这个传统的，是没有与异族间的战争经验和没有异族统治经验的日本历史。被外国人视为奇迹的行政指导和官民协调体制也是由于这个传统。同时，这种传统还导致了把从高楼火灾到不法商业行为都归咎于政府的"依赖官府型"舆论的产生。

现在，在日美、日欧的经济贸易摩擦中，废除日本严格的政府审批程序正在成为问题的焦点。但在另一方面，一出事情，追究政府放松监督职责的"舆论"也不绝于耳。日本人对政府有依赖性，欧、美则视之为某种强制的、有组织的"阴谋"。这种看法上的不同，可以说是历史的差别所致。在与异族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大陆国家与长期和平的孤立岛国日本在传统"文化"上是不一样的。

资源限制培养了日本式的勤劳

但是，日本的国土条件并不是只带来好的一面。辽阔的海洋把日本与其他国家隔断，使日本缺少向列岛以外发展的余地。可以说，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足以影响民族精神的新疆域。因此，日本一旦技术停滞、人口增加，很快就会陷入资源不足的境地。其典型例子就是德川时代后半期、元禄末年(十八世纪初)以后的情况。

在日本历史上，曾经有三次技术进步及随之而来的土地资源开发，导致了经济、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次是在古代，与大陆的交流步入正轨的六世纪到八世纪。第二次是中国的新技术再次传入和南洋技术传入的十五世纪末到十七世纪。第三次就是近代西方文明传入的明治维新(一八六八年)以后。

但是，在这三个时期之间是漫长的停滞时期。例如在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的战国时代，由于从中国传入了土地改良、农作物新品种以及矿山冶金技术，日本经济大大发展。一般认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日本人口翻了一番，从七百万增加到一千四百万。国民生产总值为原来的三倍。此后，从关原之战到元禄中期的近百年里，人口又增加了一倍，达到二千八百万人。国民生产总值又增加了二倍。大约二百年里，人口达到原来的四倍，国民生产总值是原来的九倍。

因此，十六世纪的日本物产比较丰富。安土桃山时代绚烂多彩的文化就是人们的"良知"受到"物阜民丰"的条件感召的结果。

然而，从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元禄时代开始，出现了资源的严重短缺，乃至可耕地面积缩小，金、银、铜的产量锐减。据

说，关原之战后的百年间，日本生产并拥有的黄金的一半、白银的四分之三都流往国外。一六三九年幕府施行锁国令的主要理由虽然是防范外国的思想、宗教影响和移民的流入，但从那以后到元禄年间逐渐削减贸易额则完全是为了防止金银外流。到了元禄年以后，对清帝国和荷兰的贸易支付也仅限于海产品和铜了。

此外，以日本的中国地区为中心，森林资源枯竭，出现了能源危机。"忠臣藏"(一七〇〇年)故事发生的时期，赤穗藩甚至必须派船到四国及备后等地去运柴来制盐。这是由于在濑户内海沿岸制盐和在日本海沿岸提炼铁矿砂，耗尽了当地的森林资源。

幸而由于"筑紫出产的会燃烧的石头"、即煤的出现使这场能源危机得以渡过，但是能源不足从整体上说变得更加严重了。结果，由于与物品不足相应的"良知"的作用，在日本树立起以节俭为善的伦理观念，产生了以贪图财物为耻的习惯。

但是，经历了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漫长经济成长时期的日本人由于缺少绝对的正义感等，所以并没有复归到中世纪式的清静无为的审美观中去。从元禄末年到享保年间，在十七世纪初的三十余年里，日本人一直痛苦地徘徊于有志于经济成长的精神与资源不足的现实之间。其结果产生了石门梅岩等倡导的"诸业即修业"的日本式的勤劳哲学。

以石门心学为象征的日本的勤劳哲学的特征，就是主张人们勤劳地从事的所有职业都是人的修行，企图使勤劳与节俭并存。它所导致的一个趋向，就是通过在有限的资源和土地上投入无限的劳力，实行精耕细作的"浓缩文化"。现在日本的工业品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原因之一就是它的精雕细琢

以及很少出现小故障。这也体现出了这种文化的传统。

另一个趋向就是致力于学习不耗费资源的软件。

从剑道、柔道、茶道、花道、围棋、将棋到读、写、珠算，所有习艺、即教育，在日本都盛行起来。因此，到一八六八年发生明治维新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教育大国。当时，日本百分之四十的男子和百分之二十五的女子都通过私塾等教育机构接受了基础教育。而当时甚至连最发达的工业国英国也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男子上过学，女子学校连一所也没有。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之所以能迅速消化欧美技术，就是由于有赞美勤劳的伦理观念和广泛普及的基础教育。

在此意义上，对于目前尚缺少这种伦理观念和教育普及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明治以后的经验是不适用的。

人们常把这种"日本式的勤劳"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的勤劳"相对照。这两者虽然实际上都构成了在日本和欧美建立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社会的精神和习俗的基础，但它们之间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我们且不谈十六世纪刚刚脱胎而出的欧洲新教。后来，当欧洲由于来自印度和新大陆的资源而出现"物资过剩"时，新教已肯定了与这一状况相适应的"作为辛勤劳动成果的富裕生活"。但是，日本式的勤劳则完全是处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所以它主张勤劳与清贫并存。在石门心学中所说的"诸业即修业"的思想中，不要说消费美学，甚至连劳动生产率的意识都没有插足的余地。这也是今天日本人的勤劳品德容易被欧美人误解的原因之一。

由于资源丰富而迸发出的成长力

如此观察大概就可以理解，日本的传统和文化具有极其适

应近代工业社会的特性。

不管外国的思想和社会特性，实利主义地学习外国技术的习惯在引进、消化和改造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上发挥了作用。缺乏绝对的正义感而以众人意见为转移的相对主义，使少数人的意见归于缄默，让全体国民走上了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特别是这里所说的“众人”从自己所属的小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就产生了仅仅局限在工作单位之内的共同伦理，建立起被称作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劳资协调和下情上达的经营方式。

和平国家的传统使日本毫不费力地在战败的同时丢掉了成为军事强国的梦想，减轻了军费负担。更重要的是，作为日本的传统和文化的结果所产生的对“官府”的信赖造成了官民协调的体制，也成为使卓越的管理能力得以发挥的基础。也正由于拥有这种传统和文化，才使日本避免了工业社会中必然产生的城市化所带来的治安的恶化。

而最重要的是，德川时代以来的勤劳哲学导致了日本人对工作的热爱和对细小事物的潜心钻研，它成为经济成长的最雄厚的基础。教育的普及也构成了大量培养优秀劳动力、特别是作为中坚力量的技术人员和中小企业经营者的根基。

除了这些日本自身的主体条件而外，战后世界形势也在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演变。到一九五五年，以中东相继发现大油田为转折点，出现了世界性的资源过剩。在资源过剩的时代，无论从哪里都可以购买的“自由的买主”居有利地位。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正是这种处于有利地位的买主，所以它不需要保护国内的资源开发产业。

如第一章中所述，战后的世界形势，使日本特色中的优点得以发挥。同时，它使作为最大弱点的资源限制反而转变为有

利条件。

此外，战后的新技术引进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善于学习的日本人毫无思想抵触地引进了新技术，并通过日本式的消化、吸收，在美国式的整体设计上成功地进行了日本式的细小改良。

现成地获得了"经济成长"这一国民目标和技术上的整体设计，使日本人避免了他们所不擅长的总体把握，发挥了他们引为自豪的勤劳和细小技术精湛的效果。而且，使勤劳和清贫并存的十八世纪以来的日本的勤劳哲学成了使人们能够经受长时间劳动、推进资本积累的原动力。与物质财富的消费相比更加重视继承软件的倾向，形成了在简陋的住宅中努力对子弟进行教育的社会习惯，使优秀的中坚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和新旧交替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却未陷入劳动力不足的境地，其原因就在于此。

考虑到以上这些情况，日本经济爆发式地急剧增长并成为工业社会的"优等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只要工业社会还继续存在，日本经济就会持续发展，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经济优势就会保持下去。在欧美发达国家，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远离物质财富，使技术发展的方向从大量化、大型化转向省能源化、信息化，这种动向对日本并不是不利的。日本文化原来就有着长于精雕细琢和热心于软件的特色，因此是适应这种变化的。

但是，这也会使日本与外国的经济摩擦愈益激化。因为，在持有勤、俭并重的石门心学的伦理观念的日本，消费是不会与收入同步增长的。石田梅岩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一点。究其伦理，只要劳动生产率不下降，供求就不会取得宏观上的平衡。这就是说，贸易黑字只会累增下去。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对外经济摩擦，日本人或者需要摆脱把勤劳和节俭都视为正义的传统伦理观念，或者需要在经济生产之外的领域去寻找使其勤劳品质得以作用于其上的对象。

二、“需求民主主义”的进展

凝固了的变革时期

日本的社会文化适应工业社会。特别是在战后石油文明时期，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日本“弱点”的国土狭小和资源缺乏在世界性的“物资过剩”现象中，转化为有利条件，在几乎所有方面，日本都成了受惠于最好条件的工业国。

那么，在八十年代的今天即将开始的下一个时代——“知识价值社会”，情况又将如何呢？

众所周知，日本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不仅在汽车和家用电器产品上，而且在电子这样的尖端领域也大大发挥了自己的长处，正在进一步提高自己在世界中的经济地位。仅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认为，即使在“知识价值社会”，日本似乎也会愈益出色地作一个“优等生”。然而，事关世界史上的大变革，不能如此简单地下定论。因为在这场大变革中，即使是在发达国家间，“知识价值革命”的进展程度也是有差别的。

任何变革也不是在全世界一哄而起的。它不但在先进地区——即各个时代的文化中心地区——之间有很大差别，在同一国家内也会参差不齐。无论是在从原始时代到古代的变迁中，还是在从古代文明到中世纪文化的过渡中，各地区所走过的道路和经历的时间长短是大不相同的。不仅如此，曾经以经济繁荣和文化先进而自豪的地区在下一个时代变得贫困、粗野的事

例是屡见不鲜的。毋宁说，从世界史的角度看，新时代文明的核心大多恰恰是在前一时代文明中心的周围或边疆地带形成的。

产生了迄今为止我们一直生活在其中的工业社会的产业革命也不例外。它最先兴起于属于中世纪文化边缘地带的英国。大约在一代人之后，它才波及到欧洲中世纪的先进地区——法国北部、西德、荷兰和比利时地区。而率先走向近代化的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的产业革命则更要迟得多。在美国，各个地区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人们大多认为，东部的产业革命比西欧晚了一代人左右。而南方和西部的产业革命则开始于南北战争之后。在日本，流行的看法是到了前面提到过的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二十年里，才出现了产业革命。而在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等所谓亚洲新兴工业国家(NICS)，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化则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体上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在通讯、运输技术相当先进的近代，产业革命这场经济、社会大变革的传播几乎用了两个世纪，其波及范围还不到地球人口的一半。

考虑到这种情况，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知识价值革命"的进行过程及时间历程出现很大参差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到战后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社会的NICS各国恐怕要走上不同的道路，尚未达到这一阶段的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则很可能不再经历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

然而，至少就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而言，与以往产业革命的传播不同，"知识价值革命"的现象具有相当的同期性。其原因不仅在于信息交流和技术、思想的转移流动不断加快且愈益密集。更重要的是，通过二十世纪的世界自由贸易、

特别是战后石油文明时期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源条件的一体化和政治结合取得进展，动摇人的“良知”的刺激物也变得一致起来。

例如，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九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各国都被作为能源危机接受下来，给人们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以直接的影响。对于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的环境问题、八十年代成为重要话题的土壤沙漠化和出现大量难民的问题等，各国的认识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上的差异。

在技术方面，美国开发的电子及新材料技术被引入西欧、日本，只用了不到十年。不管这些技术是否形成了巨大的产业规模，它们发挥出社会影响力都只用了极短的时间。

可以说，八十年代的今天发生的这场“知识价值革命”与过去的产业革命不同，在自由主义的发达国家，它具有“同时兴起”的条件。

但是，有“兴起”的条件，并不见得实际上会“兴起”。即使真地“兴起了”，它们在程度、速度、方向上也不能说是完全一致的。在这方面存在着各国、各地区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存在着政治上、习惯上的区别。此外，人口的增减和结构也有着很大不同。

因此，即使在资源和技术的通用性高度发达的今天，“知识价值革命”的速度和结果也会出现相当的差异。特别是在“知识价值革命”的过程中，各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形势势必会产生重大的不同。

袭击西欧的高龄化危机

一切社会变化都伴随着有形的、无形的“斗争”。在政治变革

中，存在着选举战、政治斗争、暗杀、暴动和镇压、革命、战争等比较容易理解的“斗争”。经济变化则表现为技术、价格、市场、资金转移以及就业愿望的变化，并与一国经济的成长和萎缩、经济主体的繁荣和破产相联系。自然，一方面存在着力图推动变化的新兴势力和革新者，另一方面就存在着力图中止这种变化的政治运动、劳工运动以及披着伪道德和社会荣誉外衣的抵抗。有关经济变化的“斗争”常常不仅引起政治对抗，而且还会引起文化评价及社会伦理上的对立。

正是在这一点上，一国产业、经济的变化能否迅速、彻底，不仅要受到推进这一变化的活力的强弱程度的影响，而且也要受到力图阻止这一变化的各种力量的强弱程度的影响。

如果从目前正在进行的“知识价值革命”来观察这一问题，那么在推动变化的活力上，日本和美国比较强，而西欧各国比较弱。其原因既在于技术开发能力和投资余力上，也与人口的增加和迁徙，特别是新就业者的质与量问题有很大关系。

在西欧主要国家，一方面是人口高龄化有了迅速发展，在几乎所有国家，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都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十五。另一方面，出生率显著下降。每个妇女的平均生育量只有两胎，而西德等国很早以前就已经低于一点四胎。因此，七十年代以来，新就业者人数已经有减少的趋势。特别是在过去十年里，英国、西德、法国等的劳动人口增长率都不到百分之五。这个数字仅仅是日本的一半、美国的四分之一。这种人口增长的停滞（实际上是减少）和高龄化正以种种形式压迫着西欧经济。

首先，养老金的增加加重了社会负担。现在，西欧各国的公共负担（租税加社会保险）的数额超过了它们各自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比日本和美国高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人

们纷纷指出，这一沉重的社会负担成了削弱国民劳动积极性、降低产业活力的一个原因。

其次，由于难以改变职业的中老年劳动者的比率高，使可能造成产业结构变化和职业变动的技术革新遇到了越来越有力的抵抗。在原来就有着固守传统技能的传统的欧洲，这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再次，作为中老年阶层的反抗的反作用，年轻人的就业受到了妨碍。八十年代以来，西欧各国失业率急剧上升。各国都达到了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水平。年轻人的失业特别多。如果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年轻劳动力就会有灵活得多的主意和办法。而他们中的一个相当部分却被关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实际工作领域之外，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由于上述高龄化的影响，在西欧各国虽然也进行了创造知识价值的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却难以形成大规模的产业。在"文明的犯人"之一的人口问题上，西欧各国的条件比日本和美国也要恶劣得多。在信息交流和资源环境变得明显相同的现代，仅人口问题就是一个仍可在各国间造成巨大差别的问题。

在保持着传统社会环境的西欧各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籍工人当然很难大量进入"创造知识价值"的领域。在美国的大学教授、研究所、设计师中，外国人是非常多的，而西欧则极其有限。石油文明时代曾经对解决生产第一线劳动力不足发挥过作用的外籍工人难以成为推动"知识价值革命"的力量。

在"知识价值革命"中领先的美国

与西欧相比，日本应付变化的活力就要强得多了。由于石油文明时代高速增长的余热，企业的投资欲望和个人的储蓄欲望

都十分强烈。同时，在平衡和协调的日本社会里，人人都象担心"不要跟不上变化"似地充满热情。此外，由于有在高速增长中确立的终身雇佣制度，日本的劳动者虽然非常害怕从一个企业转到另一个企业去，但却不大反对在同一企业内的工种变动。这与日本人善于学习的特点相结合，使得企业内部的技术和职务变化进行起来并不困难。

同时，在新劳动力的来源方面，日本也优于西欧各国。在日本，人口的高龄化还没有象西欧那样突出，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在人口中的比率刚刚超过百分之十。出生率虽然下降，但与西欧各国比较还是相当高的。过去十年里，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就业人数大致以相同比率增长，约为五百六十万人。而其中多数人都具有能够进入"创造知识价值"领域的教育水平和与社会相协调的一致性。在日本，一方面，每年有刚刚从大学毕业的数十万年轻人中的大多数进入"创造知识价值"的领域。另一方面，开始进入劳动市场的家庭主妇则作为临时工被灵活地用来填补传统式工作岗位的空缺。

美国对变化表现出了与日本不相上下的强烈欲望。美国社会的企业投资欲望和个人储蓄欲望不如日本。特别是储蓄率低到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美国也缺少终身雇佣的习惯，职工对改换工种的抵抗比日本要强烈得多。

但是，流入美国社会的人员和资金要远远多于日本。由于美元拥有作为国际货币的信用，数目庞大的外币流入了美国，所以尽管美国的储蓄率低，货币供应量M_2(现金＋存款＋准货币)的增加却非常快。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四年，货币供应量的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大大超过了日本的百分之十点二。即使把物价上涨率考虑在内，美国的资金供应量的增长率也和储

蓄大国日本一样，是世界上最高的。

此外，正在成为美国的变革动力的，是劳动力的惊人增长。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四年，美国的劳动力人口竟增加了将近二千万人，就业人数增加了一千九百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将近日本的四倍，增长率也为日本的两倍以上。

造成劳动力如此增长的，除了美国本身的年轻人的增加(自然增长)外，就是外国劳动力的流入。亚洲和中南美的大量移民迄今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移民中的大多数当然是收入低微的体力劳动者，但是在美国这个历来的多民族国家里，移民进入“创造知识价值”领域的余地很大。美国的大学教授、研究人员、技术人员以及从事专业、艺术工作的人员中，外国人以及外国血统的人所占比例很高。

由于有来自国外的资金和人才，新产业很容易在美国兴起。美国社会由于有外国“输血”，所以迄今仍然生气勃勃。它与美国这个自由竞争社会的活力相结合，正在产生出“知识价值革命”的惊人能量。

“知识价值革命”与“产业空洞化”

事实上，“知识价值革命”在美国发展很快。近十年里，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后的五年里，这种发展甚至强烈到过激的程度。

如前所述，近十年间，美国的就业人口增加了一千九百万人。其中，农业等第一产业仅增加了一万人，制造业也仅增加了十万人。美国的电子等高技术产业虽说有了急剧增长，实际上也仅仅是勉强填补了旧的制造业就业人员减少的部分。因此，制造业职工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一九八三年以来已经下降到低于总就业人数的百分之二十。这恐怕是美国

建国以来的最低纪录。当人们说“美国现在已经不是工业国了”的时候，未见得仅仅是指贸易结构的问题。

属于第二产业的建筑业相对来说还在发展，十年中增加了二百万就业者。但即使在这个行业，就业人员增加最明显的也不是现场施工单位，而是从事计划、设计、法律、资金以及不动产信息工作的部门。在第三章里，我们已经指出了，一旦改成“按贡献范围划分产业”，那么居于首位的将不是“物质财富产业”，而是“知识产业”。近十年中，即使从绝对数看，美国“物质财富产业”的就业人数也没有什么增长，而相对比例则直线下降。

近十年间，美国新增加的就业人口中有近九成在第三产业中就业，其中流通行业(批发、零售)和运输行业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并没有增加。结果，绝大多数新增就业者都进入了服务业和广义的信息产业，如大众传播媒介、广告、法律事务与会计事务、设计、技术开发以及各类教育和公益事业法人团体，等等。按照前文中提到的“按贡献范围划分产业”来说，“时间产业”、“知识产业”以及吉本在《罗马帝国兴衰史》中所说的“坐着的工作”，就是广义上的“创造知识价值”领域。

这不仅仅是就业者人数这样一个数量问题。在美国的年轻人中，不愿意去工厂和施工第一线，而想在大城市中“坐办公室”的倾向十分强烈。大学生的就业愿望偏重于大众传播媒介、律师、金融、会计、公益事业法人团体等领域。理工科学生的比率远远低于日本，而且大多数理工科学生希望在大学和研究所工作，对到制造厂商那里工作不感兴趣。已经进入制造厂商企业工作的也希望以后能转入销售部门。青少年中更普遍的愿望则是经营旅游业、娱乐业、销售业及餐馆。

在美国，服务业等“坐着的工作”的工资要比在现场“站着的工作”低，而不是高。尽管如此，美国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美国人仍然追求“坐着的工作”。其原因是由于这种工作被认为“体面”。可以说，比起消费更多的资源来更喜欢“体面”这种审美观的变化已明显地在选择职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了。

因此，美国的钢铁、汽车等传统重工业不付出高于平均水平的昂贵工资就找不到劳动力，这与工会组织的强大共同成为削弱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能力的原因。

美国的经营者决不会起来反抗这种情况。追求利润的欲望特别强烈的制造业经营者不再在与劳动力质量相比工资过高的美国建厂，而正在把生产现场搬到工资特别低廉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中南美。制造业经营者轻视生产现场、依赖技术开发和财务技术的倾向也正在增强。

这样做的结果，就形成了美国苦于工业产品供应能力增长过于缓慢，如果景气恢复、需求增长，就需要急剧增加进口的局面。美国即使在技术开发和设计方面生产出新的“知识价值”，也将由于作为这种“知识价值”载体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停滞不前，而面临物质财富的进口增加、贸易收支出现巨额赤字的局面。这就是一部分人称之为“生产空洞化”的现象。

在日本等害怕与美国产生贸易经济摩擦的国家，不少人都在谴责美国经营者唯利是图、轻视生产第一线的态度。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在这种态度的背后，是风行整个美国社会的潮流。这种潮流逃避第一线的“站着的工作”，而喜好城市中“坐着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倾向在近十年、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后变得特别明显。

对美国现状的不同评价

根据以上分析，就可以理解美国的“产业空洞化”与“知识价值革命”的表里关系。实际上，在迅速脱离传统型社会而率先走向新社会时，这种现象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这使人想起了曾经是罗马帝国中心的意大利半岛由于资源供给的枯竭和人口减少而开始走向“中世纪化”时的情景。那时，“健康的站着的工作”为人们所不齿，罗马人集中于城市里“坐着的工作”。结果导致了性道德的沦丧和家庭制度的瓦解。到了古代末期，支撑着罗马帝国经济和文明的残阳夕照局面的，已不是曾经是古代文明发达地区的希腊和完成了这一文明的意大利半岛，而是可以称为这种文明的边疆地区的、以拜占廷(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小亚细亚。

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区意大利重新恢复丰富的物质文明，是在此之后不久。但事实上，这块地方已经变成了中世纪初期基督教思想的中心。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也是如此。英国并不是由于在世界上带头实现了产业革命而立即成为富国的。十八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圈地运动的结果，使英国在工业全面发达之前出现了农业的普遍衰落，失业者大量出现。伦敦成为贫民、乞丐和强盗麇集的肮脏城市。十八世纪末的英国由于要从普鲁士和俄国进口谷物而出现了巨额贸易赤字。不仅自伊丽莎白一世以来的积蓄全部告罄，而且由于在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上窘态毕露而不得不出售印度的鸦片。

当时去伦敦赴任的法国大使夏特布里昂把“烟伞蔽日、贫民遍地的伦敦”描绘成正在走向毁灭的地狱，赞扬还保持着富裕的

农业社会的法国是产业经济竞争中的胜利者。我们对建立起工业社会后的维多利亚王朝之后的英国的繁荣了解得太多，但却常常忘记了其在工业社会建立过程中的悲惨景象。

也许可以这样说，如同十八世纪末英国产业革命的发展使作为旧社会的农业社会解体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发生的"知识价值革命"也正在使作为旧社会的工业社会衰落，导致"产业空洞化"。倘若果真如此，在不远的将来，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很难有大幅度增长，出口就很难有明显增加，贸易收支也很难恢复平衡。因为，要想使更加面向"知识价值创造"而不是物质财富生产的美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和美国人的审美观及伦理观念发生逆转是不可能的。

不过，比起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来，二十世纪的美国要强大得多，丰富多彩得多。许多富于进取、充满冒险精神的外国人今天也还在不断进入美国，在新的地区形成新的社会。在这些地区还存在着形成"新工业社会"的可能。近年来南方和太平洋沿岸工业的发达就是这种现象之一。

如同强大的古代罗马帝国在原来的中心地区意大利半岛实现了"中世纪化"后仍得以在往昔的边疆拜占庭保存了古代文明的残阳夕照一样，美国也大有可能在南方和太平洋沿岸保有繁荣的工业社会。但是这并不会使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整体停留在工业社会。

对于美国的这种现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键在于，在二十一世纪，美国所进行的"知识价值革命"能否产生出有利、有效的结果。不言而喻，这个"有利、有效"是不能用工业社会的尺度来衡量的。

强有力地维护工业社会的日本

与美国相比，我们日本的状况则迥然不同。前面说过，日本和美国都是推动“知识价值革命”的强国。但是在日本，企图维护工业社会的抵抗力量也很强大。在这个国家，物质财富生产是社会最重要的活动，“知识价值创造”不过是附属于这种活动的“绣花枕头”的想法在人们头脑中还占有统治地位。认为“创造知识价值”的产业、特别是堪称其典型的设计师及创时髦的行业、旅游和娱乐业等是“怪里怪气”的想法也很盛行。

这不仅是对当今日本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的老人们的思想，也不仅是怀念物质财富生产迅速发展的高速增长时期的中老年人的态度。把到稳定的大企业工作看得高于一切的大多数年轻人也持如是观。

然而，即使在那些发自内心地坚持这种看法的人们中间，当自己或自己的子弟选择职业时，很多人也仍然希望他们到政府机关、大众传播媒介、广告代理店或医疗、建筑设计、技术开发部门等“创造知识价值”色彩浓厚的领域去。这说明他们的这种看法不过是“善意的原则”而已。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知识价值革命”实际上在日本也取得了进展。然而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和行政组织正是基于这种“善意的原则”制定或建立的。这种原则成了在日本维护工业社会的坚实基础。

日本之所以如此维护工业社会，原因有两个。第一，由于第一章里所叙述的那些情况，在日本社会及日本人的所有组织中积累起了战后日本依靠扩大工业生产而获得的成功经验。

人，无论作为个人、组织还是集团，对于成功的经验都是难以忘怀的。因此，他们往往反复多次地沿用曾使他们一度成

功的方法。在开始赛马时仅仅中了二、三次彩就着了迷乃至为此丢了性命的人是屡见不鲜的。善于汇集所学知识的一流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到社会后仍是热衷于收集以往的知识。一流大学的毕业生较多的企业往往在进入新领域上行动迟缓，常常与旧领域的衰退一道沦落，其原因就在于此。野中郁次郎等六人共著的《失败的本质》一书指出，用白刃战和舰队决战取得过成功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反复使用这些战斗方法，结果遭到了惨败。

由于到了多次失败也不改弦更张的程度，所以现在在工业领域登上成功巅峰的日本当然也不会从高速增长时期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政策中摆脱出来。

第二是前文所说过的政府在日本的巨大作用以及日本社会的依靠政府、官民一体的体制。由于日本政府本来就有只承认它自已所确立的权威的特点，在社会认识方面是相 当 保守的。一刀切地运用同一种制度和法令的政府是不会率先确认尚未确定的东西，并施行以此为基准的政策的。因此，与新兴的尖端领域相比，政府常常更容易受已确立下来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或稍稍落后于时代的方面的影响。

此外，政府的保护和援助对于衰退领域的必要性要大于成长中领域。因为成长中领域喜好能够不受约束地发展的无政府状态而与此相反，衰退的领域则希望通过已确立的权威来维持现状。因此，政府的行政权限偏重于保护衰退领域，行政机构也采取了与此相应的形式。作为政府行政组织内的权力分配，保守派当然就会变得强大有力，改革则显得力量不足。

在带有这种属性的政府深得国民信赖、拥有强大影响的日本，出现力图维持工业社会的政策压力和思想倾向是不足为奇

的。

总之，日本由于建立起了最适应工业社会的社会体制和价值观，由于这种工业社会的体制才成为工业社会的“优等生”。因此，在日本，阻碍向新的“知识价值社会”过渡的力量还在有力地发挥作用。日本虽然一方面存在着社会变革的力量，即推动“知识价值革命”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却未能使工业社会的结构大大瓦解，其原因不是正在于此吗？！

日本的选择

时至今日，虽然在潜流中也有“知识价值革命”的流水，但是在现实政策与社会原则上，日本维持和加强工业社会的作法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功。

不过，迄今为止的成功作法到了明天就未必有效。迄今还可以干的，到了明天就没有保证可以继续下去。日本的“知识价值革命”如果再向前发展，对力图维护工业社会的政策的反抗就会加强。美国等外部社会的影响也会深化。在现实社会中，先进入“知识价值社会”的部分与还停留在工业社会的部分共处的状态将会长期继续，各种抗衡和对立将到处出现。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规范将不得不把立脚点放在其中一方，实施的政策不久也将被迫在二者中做出抉择。到那个时候，考虑日本应如何办的时间就不会那么宽裕了。

能够设想的选择说到底只有三个。第一个是采取大胆推动“知识价值革命”、促进向新社会转变的政策；第二个是彻底维护工业社会、压制“知识价值革命”；第三个是在这个问题上尽量避免政策干预。

第一种想法，即促进向新社会迈进的政策，在世界上率先

建立新社会的国家中主要是不知不觉地实行的。十八世纪后半叶到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当时的英国不仅置由于圈地运动而流离失所的农民于不顾，而且还屡次强迫充斥城市的农民到工厂劳动，以作为"对懒惰的惩罚"。结果促进了工厂工人的出现。英国一方面裁减建立在农村社会基础上的陆军，一方面加强依靠工业组织和工业产品装备起来的庞大海军。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陆军已弱小到无力独自同欧洲列强中的任何一国对抗，而海军却已拥有控制七个海洋的实力。英国还通过对"流亡者"打开大门，大量引进有工业经营才能和财力的人才。后来对英国产业发展做出贡献的罗斯柴尔德、沃伯格和路透等先辈，就是来自德国的移民。

目前美国里根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与此类似的、走向新社会的倾向。与主张保护工业的国会相反，里根政府对保护工业和救济农业态度冷淡，但却热心谋求对外国实行金融自由化，开放律师业务。美国的通讯业务、航空路线以及国内金融正迅速走向自由化，并力图在各自的领域中促进软件开发。现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税制改革带有这样的性质，它通过降低高收入者和法人税率，对利益变动不居的"创造知识价值"方面产生有利影响，但却通过废除折旧方面的优惠措施使资本集约度高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处于不利地位。

在军备方面，里根政府所热中的不是作为大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的主要常规武器，而是以SDI(星球大战)计划为代表的那种依靠高技术和软件的战略设想。里根政府被称为"保守的"，但实际上她是面向远大未来的。其实际政策效果始终沿着促进"知识价值革命"的方向发挥作用。

与此并存，不少人认为"日本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未来社会

的尖[illegible]在这样说时，需要考虑到前文中所谈到的过渡现象。[illegible]虑到日本的现状以及她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十八世纪末的英国由于农业衰落而导致了贸易赤字和流浪者的增加，但是她之所以能经受住这些，是因为当时已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十六世纪以来的资本积累以及控制了七个海洋的海军。今天的美国所以能经受住“知识价值革命”导致的“产业空洞化”，是因为拥有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和人才。如果日本不切实际地加以仿效，确有使经济活动迅速陷入混乱，不断激化国内摩擦之虞。

那么，第二条道路，即进一步加强抑制“知识价值革命”的政策又会如何呢？

历史上，采取这种维护旧社会政策的国家(地区)当然很多。与前文中英国的例子相对照，俄国，特别是普鲁士就是这种采取维护旧社会政策的典型。当英国正在推行产业革命时，德国东部的普鲁士对英国的农产品出口迅速增长，国库大为充实。在这些地区，采取了与此相应的大农业经营政策，即发展所谓容克农场、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政策。

在军备方面，不用说海军，甚至连严重依靠工业的炮兵也不受普鲁士欢迎。普鲁士大力发展了中世纪容克统治下的农民步兵。拿破仑战争爆发时的普鲁士军队与弗里德里希国王时的军队相比，倒退到更象一个中世纪的组织。不言而喻，这压抑了“自由劳动者”的产生，延缓了工业社会的形成。普鲁士修改这一政策是由于受了大败给拿破仑的震动的结果。它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的兴起。最近在关于纳粹产生问题上提出的“意想不到的近代化效果”说，就是以普鲁士——恐怕还有巴伐利亚——的这种状况为前提的。

日本今后很有可能继续采取这种维持旧社会(工业社会维

护型)的政策。对日本来说，继续实行维持旧社会的现行政策要比让政策朝着使成功的工业社会体制解体的方向转变更加容易，从政治力学上看也更加轻而易举。象往日的普鲁士拥有英国的农产品市场一样，今天的日本也拥有着由于“知识价值革命”的进行而使“产业空洞化”不断发展的美国市场。因此，日本压制“知识价值革命”、维持工业社会的政策是容易使人们觉得妥当的。

但是，这虽然是一种易行的办法，从长远观点看却不见得有利。日本建立了一个过于适应工业社会的社会。她如果在政策上进一步维持这个社会，恐怕就会僵死到无法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这无疑会首先扩大在国民、特别是年轻人中日益高涨的“知识价值革命”的呼声与建立在维护工业社会原则基础上的政策间的矛盾。而这又是与国际摩擦和国内分裂的无限深化相联系的。如同我们不应忘记今天的日本并不具有勇敢地率先走向新社会的国际条件一样，我们也不能忘记：日本也不具备能够承受国际孤立和国内矛盾的国土条件和政治实力。

向日本文化本身提问之时

留给日本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政策上和政治上不介入维护工业社会或推行“知识价值革命”的任何一方。当然，“避免在政治上、政策上介入”不是继续现行政策，而是意味着更积极地废止目前的介入，实现“小政府”。这也是解决正在成为当务之急的国际经济摩擦和财政困难的道路。

减少政治上、政策上的介入，“实现小政府”，就是要缓解工业社会所培育的政治制度——“投票民主主义”的影响，扩大“需求民主主义”，即通过人们希望获得的某些东西的需求行动推动

社会变化。这就是要缩小对达到成人年龄的国民仅仅通过几年一度的投票行动来表达意志的方式的依赖，而扩大每个国民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通过每天进行的活动所造成的变化。

“知识价值社会”是一个重视知识价值创造胜过物质财富生产的社会。这个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数量需求减少，而对由社会主观创造的价值的需求增加。在此意义上，我把这个社会称为“新的中世纪”。

然而，在这个社会里，有着高度发达的技术和信息流通。正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主观被细致地分门别类，而且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在这个社会中，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比一定规格的大批量生产更具普遍性，技术和设计接连不断地发生变化。因而经常需要许多有个性的知识创造活动。它要求带有个性的想法重于要求集体的合作，要求勇敢的决断重于要求有组织的协商。

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几年一度的投票来表达意愿的“投票民主主义”是难以实现它的真正的理想的。

各种人势必按照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来决定投票对象。而这种问题大体上在于供给方面，而不是需求方面。这就是说，“投票民主主义”很容易成为供给者集团的利益代言人的群体。这与变化剧烈的“知识价值社会”是尖锐对立的。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民主”着眼于作为需求者的人，而不是作为供给者的人。因此它必须经常为适应基于社会主观的变化而行动。

这在某些方面是与迄今为止的日本社会构想相对立的。

在被大家认为正确即为正义的相对正义感支配的地方，少数人的意见难以提出，独创的个性难以发展。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主观中，技术和设计的寿命很短，日本人所擅长的对外国技

术的学习，也许会变得跟不上发展的步伐。

更重要的是，依赖政府的心理和体制有妨碍、延缓引进自由设想和新技术的危险。因为政府所规定的规则和标准无论在运用时怎么灵活，归根结蒂还是不得不采用安全第一的全国一刀切的方式。

现在在日本，有许多新技术引进和产品销售由于政府的庞杂审批手续被耽搁了几年之久。问题是，在医疗和通讯设备等尖端部门，这类例子特别地多。而在建筑标准法上，日本则形成了只有经过长时间考验才承认新技术的体制。

这种问题单纯靠更改制度和对官员进行再教育是不能解决的。因为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存在着无论什么事都要追究"政府责任"的舆论和国民感情。仅就这一点而言，官员在实行严格的限制和监督上就不能松懈，结果势必走向管制性的干预。既然谁都要被追究责任，大家就都希望有权力。而一旦权柄在握，就有想滥用权力的人。

正如不摆脱资源不足时代产生的日本的勤劳哲学，当前的贸易经济摩擦就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一样，不脱离依赖政府的日本传统，就难以有走向"知识价值社会"的对策。而为了实现以上两点，日本就要冲淡特殊的日本的特色，实现"国际化"。

所谓"国际化"，不是懂得外国语和出国去旅行。"国际化"要容许不同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存在。这样才能培养丰富多彩的思想和独创的个性。

日本培育了极其适应工业社会的社会与文化。毫无疑问，这导致了日本今天的成功。但是，适应一种环境而制造的东西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巨大的恐龙和强壮的猛玛象因此而灭绝了。今天我们难道不是正有必要扫除这种成功经验，从过去

的成功经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吗？

当前，欧美各国和亚洲国家要求我们放宽贸易限制，批评我们劳动过度、消费不足。这种“外部压力”如果能够起到促进作用，那么它的效果就会超过打破了德川幕府统治后期的长期停滞状态的“黑船”。

一百三十多年前，人们被出现在浦贺的“黑船”吓得瑟瑟发抖，结果却正是“黑船”带来了日本的发展。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尼采美学文选

悲剧的诞生　周国平译

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

科学知识生长论　纪树立编译

萨　特

存在与虚无　陈宣良等译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等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